

炎黄春秋

第 **8** 期
2014年

顾准对“大民主”的反思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对农民起义认识的多重误会

林彪的衣食住行与性格爱好

知识分子头上的契卡幽灵

目 录

春秋笔

- 1 顾准对“大民主”的反思 蒋贤斌
7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郝怀明

求实篇

- 13 民生公司被公私合营的过程 赵晓铃
19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洪振快
27 毛泽东与竺可桢谈农业“十字宪法” 樊洪业
31 华国锋最先为包产到户开口子 吴 榕

亲历记

- 32 林彪的衣食住行与性格爱好 李根清
37 我的武斗经历 丁学良
42 中南海舞会见闻 崔维聪

一家言

- 44 对“农民起义”认识的多重误会 叶林生
50 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 姚轩鸽

往事录

- 54 1949年后辞书中陈独秀的形象变化 董立功
58 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 吕成冬
63 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陈徒手

人物志

- 68 风风雨雨千家驹 王 健

品书斋

- 74 读《历史的误读》 邓文初

故纸堆

- 78 一位旧政人员的自传 孙握之

海外事

- 85 知识分子头上的契卡幽灵 闻 一

编读窗

- 93 也谈红军长征的原因 景玉川

顾问

杜润生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天石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胡德华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资中筠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袁 鹰
凌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钱理群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董 健
章诒和	萧蔚彬	韩 钢	魏久明	
鲁 諝	雷 颐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竟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竟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竟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崇超律师事务所律师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68539058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顾准对“大民主”的反思

○ 蒋贤斌

文革“大民主”

“大民主”一词，据李慎之先生的叙述，最早是由他与王飞在1956年秋提出来的。1956年爆发“波匈事件”。毛泽东派其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征求意见。在这次征求意见的会上，李慎之、王飞认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进而，李慎之就提出：“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按当时李慎之的观念，这个“大民主”是与“小民主”相对应的，“大民主”是指“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小民主”是指个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向组织部门、领导反映情况，诉苦或争吵的现象。李慎之对这种小民主非常厌恶，认为当时“中国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据李慎之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大民主”是持反对态度的，毛泽东认为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付敌人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应该实行的是小民主，小小民主。

不过，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否定了李慎之所提出的“大民主”观，认为李提出“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种主张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但他又借用“大民主”一词，提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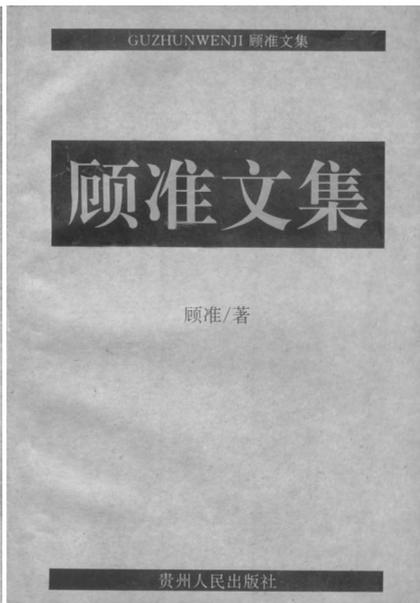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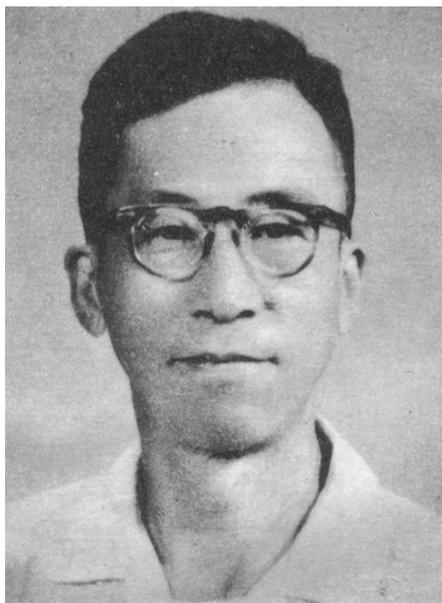
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是怎样的呢？毛本人在当时这样表述：“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的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

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么就一定要被打倒。”如何打倒？毛泽东的意思是可以“通过‘大民主’的方式”。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对大民主又发表评论：“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从毛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此时所说的“大民主”在概念上是比较含混的，它有阶级性，其中含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意思，同时也含有人民“公意”的成分；这导致了在对待“大民主”的态度上，毛泽东也有点模糊，既认可它，又反对它。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毛泽东既把“大民主”视为群众运动的方式，又把它视为一种方法、手段。

过了近10个月，毛泽东的“大民主”观变得清晰了。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明了他的大民主观：“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



顾准与《顾准文集》

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也会解决得比较快。”“找到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显然,到1957年底,毛泽东对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内容的“大民主”给予了充分明确的肯定。不仅视这个“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而且也视其为保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方法、手段。

毛泽东对“大民主”的认可与倡导让我们自然地联想到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的“窑洞对”。当时,黄炎培针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王朝更替的固定的周期率现象,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解决和避免,毛泽东的回答是用民

主的新路,让人民监督政府。可这个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它具体如何运作呢?人民如何监督呢?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度、两党制度,毛泽东是反对的。联系到这里,“大民主”的提出应该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所追求的与资本主义民主不同的民主运作方法的具体落实。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从实践上支撑了毛泽东的“大民主”观。不正是在“鸣放”之中,把反动的右派揪出来了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吗?既然“鸣放”可以

清查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那同样,它也可以把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官僚主义什么的同样清理掉。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大民主”,并试图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经常的有效形式。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套“大民主”在1957年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行,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期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的“大民主”在全国轰轰烈烈的上演了,它既成为民众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形式,也成为了文革期间各派别互相斗争的手段。

后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还被写入了七八宪法。到了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1980年,邓小平说:“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句话可以说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主流政治反思文革“大民主”的总结性观点。

中国思想学术界秉持了这一全盘否定“大民主”的观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视为政治生活中的“四害”。这一观点与态度当然也是一种对“大民主”的反思,但这样的反思在学理上是不是简单化了呢?人民直接参与政治,难道不是民主的表现?显然,不进行深入的学理研讨,难以说清“大民主”的是与非。

顾准的民主观

文革时期,毛泽东发动的“大民主”,其中无疑带有个人威权的作用,但是,它同样也显现了直接民主的元素。因而,顾准视之作为一种直接民主。这场表现形式为直接民主的“大民主”在当时虽然对于反对官僚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更多的是给中国社会与政治带来了极大混乱与灾难。信仰民主的顾准,并没有简单的对之以否定了事,而是针对文革中的民主现象,在结合近代中国民主的历史实践以及西方民主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民主、民主与中国等问题进行研讨,提出真正的民主只有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中国的民主只能实行代议制的民主思想,成为当代中国体制内呼唤现代民主思想的先声。

顾准的民主观念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 民主必须要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

顾准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所谓科学精神,顾准说它有五个要素:

第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

第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

第三,“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第四,“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从A的根子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

第五,“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

概括的说,顾准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认识论:它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人类改造世界的方法同样也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这样,什么终极原因和终极目标以及根本方法也就不存在;没

有绝对真理、没有第一原因,没有上帝,同样也就不会有天国的降临,有的只是人对世界的认识的不断的无止境的“进步”,只是人对人的自身处境的不断的无止境的“改善”。

顾准把这种科学精神也称为哲学上多元主义,它其实就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它是与绝对权威主义相对立的。顾准认为正是这科学精神,才促使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进而促进了人类进步。进步,不正是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目的?这样,要确保人类进步就必须确保科学精神,而要确保科学精神则要实现“完全的民主”。因而,顾准说,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维护科学精神的民主才是实现进步必须采用的方法。

顾准强调要把民主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基本上折射出顾准对人类进步的信仰,同时也是基于他对“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实践的反思。

2. 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非民主的。

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民主集中制也被视为一种民主形式,而且是真正的民主。在顾准看来,“民主集中制”尽管有“民主”于其中,但实质上是非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最终落在“集中”上,是由谁来集中呢?显然是“掌权者”在进行“集中起来”的事。权威主义专制主义正来自于这“集中”之中。对此,顾准有精辟的论述:“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一)集中、(二)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纳,实质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正是为了防范“民主集中制”,顾准坚持在“科学与民主”中只有把“科学精神”作为前提,而不是把“民主”作为前提。“把民主作为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因为科学精神是多元主义的,它拒绝对真理。这样,以科学精神为前提,于是“我们”就会对“你”的集中、归纳的正确性、神圣性提出质疑。“我们”才会反对“民主集中制”,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

3. 直接民主是不可能实行的。

顾准主张实行间接民主。顾准认为直接民主的理论思想源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而《法兰西内战》提倡的公社制下的直接民主不过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从源头上说，最早实现直接民主的是雅典城邦，后来，罗马也曾实行过雅典式的直接民主。当然，雅典和罗马时期实行的所谓直接民主只是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人民的民主。对于法国大革命实行国民议会，顾准说“法国大革命的风尚是要复共和罗马之古，亦即复直接民主之古”。同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倡导直接民主“也是复古——复公民大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

近代以来人类是否能复“人民直接统治”即直接民主之“古”呢？顾准说：不能。

“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注意西欧共同市场向西欧邦联发展的趋势）……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在这样的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的、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势必成为以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来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些，独裁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既然是国家的疆域过大使直接民主难以实现，那么，在全国实行城邦式的公社制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顾准指出“《法兰西内战》为‘新法兰西政制’描绘的一幅图画”就是“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公社，都实行直接民主。但，这行吗？这在实践中能办得到吗？顾准用四个反问回答了这个问题。

(1) 实行直接民主，当然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可公社内部必然存在政策有别的政派呀，法国大革命时就有，那么如何对待反对派呢？把“反对派都归入反革命派，加以消灭？”

(2) 各公社组成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要不要一个中央政府？如果要……那么，‘块块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尤其如果彻底消灭私有制，‘块块之间’的产品交换怎么办？按《反杜林论》，块块之间的交

换决不可以通过货币，那么通过什么？”

(3) 彻底打烂官僚机构，“要恢复雅典时代的，简直没有行政机构的做法”。行吗？

(4) “取消常备军。这事实上是恢复雅典和共和罗马的民兵的、公民的军队。行吗？”

显然，顾准认为以公社为基本单位实行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办不到的。顾准还特别以列宁欲在苏联实行直接民主之失败为例。“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以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还说要实行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机关”、“群众的统计监督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计划委员会“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可实行的结果是什么呢？“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Dzerzhinsk（作者按：指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其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为一切权力属于 Stalin、Khrushchev、Brezhnev（作者按：分别指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尽管通过分析发现，直接民主在民族国家是难以实现的，可是，我们不是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吗？我们不是信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原则吗？人民不直接参与何以实现以上原则呢？

顾准以史带论回答了这些问题。“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点不错。历史家写社会经济史的时候，也一定会这样写，Marx 在这方面的功绩，永远不会被遗忘。然而一部政治史，却永远是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理由何在？列宁作了最妥当的回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进一步发展列宁的例题，可以推论：陈胜、吴广代表了秦二世时农民造反的愿望，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证明。但是，陈胜、吴广一出来了，历史只能记载陈胜、吴广的活动，不可能记载千千万万农民的活动。”反对秦暴政的战争胜利了，“结果，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改善了一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并没有轮上他们。这不仅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1949 年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哪一次和平的

阶级斗争,其结果莫不如此”。

4. 间接民主为什么可行。

顾准以人类的历史和经验判定实现绝对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怎样才能使人民尽可能的对政治的影响力量产生最大化呢?顾准开出处方是实行间接民主,即实行议会制和两党制。

这是不是亵渎了“民主”这个原则呢?因为所谓的议会制、两党制不都是一部分人组成的集团在起作用吗?

顾准主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以来,职业高度分工这一角度来说明间接民主并没有亵渎了“民主”。“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在其中,一个工程师在他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同样,政治也只是专门行业中的一种而已,政治家精通政治,他们制定政纲,争取群众拥护,通过选举,以期取得政权,执政时为“官”,下台后为民,“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为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

顾准认为近代以来民主只能间接民主,因而主张议会制。对于议会制的肯定,顾准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的,一是从积极的方面,即从议会的变革演进史来论述议会的合理性,二是从消极的方面,即从如何看待和理解议会存在的客观弊端来论述议会制的可取性。

顾准指出西方的议会制度是在西方国家在由封建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的进程中,由等级会议逐渐形成起来的。“议会,是在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最初的英国议会,只有一个等级:诸侯。”后来,“城市生长起来,商业发达了,关税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权利用城市来搞统一,议会的成员,从诸侯这一个成分,扩大到包括城市代表……”。这样,议会的演进使其成员逐步扩大,这实际上也就是民主权利扩大了。因而顾准说:“议会演进史……是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议会中的各

种势力为争取自身利益把议会作为进行和平斗争的舞台,这就成了议会政治。

在顾准看来,在欧洲,封建等级君主制下存在的权利义务传统,必定会发展出议会政治。顾准以英国大宪章为例进行说明。由于英国王室违反惯例,向各诸侯进行非分勒索,侵犯诸侯利益,各诸侯便联合起来在等级会议上进行反抗,最终通过了大宪章,它“规定朝廷要征收钱款必须取得议会同意”,并“发展出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而这个后来又“成了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并“逐渐扩大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号召”。也就是说,君主与诸侯间的斗争虽为统治阶层间的斗争,“但是,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第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

顾准进一步推论,议会的存在使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别属于议会和“朝廷”,这就逐步演进为后来的三权分立制度。同时,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成为反对党”。这样民主政治中两党制也就演进过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也就是说,政治民主化的确立正是因为议会的存在而演进过来的。

通过对议会历史演变的考察,把议会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如此加以强调,顾准其用意无非是肯定议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议会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大量的弊端呀,如:清谈、贿选、党派斗争等等。这些如何解决和对待呢?

顾准不仅清醒地看到了这些问题,而且他还用“生动的文字”精确描绘了这些弊端:议会政治的确存在“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议会里面有一套‘战术’。为了阻挠议案通过,可以有冗长的演说发言,可以有议员互相抛掷墨水瓶,可以动武。通过一项法案时要‘三读’,讨论法律条文时咬文嚼字。无关重要的议案也按正式的议事程序,可以有演说者对空座侃侃而谈的奇观。选举时会有五花八门的‘抬轿子’、请客、地方大亨(杜月笙这一流人物)包办选举等等,当然也少不了

大大小小的贿赂。这些都不过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学家看不惯的是,这全套东西表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缺乏领导,也就等于没有‘主义’。而且,那种咬文嚼字的议会讨论,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议会这些弊端是客观存在的,可是当我们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同时又要避免直接民主时,选择议会制度就成为了必然。何况“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可面对议会的弊端怎么办?顾准说:“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间世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顾准的这一论断正好呼应了西方一政治家所说的:“民主体制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制度。”

5. 实行“两党制”。

要实行民主政治、议会政治,必须实行两党制(当然包括两党以上),这是顾准所肯定的。虽然他对两党制是民主政治必要条件这一论点的肯定从内容上看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在文革的政治背景下对这一点重新的论证是非常必要的。1949年后,两党制的“虚伪性”常常被尽情的“描绘”出来,以作为“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可取性。顾准用当时公众所熟悉的语调和逻辑也描绘了两党制的“欺骗”以及人们选择权威主义的心态。“号称为反对权威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通常主张,政治上必须保留反对派,实行两党联合执政。但是两党制的实际状况,也造成了那些民主主义者的幻灭。因为,两党制只允许你二者择一,好像结婚,候选对象只有二个。你不要这个,只好要那个。如果两个都不喜欢,只好打光棍——放弃公民权。何况这个两党,往往是换汤不换药,随你选哪个,唱的还是那出戏。于是,这种民主,不过是粉饰门面,不过是欺骗。何况,芸芸众生喜欢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存在,足以保障这种秩序。据说,苏联人怀念 Stalin(斯大林),就是出于这种感情。”

尽管如此,顾准说:“‘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更何况“有了多元主义的政治,两党制尽管表面上看来选民只有有限的选择的可能,它却是真正

民主的——因为有彻底的批评自由。”也就是说,两党制的“欺骗”、“粉饰”是存在了,但因为只有在两党间的“选择”,它就会有“有彻底的批评自由”,这就是真正的民主。

在国家政治中,任何政治体制中,为了行政的正常运行,权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政治上一个最最重要的事便是要防止权威演变成权威主义专制主义。对于这一问题,顾准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既然权威是不可以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覬覦’的,而且这种‘覬覦’是合法的,决定‘覬覦’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定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

顾准清醒地看到两党制的民主政治所存在的缺陷、不足,同时更正视了“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制度更会带来窒息思想扼杀科学的“恶果”。

结语

顾准现代民主思想的成熟表达最终是在1970年代,是在他翻译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以后的事,但是,从60年代里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我们发现在此之前顾准已基本上坚定了对现代民主思想的信念。在1960年3月的日记中,顾准写道:“政治上取舍的问题,去年秋冬之交在劳动队时已在考虑。这一二月来,愈来愈觉得,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靠爆炸式的改革做不到,而且后果也不好。四年的历史发展似乎在走另一条路——自然演化……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地上天国,矛盾永远存在,斗争永远存在,而斗争的方式,那老一套‘正确错误’的绝对论维持不下去了。不同意见的人们必定要组成不同的社团,发展的结果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度。”■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 郝怀明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号召说：“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

一场新的批斗中宣部的“阎王”们的恶浪在全市以至全国掀起来了。

11月30日晚，中宣部文革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陶铸、陈伯达关于斗争陆定一的指示，讨论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大家认为，陆定一是最顽固、最凶恶、最反动的大阎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他在全党全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一定要“积极组织这场大斗争，斗倒、斗垮、斗臭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会议决定由部文革委员会直接领导这场斗争，成立斗争陆定一工作小组，做具体组织工作。并根据陈伯达的批示，在斗争大会之前展出陆定一地主家庭罪恶史，“揭露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的罪恶历史”。（参见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简报》第114期，1966年12月5日）

中宣部在12月间连续召开的三次批斗陆定一的大会上，是把陆定一当作“地主分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来胡批乱斗的。

陆定一：“我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12月9日晚，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全体同志举行“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陆定一”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以及从无锡市五一中学来京送抄家材料的红卫兵。

这次斗争大会，是他第一次被拉出来在如此广大的群众范围内公开批斗。接着，在10日晚、11日晚，又连续开了两次斗争大会，每次都长达四、五个小时。为安全起见，有两次批斗会是在

部外军队的礼堂进行的。

第一次斗争陆定一大会，陶铸出席。大会主要揭发批判了陆定一三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一是说陆定一是“混入党内40年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官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分子”。主要根据是无锡五一中学红卫兵从陆定一无锡老家抄家抄出的一些材料，如祖上的画像、地契、分家时的字据等。在分家时，早已离家参加革命的他也曾分得一份田产、几千块银元，这样他就被诬为“不折不扣的地主分子”了。他在会上坦承，钱他是拿了，但都交给了党组织，作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经费使用了。

二是说“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夫妻黑店实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从会上揭发的情况来看，严慰冰对工作人员的一些不妥的做法，陆定一并不知情，他听了大家揭批的一些事情后，左一个“道歉”，右一个“有罪”，倒也痛快，一条都没有反驳。

三是说陆定一“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说他从1954年起，就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猖狂攻击毛主席。他在1956年7月说：“看到苏联的例子，我感到官僚主义、思想僵化是最危险的东西。特别是在北京的人了解实际情况太少……而且由于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于是听到的是一片万岁声。这样就会闭塞起来，听不到批评的意见……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1956年11月20日至23日，他在15个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可以有斯大林独裁制，也可以有民主的办法。以为我们的社会中不能产生专制主义，不对。一旦产生以后，权力比秦始皇、希特勒的权力还大。”1958年3月20日，他在征求《对宣传文教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的意见座谈会上说：“斯大林在某些制度环节中出了毛病，所以生产下降。”1964年6月23日，他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的时候，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都不做独立的

这是对他搞“逼供信”，搞“左”的“扩大化”。他宣布从这天下午开始绝食。他给家人写下遗嘱，说：“我犯了很多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但我不是反革命。”自己“死得冤枉”，“死不瞑目”。他坚信，自己的“冤枉总会昭雪”。这位年过花甲的硬汉，当晚拒绝进食。但中宣部批斗他的大会照样进行，他仍旧被押来参加对他的第二次斗争大会。

这次大会着重批判了他四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批陆定一反对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及允许有“反对派”、“党这些年来犯了‘左’的错误”

调查研究，没有独立的见解，只要会背斯大林如何讲就算。”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党如果没有群众路线，是要亡党的。”“党没有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但陆定一在会上拒不低头认罪。他的头被“造反派”摁下去，但只要对方稍一松手，他就昂起头高喊：“我不反对毛主席，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陶铸在大会结束时的讲话中说：“我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的斗争，是一场十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统治旧中宣部21年，一贯是阳一面，阴一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结成反党黑帮集团，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罪大恶极。彻底揭发他们，彻底打倒他们，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陶铸号召全体革命同志再接再厉，把斗争“大阎王”陆定一的仗打到底，一定要彻底取得胜利。并警告陆“必须俯首认罪，彻底悔改，争取重新做人”，否则“是死路一条”。不知此时的陶铸对陆定一“现在是什么人”是否已经真的认识清楚了。但话说得够狠，够劲。那时，不论由哪个在台上的大人物来讲，大概都会是这一套。

陆定一对大会上对他的无理的批判极为气愤。10日上午，审查委员会逼他交待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问题，交待所谓“反对派”的名单。陆定一大怒，拍了桌子，提出抗议，怒斥

一是说他“一贯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陆定一早在1958年就攻击毛主席著作不是普遍真理，只是为理解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提供钥匙”。1959年1月，他不赞成北京大学学生要求联系实际进行哲学教学的意见，说“许多人连马克思主义都不看，只看《矛盾论》、《实践论》，这是不行的。不能要求学了哲学，马上就用，没有这样的事情。”1960年，他提出不要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反对毛著学习中“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形式主义”。这个问题，在文革中构成了中宣部天字第一号“滔天大罪”，涉及部里许多位部、处（局）领导同志，闻名全国。

说陆定一和中宣部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当林彪提出“顶峰论”，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顶峰”时，陆定一说，这种话让后人去说，如果说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岂不等于说它再也不能前进、再也不能发展了吗？他对林彪搞的那个《毛主席语录》，宣扬的那套“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也觉得不大对头。他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应当学习它的精神实质，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去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是背上几句毛主席语录，到处贴上个“毛泽东思想”的标签就是毛泽东思想了，问题就能解决了。他多次讲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把它当作偶像，不要把它看成包罗万象。毛主席没

有研究过物理、化学,怎么能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物理、化学?贴标签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贴糟了,贴标签坏得很。贴标签,好像义和团差不多,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这一次乒乓球赛,星野到后来输得不得了,他想翻回来,头上扎了一块布,里边有个菩萨。现在把菩萨换成马克思在那里,行不行?这不是迷信吗?他不会救你的。不要贴毛泽东的标签,也不要贴马克思的标签。他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多次讲过上述这样的意见和看法,部、处领导同志都非常赞成和同意。当时在社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风气很盛行,中宣部行使自己的职责,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以防止和克服毛著学习中的这种不良的倾向,力图扭转由于林彪倡导并得到毛泽东支持而风行的那种不良的学风。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
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

中央:

近年来,各地报刊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很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是很好的。今后还要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在宣传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现将我们最近检查的部分有关报刊书籍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例如,去年1月25日“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去年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去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

在有的出版物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去年10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

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其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他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给患者服药,“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去年10月6日“中国少年报”刊载的“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一文,对于这件事情也作了同样的宣传。

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

(二)在宣传革命领袖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例如,1958年7月1日“中国妇女”刊登的“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养猪场”一文,就完全是虚构的。同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在群众中”一书,选用了这篇文章。1958年8月“宣教动态”第九十一期,曾指出这篇文章是“客里空”的假报道,当时全国妇联也给各省、市委宣传部发了通知。1960年5月“内蒙古妇女”杂志刊登的“毛主席关于妇女运动的语录”,仍然摘录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去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七版的一篇“永远要做群众的小学生”一文又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1959年4月16日“新观察”上的“在毛主席身边”一文,作者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

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要、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

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修正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党组的审查。当否,请予批示。

中央宣传部

1961年2月23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在这个报告上划了圈,并于3月15日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明确表示:“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此件发至县团级。

可以看得清楚,这个文件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陆定一当然不是也不会反对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提倡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方法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反对“言必称希腊”的,现在的毛泽东却喜欢“言必称毛泽东”,林彪主张的那一套可谓“正合朕意”。当时,这个文件的确是冲着林彪主张的那一套来的。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林彪为什么对陆定一那样切齿痛恨,毛泽东也非要把他打翻在地,把中宣部砸烂不可了。

二是说陆定一“是反对和限制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罪魁祸首”。基于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为保证质量而采取的措施,根本不是什么“罪行”,而且事情都是下面的同志操办的,现在要把账统统归到陆定一的头上,其罪名当然不能成立。

三是说陆定一“同赫鲁晓夫、彭真一唱一和,大反三面红旗,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说他攻击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精神”。“‘乱、糟、偏’,至少用一个‘乱’字。教育如此,别的也如此。”他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错误的,“搞得问题很多,不可收拾,纠正起来花很大力气”。他说:“自留地是个好东西”。“现在都提出翻案,胡风提出翻案,农民提出土地回家等等,这不单是富裕中农主张,中农主张,我们党内也有人主张。因为三面红旗不红嘛,搞得没饭吃。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改,这无产阶级专政都得翻掉。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拉科西。”“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还不够,可

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有一股风气,过渡到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少。客观地回顾我们过去的工作,有的是没有经验,有的是乱搞,只看到一面,没有看到第二面,理论水平是大问题。”“过去只讲成绩,不讲困难。这样情况再搞几年亡国就是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毛泽东语),这一个指头也真烂得差不多了,烂狠了也会死人!”“‘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长征时,最后,连电台都丢了,和第三国际失去联系,遵义会议才开得成。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一步,要到东西都丢光了,才能觉悟过来。”“要告诉我们的党员和儿子、青年,要准备倒霉,准备没有裤子穿!路线错了,要倒霉!”他“大讲三次‘左’倾路线的‘教训’,大讲反‘左’比反右难,大讲所谓历代‘亡国’的‘教训’,等等。”他提出:“1958年以后,中央犯了些什么错误,向干部讲清楚,你不讲人家也会讲的。把文件翻出来,看看讲了些什么错误的东西,讲清楚吸取教训,是不是路线错误。”他认为,我们党这些年来犯了“左”的错误,建议中央应搞个反“左”的文件。

四是说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的“反对派”,“是一个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大阴谋”。陆在这次大会文教小组会上有个发言,提出“党内不仅要有反对的人,还要有反对派”。“在桌面上做反对派是可以的,是好的。有时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唐太宗有一个魏征,就是专门同他作对立面的……反对派讲话,听起来味道不是那么好的。不是什么英明领导之类,而是戴点帽子,打点棍子。”他还提出要实行“新经济政策”,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斗争会上不讲事实根据,胡乱上纲批判说,陆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提出这样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直接为“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鸣锣开道,就是反革命颠覆活动!”现在,世人皆知,民主的基本内容或原则之一就是允许“反对派”,陆定一主张应当允许有“反对派”并不是一件坏事。1956年6、7月,他在部分省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自由这面旗帜完全拿到手”。他在部办公会议上说,我们的人民代表人大会是“议会”,“应该对政府唱对台戏”。他的这些意见,今

天看来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迫不得已,只好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但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指控,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晓得有什么反党集团”;至于什么“搞颠覆活动”,他说:“我既没有这个志愿,也没有这个胆子!”

批斗会上,陆定一有时不免满头大汗。当时有种说法,说是因为批到了他的痛处。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年过六十的他,在绝食的情况下,站在台上连续接受长达数小时的激烈的批斗,还不时有人上去强制摁下他的头,要他低头认罪,在不断的折磨下,他会不会有点虚脱呢?

说陆是严慰冰匿名信的“主谋”,攻击叶群就是攻击“林副统帅”、攻击“伟大领袖”

11日早上和中午,陆定一继续绝食。看守所所长急了。晚上陆定一还要参加斗争大会,若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经他一番好言规劝,陆定一这才勉强吃了几口上会。

当晚的斗争大会,又集中批判了陆定一在三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一是批判陆定一“疯狂攻击林彪”。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那件事。说从1960年到今年1月,“严慰冰用最恶毒、最下流、最反动的语言,写了数十份攻击林彪同志的反革命匿名信,其中半数以上是用明信片写的,实际上是在广泛散发反革命传单。”并诬陷陆定一说,严的这一切都是在陆的“指使下”干的,陆定一是严慰冰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谋者、指挥者”。至于匿名信的内容究竟如何,怎么“最恶毒、最下流、最反动”,仍旧一点具体情况也没有透露;陆定一怎么是她的“主谋者、指挥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只是说严慰冰写信时陆定一在家,因此他就是严的“主谋”、“主使”和“指挥”。对这种指控,陆定一矢口否认。

二是批判陆定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总根子”。大会说陆定一“一贯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文艺方向,反对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指示,指使周扬、林默涵在文艺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在文艺领域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主要“罪证”是,《文艺八条》是根据他的意见

最后修改定稿的;“文艺界的三股妖风”,即“反题材决定论”,“全民文艺论”,“大捧三十年代文艺”,都是从他那里刮起来的。他讲过这样的话:“对文学艺术来说,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文艺上要分有益、无害、有害三种。无害就是有益又有害。有益的,这是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的政策不能只是看到这些。我们还是要看到无害的东西,这是中间的。政策要从这里出发。”“让他们自由,有益无害。”“最大的格格就是不反对社会主义”,在题材、创作方法、流派上要给作家艺术家以“充分的自由”。他不赞成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说:“现在连戏剧也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吹毛求疵,搞得什么事都不能动。”“旧戏我看还可以演,演旧戏《蒋干盗书》,也是教育群众。我们还要借别人的头脑,甚至地主的头脑。”“光会斗人,这可危险。有的人一搞就给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帽子多得很,检讨,不行,再检讨,还不行……这是王明的办法。”“打击面越小越好。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要斗红了眼睛,不冷静。”“群众运动需要头脑发热。头脑发热就会发生片面性。”“不要搞得文章不敢写了,课也不敢讲了,动也不敢动了。”他讲出的这些,至今看来仍然没有哪一条不对,可在当时却同样条条受到了批判。就连他写于1956年的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全社会高度评价的著名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陆定一受到众口一词的声讨,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他已经看惯了、听惯了,你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懒得去作辩驳,他应付说:“我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不过,他又申明:“我文艺管得少,没有资格当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祖师爷。”不无几分幽默。

三是批判陆定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陆定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抓教育。他的主要思想是学制要缩短,中小学实行9年或10年一贯制教育,并就这方面的改革进行了一些试验,如创办北京景山学校等。他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有生产斗争的知识,学生要学会用脑来劳动,也要学会用手来劳动,这就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要多读书，绝对不能因为参加生产劳动，挤掉上课读书的时间。他从当时农村学生小学毕业后上不了中学，而农村又亟需农业技术人才的状况，提出了办农业中学的主张，两年后已招生200万，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主意。1962年8月，他曾签发过一个中宣部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综合报告，反映教育革命“降低了学生水平，有些学校秩序混乱，大伤元气”，强调学校要把重点放在搞语文、数学、外语，把政治课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在当时，这是一个重要举措，一直影响至今。此刻，陆定一处于被告席，谁能想到呢，他



1960年4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二次会议作《教学必须改革》的报告。

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居然也成了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陆说：“在教育上想搞一个传至万世的东西不可能。对教育方针有不同意见，在党内是可以的，在党外也允许反对，不能压。教育方针要靠子孙做结论。”会上批判说，这就是“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陆说：教育有“双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培养接班人，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二个目的是提高国家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等。”会上批判说，这就是“妄图培养一批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陆说：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贯彻自觉自愿的原则，“不要强迫命令”，“不要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不要搞大呼隆”。会上批判说，这就是“极力反对学校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陆说：“学校和解放军不一样，学校要求不能那样严格，吹一声哨子就学毛选。学校的政治工作不能照抄解放军的。”会上批判说，这就是反对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陆说：“没有立，就不要破”，1958年教育革命是“乱、糟、偏”，打破了学校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比不上北洋军阀时代和国民党时代的好学校”。会上批判说，这是“恶毒攻击

教育大革命，千方百计维护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陆在1960年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中提出：“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毛主席指示教学要“少而精”，“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他认为“少而精究竟怎么样，少到什么程度？怎么少而精？”“课程改革，第一要专家觉悟，第二要掌握分寸，不要搞得‘左’了，‘左’了不行。”会上批判说，这是“明目张胆”地“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公开反对毛主席”。再就是批判陆定一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陆说过“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

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要向知识分子学习。会上批判说这就是鼓吹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搞“阶级合作”“国共合作”，“妄图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统治我们的学校”，等等。

熊复在大会结束时讲话说：“陆定一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是妄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颠覆我们这个作为世界革命根据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把我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三天的斗争大会证明，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热爱毛主席，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新的阶段，彻底把陆定一这个反党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捣毁阎王殿、建立新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宣部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时下惯用的那套阶级斗争的恶话、狠话、大话，程式一步不少，套话照说不差。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陆定一这出大戏到此结束，以后部内再也没有开过批斗他的大会。■

（作者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民生公司被公私合营的过程

○ 赵晓铃

1950年，民生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950年春，民生公司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战争对交通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1949年有8个月，民生公司在长江中下游全无收入。面对巨额亏损，公司并未大规模裁员，船员们团结一致冒险保护公司的船只，平安撑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民生公司还有一沉重负担就是外债。1946年，由国民政府担保，民生公司向加拿大银行借得1275万加元，造新船9只。新船造成，内战已开始，多未投入运营赚钱，而合同规定，1949年下半年开始偿还利息。利息每季度需9万5千加币，合美金8万多。

民生公司的18条最好的船在香港，或航行于香港广州之间，或在南亚做运输，以维公司生存。卢作孚不得不在香港与各方应酬，他不能公开与台湾撕破脸，否则这些轮船会被强行劫到台湾。而且，加拿大还没有与新中国建交，一旦台湾不肯为民生公司担保了，又还不出钱，债权人也有权拍卖这些轮船。

重庆解放不到半月，民生公司便恢复了航行。然而，能开出去船，却没有足够的业务。主要任务是替政府运粮到上海，粮食属三类物资，运价低，还要打七折，从上海回来没有业务，上游又催得急，轮船只好返空。为了安全，空船装上沙子压舱，还要花人工费装卸。但是国营企业就有业务。长航的前身，即轮船招商局任务饱满，还有运价高的一二类物资。那时运成渝铁路的物资，招商局运钢轨、枕木，机车这种装运困难不好运的才给民生运。

1949年12月19日，重庆军管会公安部派员

进入代总经理郑璧成家中，将他扣押。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周吾达对此事的书面报告为，“总公司船务经理郑璧成12月19日在其住宅被公安部传讯，系因伪市长杨森将衣物21箱寄放存公司未报，因其为代理总经理职务关系而受影响”。公司事务课职工朱心培，也因为运送杨森衣箱而被捕。郑璧成却认为，重庆解放前夕，杨森奉命破坏重庆工厂码头，卢作孚说服杨森，大大减小了破坏，为杨保管衣物没有什么错。这种不合时宜的认识，让这位精通航运的高级管理人再也不能回到当时特别需要他的民生公司工作。

代总经理被扣押在民生公司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卢作孚立即电令在上海的副总经理童少生和武汉分公司经理李肇基到重庆主持总公司工作。

军代表很快派进民生公司，发动工人成立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1949年以前的工会被视为黄色工会，解散了。新的工会只有工人参加，职员（即白领工人）、船上高级船员、船长轮机长都不能参加。一些低级职工，过去几年里因为公司困难，确实在转正提薪福利方面欠了他们的债。比如船上的西崽，是为船员服务的，也是临时工，过去会定期考试转正，现在好几年没有转正机会，工作辛苦，待遇不如人，本来就不平衡，军代表告诉他们，这是阶级压迫。有八百练习生，过去闹工资没有达到目的，被公司处理了几个领头的，也翻这个案，要求提薪。工筹会动不动给公司写个公函，要求公司给经费，给独立的办公室，给装电话，差一点都不行。有一位老民生人回忆说，那时的工会就像文革中的红卫兵，对于当时的工会积极分子颇有微词。

郑璧成被解职，管理干部人人自危，不敢管理，事故越来越多。后来统计，从1950年到1952年，两年有500多次海损事故发生。比战争时期还严重！资金困难，债务如山，业务不足，劳资矛盾，

每月亏损,出事故还得赔钱,民生公司雪上加霜。

1950年2月,民生公司总公司急电香港:公司已发不出工资了!卢作孚赶紧在香港借钱汇来。3月,仍然无钱发工资。不仅发不出工资,还没有钱修船,没有钱买油买煤。过去发生资金困难可以向银行界伸手,尤其几家民营银行,对卢作孚的事业很支持。现在不行了,新政府已控制了金融。

卢作孚反复思考,并与董事会商议,明确了一个拯救民生公司的重要举措,那就是尽快确立公司与新政府的关系——实现与新政府的公私合营,取得生存的权利。3月,卢作孚即派出代表何迺仁到北京面见周恩来,商谈民生公司的情况,并提出公私合营。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离开香港,尽可能秘密地北上。

一个协议,两种理解

民生公司早就是一公私合营企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想控股民生公司,宋子文控制的中国银行想,孔祥熙控制的交通银行也想,结果是他们都投资了民生公司,但都不能控股。

据1950年初的一股份调查,民生公司总股份是80万股,其中真正的官股占20%。一共四家,其中没有一家的股份能超过民营银行金城银行:

中国银行	81062股	(占10.1%)
交通银行	57150股	(占7.1%)
四川省银行	12750股	(占1.59%)
川康兴业公司	10000股	(占1.25%)
金城银行	132705股	(占16.5%)

这些官股加上没收的战犯、反革命的私人股份,就有了近30%的公股。

民生公司董事会有25个董事。其中有4个公股董事代表这些公股。

8月10日,卢作孚和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协议写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公司曾吸收了一部分官僚资本与豪门战犯的股金,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川康银行,四川省银行,及宋子文、宋子安、张群等之股金。解放后,人民政府亟应接收官僚资本,参加公司管理。现经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与民生公司数次磋商,具认按照该公司目前情况,即应改组公司组织,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前,实行过渡办法。过渡办法就已改组了董事会,即由人民政府派公股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公股代表暂参照董事会原有之公股董事(四名)及战犯股权之董事(三名)名额暂为七名,若实派不足七名时仍具有等于七名董事之权益。”

新的公股代表并不是简单地替代过去的公股董事。过去公股董事不直接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现在公股代表要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监督,参加公司经理部门工作。卢作孚企望这种对公司制度的突破,能让新政府通过公股代表了解公司,以协调公司和政府的关系,使公司能够得政府帮助,并协调公司的劳资关系,做好管理工作。

这个协议及过渡办法是卢作孚们在交通部会谈以后拟定的,交通部基本上没有修改,只



公股代表与董事会

增加了几个字(黑体):“公司资产负债清理完毕及股权审核确定经董事会通过并呈请人民政府核准后即召开股东大会提出报告修改公司章程改选董事,正式成立公私合营之公司”。正是“呈请人民政府核准”这几个字,后来让卢作孚非常被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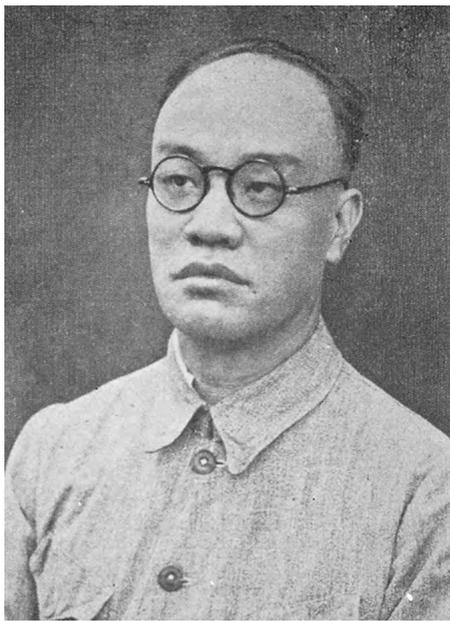
公私合营后任民生公司总经理,不久又兼任董事长的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在40多年以后写回忆录说,“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思想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然而,当时没有人坦率地把这个意图告诉卢作孚。

卢作孚从北京回到重庆后,召开了公司的业务会议,把协议书和过渡办法印发各部门。业务会开得热火朝天,各部门都出主意,想办法,按协议的要求,清理资产,清查股份,提高效率,节约资源。

这时公股代表已经部分到位,只参加会议不发言,主要是了解情况。但他们是带着严重的敌情观念进入民生的,他们时时留心卢作孚一言一行,说卢先生在宜昌对船员讲话,是拉拢,是宣扬阶级调和。首席公股代表后来在北京汇报说:“由于解放以来民生公司没有贯彻改革,反革命分子猖狂进行活动”,“该公司内部极为复杂,封建把头,特务对我的事业在极力破坏。”

7月1日,公司就在交通部派来的公股代表协助下拿出了公司财务的总盘点报告,但1950年过去了,民生公司没有实现公私合营;1951年,卢作孚几次到北京谈公私合营,政府仍是不批准,民生公司仍然得不到足够的业务,而且劳资冲突加剧,事故不断,只能靠贷款吃饭和还债。贷款却越来越难,各银行的借款合同可谓霸王条款,民生的轮船,



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

库存的材料都成了抵押品,抵押品的损失,运输,保管还要民生负责。卢作孚的相当部分精力就是跑贷款。

公股代表在民生公司的阶级斗争中起主导的作用,表面上却是公司高管的朋友。他们对公司工会的指导是通过市总工会来进行的。从1950年初开始,工会领导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当时的工会有权干预企业的人事变动,几个月内由解放军陆续撤换了护航队长及各船的护航队员,又以工会的名义,一个个地清洗撤换了人事部门的经理和干部,由解放军一位师长做了人事室主任,

人事问题上完全架空了卢作孚。

不断的政治运动,镇反,民主改革,清洗了大量的老职工。搞得民生公司,尤其是高管和白领们,人人自危,船员普遍不满,工作消极,所产生的事故和损失,后来都被视为反革命事件,成为阶级斗争的理由。公股代表甚至提出要清洗邓华益、李肇基、何迺仁几位高级干部,卢作孚忍无可忍,当面反对。保住了李、何,邓华益仍然以年迈被“资遣”(遣散前多发一月工资),一家人从民生新村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努力只保住了邓家部分房产,使邓家老小不至流落街头。

特别让卢作孚震惊的是陶建中的冤案。

重庆“三一三”大镇反中,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被捕。5月,陶在机器厂青草坝开大会后被当场枪毙。陶建中,是公司第一条轮船民生轮的经理,创办民生机器厂时任厂长,作家李劫人来了,他让李做厂长。抗战,江南造船厂有名造船专家叶在馥来重庆了,为了这些人才得其所,陶厂长又让位。战后,人家走了,业务也走了,机器厂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陶又接下来。这样的好人竟在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机器厂江边被冤杀,还组织总公司职工参加公判大会受教育。一职工看到陶脑浆迸裂的情景,回家几天吃不下饭。当时,还让卢作孚坐在主席台上!始料不及的卢作孚为此公然质问公股代表。1980年代,陶平反。

卢从香港回来一重要目的,就是想保护民生



報載盧作孚自杀

人少受阶级斗争伤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他已尽力。可他不但不但没能保护,还要亲手签字清洗民生护航大队的队长队员,开除整肃他的老友,他事业的重要骨干……他曾对邓华益说:“华益,我对不起你!”

到1951年11月,重庆开展“民主改革”大检查。这“民主改革”仍然是肃反,清洗。经过镇反,肃反,“民主改革”,民生职工队伍受到严重伤害,懂行的管理干部越来越少。《重庆日报》还在头版刊登文章,批评民生公司的民主改革不彻底。民生公司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贷款却越来越难。到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认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已经不肯给公司贷款。12月,又让卢作孚担任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员会主任。

2月5日,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长寿附近失吉。

2月6日,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

2月8日,卢作孚参加了民生公司召开三反动员大会,会上,卢作孚的服务员揭发公股代表在北京由卢作孚招待便饭等,是受贿,是中了糖衣炮弹。

这天晚上,卢作孚在家里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停航搞运动：“以肃反为主清算经济为次”

1952年2月25日上午八时半,民生公司召开民主改革运动船岸动员大会。首先由西南交通部部长穰明德做报告,报告着重指出:民生公司由于

内部组织不纯,在每一运动及生产中,都遭受反革命分子及特务分子从中破坏,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人民国家的利益,坚决镇压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特务分子。继由公安部欧处长报告,并在大会上当众宣布,“于2月24日将隐藏在本公司的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专门从事反革命破坏的李犯邦典,周犯雁翔,李犯强楷,尹犯林等逮捕归案”。

自此,民生公司的政治运动全部转入“清反”,即清理反革命,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除长江中宜昌以上的航运有少数职工轮流坚持生产外,民生公司在重庆、万县、宜昌、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各分支机构,长江宜昌以下航线和华南航线都停航搞运动。

民生公司华南区公股代表在职工代表会上明确说,“我们是三反镇反民改三个运动结合进行,而且主要的要求是肃清反革命分子”。“一举而解决三个运动的要求,内外问题交叉进行,这是由于民生公司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而且,“由于许多原因,一开始斗争炽烈,规模宏大,很快即深入到集中力量打击反革命分子,群众要求主要是解决政治问题”,“采取的方针——以肃反为主清算经济为次”。

卢作孚万万不可能想到,他的死,也被怀疑是特务破坏,成为推动政治运动的一个理由。卢作孚身后的民生公司,终于成一阶级斗争战场。

有关运动的汇报材料上写着,民生公司“船岸高级人员没有改造,工作不负责任,抱敷衍塞责得过且过态度,广大员工觉悟不高,工会成分不纯,被少数坏分子把持,存在着严重的单纯福利观点,形成无政府的状态”。“政治派别,封建帮会很多,参加反动组织和封建帮会的占很大比重,如:上海在1063人中已查出参加者上述组织的631人,占59.36%,内特务34人,反动党团241人,反动会道门59人,帮会297人,以青年党和青帮在职员中或船员中占比重较大……重庆参加清反人数2303人,逮捕法办的22人,管制和集训的105人,群众管制38人,拟清洗16人,坦白免处25人,此外自杀16人(内有二人未死)失踪1人,共223人,占参加清反人数9.24%。连同前镇反中逮捕44人,集训89人,总共现已清出反动分子

356人(船上240人,岸上116人),此工作船上尚未结束。”

“特务破坏活动严重,1950年上半年修理费301亿,因海损的意外修理临时修理占70%,民来、民康二轮,因特务破坏修理费即53亿,三反中民铎、民恒又被破坏(内沉没一只),二年来由于海损引起的损失非常严重,只1951年上半年赔偿达11亿,抚恤费18亿,海损的结果除增加修理赔偿,减少船只运转外,同时也降低信用,影响了货源。

“贪污现象严重,据上海参加三反的697人中,有贪污行为者605人(其中有200人已批准摘掉贪污帽子亦统计在内)不足1000万者550人,共贪污6亿;1000万以上者55人,共贪污19亿,共合计25亿。贪污人数占86.8%……

“制度紊乱,重庆总管理处管理费85%没有预算,整个公司管理费超过……审核没有统一规定,燃物料收验不严格,器材储存盘点无制度,船上燃物料配发无清单。修理船只无计划,无检查、监修、验收制度,予坏分子与奸商造成贪污舞弊的机会,形成严重的浪费与亏损,盲目发展不事企业经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制度与作风。”

汇报提出的对民生公司的改革方针是,“民生公司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为发挥现有船只及设备的潜在能力,必须贯彻:‘三反’‘清反’‘民主改革’,将现有庞大臃肿的组织机构,与陈旧不堪的经营管理加以彻底的改革;改造组织领导成分,依靠工人阶级进一步整顿内部,清除反革命特务分子及封建把头,裁减冗员;清理债权债务,审查股权及资产核定资金,逐步推行经济核算制,履行增产节约,在国营企业领导下基本上为完成川江运输任务而服务。”

改造民生公司“所需的干部,除此次‘三反’‘清反’中各地党政军财委已派去者,原则上不再抽回外,尚缺少者主要依靠各地党政与财委负责在本年内分别分期调派充实。工会领导干部由海员总工会负责调派”。

1952年5月22日,交通部召集民生公司公股代表在京开会,汇报卢作孚去世后民生公司政治运动情况。重庆由首席公股代表汇报,民生公司1951年12月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三反”、“清反”运动,1月21日正式转入“三反”。卢作孚去世以后,2月14日,转入“清反”。到4月15日,机关“清反”结束,

又开始“三反”运动;而船上(长江部分)在5月10日结束“清反”转入“三反”。在“清反”运动中,清出反动组织116种,在长江轮船上的“清反”共搞了两个半月,特务有8次破坏未遂,清出反革命及嫌疑分子223人,占总人数的9.2%;机关比例大一些,清出反革命占总人数11%。“三反”在机关的重点是工会经费、办公用费、劳保基金等,船上的重点是反贩毒、反走私黄金等。

武汉公股代表汇报,所辖船上岸上共1206人,内部情况复杂,汉口货栈98人中,反动党团分子占45.8%,宜昌94人中,有三个特务组成“反共义务队”,还有军统长江情报联络处,宜昌工会7人中,有6人是特务,1人是贪污分子。在镇反中,还与台湾联系,发生海事24件,赔款2400万元,有4名船长在反恶霸斗争中被捕……船舶调配不合理,损失巨大。

上海公股代表汇报,上海民生岸上405人,船上806人,“三反”由华东交通部领导,先计划打“虎”15只,经过6次战役,打虎共42只,其中贪污一亿以上的5只,有201人坦白后摘了“贪污”帽子,共贪污8亿5千万元。

一次笔者在老民生人聚会上,说起档案里的数字,感到当时的运动打击面太大。不料老先生们说,不对,档案乱写!哪里才止那一点?当时一个船就跪倒十几二十个呀!还跪煤炭渣渣!

1952年6月10日,交通部又召集民生公司公股代表开会。

这天,首席公股代表汇报的内容有:现在民生公司董事会会有董事37人,其中公股代表9人,其余28人中,被镇压死掉的5人,有3人可以肯定是反革命分子,1人已坐狱,还有4人情况不清楚。因此,应该重新审查董事,我们的意见是政府派人补充进去。

公私合营:“共产党有办法”

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第二十四届第十七次董监联席会在民生公司大楼召开。

会议一共七个议案,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是“追认增加资本案”:

“由于连年亏损负债日增,截止一九五二年七月底止负债额已达一千二百三十五亿余元(香

港三十亿未列入)”“本公司请求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投资壹千亿元已蒙批准,业将此款作为偿还国家欠款私营企业欠款及今后必需的开支款项。”

第二是改组董监会。1949年以来,公司董事监事确实有好些缺额,政府增资以后,公私股权比例已有改变。所以“公股代表除原有六人外,已请由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加派公股代表十人参加董监会”。

新的常务董事会,以公股代表五人,私股代表四人组成之,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四人,由常务董事互推之。会上当即选出九名常务董事:

公股方面五人

- (一)李一清(中南财委会副主任)
- (二)刘惠农(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
- (三)张平之(交通银行总经理)
- (四)张文琦(长江区航运局副局长)
- (五)欧阳平(中央交通部参事)

私股方面四人

- (一)周孝怀(原公司董事)
- (二)郑东琴(原公司董事长)
- (三)吴晋航(原公司董事,和成银行总经理)
- (四)康心如(原公司董事)

推举周孝怀任董事长,李一清、张文琦、郑东琴、吴晋航四人为副董事长。看上去,民生公司有个常务董事会,实际上的决策权已完全转移到执政党派来的干部手里。

会议聘请刘惠农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昂、童少生、张文治任副总经理。这里,刘惠农作总经理又兼公司常务董事,是民生公司史上没有的事情。没有人提出异议。

会议还“决定”,“为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执行长江航运计划,便利领导,统一管理”,又将总管理处改回总公司,并将总公司迁设汉口。

1952年9月5日下午3时,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在重庆市搬运工人大厦召开,新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刘惠农在会上致答词,保证实现民生公司同仁的希望和中央人民政府给予的任务,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建立经济核算制,降低运价,增加运量,争取短期达到收支平衡,有盈余上缴,还能分

给股东红利。

新任董事长周善培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公私合营使民生公司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若不投资1000亿元来帮助公司偿还债款,公司就有可能关门破产。现在公司复活了,新生了,是否能从维持到发展,从原是政府的包袱逐步做到为经济建设作出贡献,重要的关键就是改造,而公私合营就为改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位一向为卢作孚尊敬的老人,在公开讲过这番话后几个月即辞去董事长职,后来在“肃清卢作孚思想统治”的思想改造中,有人汇报他讲“公私合营是共产党的紧箍咒”。

刘惠农的承诺很快实现。当年9至12月,民生公司的亏损停止了,不但做到收支平衡,而且在四个月内盈利120余亿,竟然扭转了枯水季节亏空的局面!让股东们在多年没有分得股红息以后,在公私合营后的当年分得股红息4厘,股东们惊叹:“共产党有办法!”在报上广为宣传这一点时,人们并不知道,其时民生职工“自愿”大幅度降薪,高中层职工的工资有的降了50%!副总经理童少生,因为夫人长期患病,后来不得不经常悄悄变卖家中衣物,一般职工的生活,必也受到影响。

合营后,各地党政机关派进民生公司干部389人,担任科级以上94人,其中党员82人,在总、分公司的处室、科、厂基本上配备了骨干,掌握了领导权,对资本主义企业和人的改造,作好了组织准备。

合营前民生公司“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高级职员”共139人,其中逮捕法办,即杀、关、管的就有21人,“畏罪自杀”3人(总经理卢作孚和两位主任),病死1人,作为冗员处理13人。余下100人中,只有22人相当于原职,47人降职使用,31人未定职。

在22名安排为高中层的干部中,原副总经理童少生和原总工程师张文治做了副总经理,还安排了20名中层副经理。但不论这些人表现如何,是不能够参加工会的,甚至不能参加某些高层的业务会议。原广州分公司经理周寰轩因为被允许参加了工会,公司负责人受到追究。

1956年6月20日,国务院批准,民生公司正式与长江航运局合并,纳入国营轨道。■

(作者单位为重庆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黄 钟)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 洪振快

1958 - 1962 年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近年,出现了否定发生大饥荒的思潮,有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的确,历史上一旦发生大饥荒,农民为了活命,会抢粮,骚乱,乃至爆发起义,历史上不乏这类记载。在 1958 - 1962 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农民的抗争与历史有所不同,但这不等于说历史上发生的事在这几年间完全不存在。事实上,在据档案编纂的地方志中,对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也有所透露,而在档案和当时的新华社内参中,则有更多的详细记录。

饥荒中农民为活命所作的抗争

河南信阳专区在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上百万人,农民遭受惨酷对待,光是“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被称为“信阳事件”。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后来撰文回忆说:“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① 信阳如此,其他地方是否也都是这样呢?事实是,面对死亡威胁,全国各地的农民并非都像张文所说的那样等死,而是采用了各种抗争方式,包括自杀、逃跑、偷盗粮食、哄抢粮食乃至“暴乱”等方式,以下简要介绍后三者。

(一)偷窃粮食、偷青吃青

大饥荒期间,由于缺粮,农民被迫偷盗粮食,在粮食未熟时就偷青吃青,此类现象非常普遍。

1959 年 5 月,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谭启龙向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并书记处报告,并请转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由于粮食紧张,吃青现象已经发生。巨野龙固公社 115 个村有 77 个村吃青,已挖掉扁豆苗 3904 亩。”1960 年 9 月 2 日新华社内参说:“据山东省委生活办公室和省公安厅了解,近来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偷青吃青现象,有些地方的早秋作物已被全部吃光、偷光。”“胶县有些地方 80 - 90% 的人偷青吃青,部分社、队,不仅玉米已大部分被偷光吃光,而且黍子、谷子、地瓜也已被偷吃掉 50% 以上。全省自 7 月以来,共发生群众性的集体偷青吃青 160 起,而 8 月 1 日至 20 日即发生 102 起,其中干部带头偷的有 25 起,五类分子煽动起来的有 11 起,群众集体搞的 70 起。”^②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 1960 年 7 月 25 日的一份报告说,南溪县裴石公社“在夏收中又继续发生严重的偷盗混乱现象。全社 646 亩早包谷,已被社员拿去 251 亩,占 39%;未成熟的高粱已被社员割去的共约有 6 亩;早稻已割去谷穗的共约有 8 亩之多;拿小菜的现象更为普遍。新花管理区的新花生产队和新胜管理区的新兴生产队的食堂蔬菜地上的蔬菜,长一点,被社员拿一点,蔬菜种不起来,种菜的人不愿种了,食堂没菜吃。”

四川省粮食厅办公室工作组 1960 年 4 月的一份报告中说,荣经县附城公社偷吃青苗现象严重,“全社 490 多亩油菜偷窃一光,豆尖、葫豆夹、小菜、洋芋等,见一样偷一样,小春作物除小麦外全部糟蹋过。红苕白天种下,晚上又淘出来,偷的人也是种的人。”

《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载:1959 - 1962 年,“发生强制性的乱拿、乱摸和强收强取粮食、请愿闹事、人口外流等现象”,“60 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盗窃粮食和宰杀耕畜的案件大

幅度上升。1961年立案25623起,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三点九七。其中盗窃粮食(13883起)、宰杀耕牛(5022起)就有18905起,占73.8%。”³

安徽偷青吃青和哄抢粮食情况也很严重。《安徽省志·公安志》记载:“因生活所迫,农民偷割青苗和未成熟的庄稼(以下简称偷青吃青)的现象比较普遍,尤以1960年春至1961年春最为严重。据皖南郎溪等14县统计,1961年4月,数十人纠合一起偷割抢割未成熟的小麦穗、豌豆荚等达数百起,割去青麦穗、豌豆荚2万余斤。皖南白茅岭农场附近的社员成群结队到农场割青偷青小麦达2300余亩。这种情况,皖北亦比较普遍。霍邱县周集公社经常发生数十名社员手持火把,在夜间偷割青麦穗。为减少粮食损失,中共安徽省委于1961年5月3日发出《关于护青的紧急通知》……同日,省公安厅向各级公安机关发出《关于加强午收保卫的指示》……专、县公安机关和公社、大队都要建立护收护打领导组织……及时处理偷、抢粮食事件……对群众性哄抢事件,不得采取武装镇压”。“不得采取武装镇压”,恰恰说明采取过“武装镇压”。文件下达后,各地护青领导组织普遍成立。“各地在护青中,亦有少数干部及护青人员发生违法乱纪现象,对查获的偷青吃青人员乱打乱罚。据统计,至1961年5月中旬,全省发现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18起,打死、打伤各1人,受到批斗、搜查后自杀7起,死6人。偷青群众亦打死护青人员2人,打伤6人。”公安厅于5月21日再发通知,要求“在追缴被偷实物时,主要通过说服,使其自觉退出,不得擅自搜查,严禁翻箱倒柜”,“不准打人、骂人和刑讯逼供,不准动用武器开枪打人”,而这些要求说明此前存在刑讯逼供、开枪打人等现象。”⁴

1960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河南、河北、山东来看,吃青相当严重,早秋作物,主要是玉米,也有高粱、地瓜等,吃的相当严重。据山东估计,在1200万亩早秋作物中,被吃掉的将近200万亩,吃掉一成两成的是比较普遍……山西、河北没作典型调查,但吃青还是严重的。另一份报告说:在河南信阳专区上蔡县,1960年7月,“全县396个大队,有348个开始吃青,食堂有的停伙,有的

靠吃青维持,不少地方高粱、玉米、瓜菜吃光,人口外流,肿病死亡的情况严重”。

铁路运输中,粮食被盜现象非常普遍,即便是北京都是如此。1961年1月20日,铁道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近来,粮食在铁路运输过程中被‘抢’被‘盜’事件,日渐增多。”北京铁路局所属系统所装卸的粮食被“盜”事件,从上年9月到12月发生1271起,损失粮食160829斤,本年1月1日到5日发生81起,损失粮食14526斤。

在大饥荒期间,有些干部对偷窃粮食、偷青吃青的处罚非常残酷。

四川省委一个检查组的工作报告(1960年4月18日-11月2日)中提到:泸州地区各县有些基层干部“在对调工、吃青、私拿和偷窃等问题的处理上,则采取扣饭、罚款、没收东西、搜查、罚跪、斗争、集训、劳教,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拘留、逮捕”。“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区第6生产队今年以来,因吊打致死的即有4人。如贫农魏明英,今年2月份因其女明远(7岁)拿了社里7个红苕,队长罗志文等2人得知后,将魏吊打要其承认是他自己偷的,经吊打2小时,次日逼其出工,后又扣饭3天,致使该魏死亡。”“因本身有小偷小摸行为,被干部怀疑为盗窃,而吊打斗争、扣饭的28人。如太平区高星公社民主小学教师范朝文3月中旬看到社员王恩文扯了一把菜,即组织学生吊打,该王被吊打后,逃到古蔺县城死于旅店房内。”1960年12月,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乔志敏向省委报告,在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生活安排得不好,群众吃青现象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海清即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布置:凡是有偷盗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公开在会上讲,“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甚至在干部会议上讲“对偷吃东西的人用机关枪去剿”。

贵州,中共遵义地方监察委员会1959年7月21日印发的一份报告中说:“某些基层组织或干部,对因口粮短缺而出现的社员私摘公社苞谷、蔬菜等行为,不采取主要是说明教育的方法去制止,而是粗暴地一律戴上‘小偷’的帽子,或者罚工、罚款,或者施以酷刑;严重的导致人身伤亡。”所举的具体例子,如习水县长沙公社石笋管理区

有一个姓袁的社员摘社上的苞谷,被抓来捆绑一夜,不给饭吃,第二天放回后,走到管理区附近就死去了。据七个县初步统计涉及摘公社苞谷、瓜菜而无辜身死的有7人,逃跑1人。仁怀县在7月中旬即死两人:一个被民兵用枪打伤在苞谷地里,伤重死去;一个青年妇女由合马到茅台赶场,途中偷摘4个苞谷,被群众发现,追至茅台河边,投河自杀。

山东,1960年9月2日新华社内参说: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全省从7月初至8月20日共发生各种违法乱纪事件4122起,造成人命事件201起,死190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8人,民兵鸣枪击毙11人,自杀的173人。这些违法乱纪事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处理偷青吃青中发生的。平邑县林建公社社员徐文选,因偷了四个高粱穗,被生产队干部活活打死。蒙阴县旦埠公社旧寨生产队社员于宪年之妻(57岁),8月9日因偷了12穗玉米,被绑在柱子上进行拷问,家中两次受到搜查,锅筷等物被全部没收,自留地上的100多棵玉米被全部拔去,以致上吊自杀。

广东,中共广东省委1960年9月24日转发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向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干部违法乱纪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小偷小摸时乱斗乱罚,逼死人命”,如钦县大寺公社屯首大队社员苏增齐,因有偷窃行为,被支部书记李美风带头殴打,当场打死。有的地区在省委宣布不准打人以后,又出现了灌冷水、烧头发、蚂蚁咬、游街示众等不少新花样;有的地区还有强迫小偷吃猪屎、吃泥沙的。

(二)哄抢粮食

大饥荒期间,抢粮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山东,1959年4月11日,省长谭启龙从济宁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省委书记处写信,并请转报党中央、毛主席,信中说:“由于措施失当,生活没有安排好,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有的结伙持枪到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3月22日,金乡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两旁劫车抢粮。”5月12日,新华社内参报道山东省菏泽县马岭岗公社抢粮事件,认为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抢粮事件”,“前后涉及五个管理区的6000多人,抢走粮食42500斤”。“现在这一事件

虽已暂时平息,大多数的村庄群众已开始进行生产,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变天思想还很突出,谣言很多,谢集、赵庄、三教堂、白杨张等村群众,仍是不参加生产,风势不正,有一触即发的危险。”5月31日,谭启龙给济宁地委并西部地区各县委写信,说马岭岗公社“春节前后,社员交到食堂的粮食已经用完,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情绪不安,有的准备外流,有的酝酿抢粮”,“春节以后局势更加紧张,到处闹粮紧,80%的户数要国家供应粮食,大批劳力外流,近千头牲口死亡,水肿病发展到1800多人,扒树皮、吃青苗现象很普遍,社会秩序混乱,抢粮闹事此起彼伏。”

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记中多次写到抢粮和恐慌:12月12日,“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12月18日,“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12月27日,“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粮仓库的事件。”1961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接汪行远秘书长电话,传达周林书记在京开会的意见。他对当前贵州发生农民抢粮的情况十分忧虑,要省委的同志谨慎对待,万不可慌乱。”²⁵周林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

1961年1月11日新华社内参报道贵州不断发生抢劫偷盗粮食事件:“最近,贵州许多地区不断发生开仓分粮、结伙偷盗抢粮、粮车、粮驮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60年11月以来,全省发生开仓分粮和偷盗粮食事件532起,被分和被抢劫偷盗的粮食80多万斤。另外抢单家独户的粮食事件也发现23起。”遵义地委1961年1月向贵州省委报告说:“偷粮、抢粮、偷杀耕牛的现象不断发生,(1960年)12月份,全区共发生抢劫案25起,不完全统计,偷耕牛3000起左右,杀牛1500只左右。至于个人、几个人偷菜、抢吃东西的现象就更为普遍。”

辽宁,前述王民三在1961年1月28日的日记中写到:“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讲到辽宁省的情况,全省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万多起。沈阳

学生吃不饱饭举行罢课,有的绝食斗争。农村吃粮标准只有二两。”⁶

吉林,1961年2月11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报告:“农村偷盗粮食的现象相当普通,个别地区还发生抢国家粮食的事件。”

安徽,《安徽省志·公安志》总结说:“经济困难时期……哄抢事件尤其是哄抢粮食、食物的现象多有发生。芜湖专区12个县,仅在1960年12月,就发生了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达3.6万余斤。1961年1月至2月,全省又发生哄抢粮食65起,抢走粮食、山芋等6.2万斤……直至1962年春,哄抢粮食事件仍有发生。”“哄抢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较大的地区。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市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22起哄抢事件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多数是由于群众生活安排不够落实。”1961年5月7日,省公安厅、粮食厅联合向安徽省委报告,要求各地公安、粮食部门做好工作,开展护粮,制止哄抢,办法之一是“对为首分子,秘密监视,不让哄抢事件发生”。⁷

甘肃,张掖地区,由于征购过多,在1959年上半年,“全区粮食供应已经出现严重缺口”,“哄抢粮食的事件时有发生”。⁸ 武威市,1960年1月20日,“全县万人以上的饥民拥上火车站,哄抢铁路运输物资,其后还发生过抢粮、抢物事件”。⁹ 196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和兰州铁路局联合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铁路运粮的车被抢、被窃十分严重。据统计1-11月共发生案件782起,其中抢夺、偷粮436起,损失成包粮食13.3万斤……在这些事件中属于二三人零星搞的595起,属于数十人成群上车抢夺的187起。在陇西、高台、武威等地,经常有数十人,最多有200多人,迂回车站附近,伺机抢窃。¹⁰ 山丹县,1960年11月,县内发生多起哄抢事件。东乐、位奇、陈户3所粮站,城区屠宰场、食品厂被抢。¹¹

1961年1月20日,铁道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本年1月1日,在北京铁路局所属南大寺站的1062次列车,因挂有装载大豆的车辆,没有看守,发生了20多人哄“抢”的事件。兰州铁路局所属各站,如武威、清水、临驿、高台、乌江集等地更为猖獗,大白天就公开“抢”粮。例如:武威站

附近的武威、新仁、景塔、景阳、景场等公社,每天有五六百人集伙“抢”粮,1月份的10天内发生29起“抢”粮事件。1月5日武威站停的4278次列车,挂有大米一车,被90多人“抢”走90多袋,计18000多斤;1月8日在高阳站的2495次列车,挂有去峡东的七车玉米面,被百余人集伙“抢”走600多斤;1月9日在文珠站停车上水的2451次列车,挂去玉门的高粱米一车,被文珠公社第五大队第十一小队队长马子如带领的20多人,牵着两匹骡、马,集伙“抢”走4000多斤;1月5日在陇西站东闸口进行调车作业的1813次列车,挂有去兰西的大米车,被十余人“抢”走6袋。这里每天有二三十人,手持刀子,待机扒车,把成袋的粮食扔到路基旁边然后运走。1月16日,兰新线太平堡站被百余人,手持刀、棍,赶着大车,“抢”走2万多斤玉米,公安人员无法制止。1月19日夜和20日白天,武威地区先后有8000多人,到武威车站去“抢”东西,计“抢”走大米2000斤、红糖5000斤、活羊146头等。结伙拦机车不让开车,武威县长和公社党委书记进行制止时被打。

甘肃省公安厅于1961年1月24日晨8时30分向甘肃省委、西北局政法组、公安部汇报:元月以来,我省铁路沿线,特别是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等车站和一些错误、困难严重的地区,群众性的抢劫事件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生500多起,损失粮食近百万斤……涉及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全局动荡,社会混乱。大部分县、市和车站都发生了问题。武威车站由上旬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到20日增至四千多人,由小偷小摸到成群结队地公开抢劫,以至发展到整个列车被劫。张掖市的平安垦粮站,被2000多人从20日晚11时直到21日晨8时,抢去粮食165000多斤,打死群众一人,看守人员被伤一人。该市建堂大队240多人于16日手持刀棒,赶车九辆,抢去太平堡草站包谷2万多斤,又有140多人于18日从这个站抢走红糖5000多斤、棉花20多包、军用枪械零件两箱和旧军装300多套。许多人穿上军装,徘徊车站周围,被误认为转业军人。山丹县的抢劫活动波及多一半地区。22日至24日,六个公社中,就有四个公社的粮仓、面粉厂、农场、屠宰场、信用部等被抢。损失粮食近30万斤,羊1400多只,肉食

5000多斤,洋芋2万多斤,甜菜4万多斤。行抢过程中,砸门、撬锁,搞坏桌椅,行凶打人,打伤干部六人,职工一人。闯入信用部门,劫走了现款,焚烧了账簿,并从农场抢去步枪一支,子弹200多发。截至发报时,抢劫还在继续发展,一部分人已经回家吃饭,声称:吃饱饭再抢火车站和粮食局、商业局的仓库。其他四个公社也在动荡。由于这些严重问题,粮食、物资调运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大大影响了救灾工作。抢劫事件接连发生,以致发展到如此严重……

公安部为此向彭真和中央书记处提出整顿铁路沿线治安秩序的意见,意见中说:“入冬以来,铁路沿线治安秩序比较混乱,群众强取、硬拿、哄抢、偷窃运输中的粮食、煤炭等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近日甘肃境内闹的比较严重,今年1月1日至10日,就发生群众性强取硬拿160起,哄抢34起。16日至19日,武威一张掖地区又发生较大规模的哄抢7起,19日一天即发生5起,在武威车站的一起,多至4000余人;仅这7次就被抢去粮食54000斤……并打伤了五个押运员。现在,每天都有两千多群众徘徊在武威车站周围,有四五百人在乌江堡车站周围,伺机哄抢,使这个地区的铁路运输十分混乱,连给灾区的救济粮也运不进去。此外,在河南的信阳地区、山东的胶济沿线、河北的保定、石家庄一线、沧县地区、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郊,也有偷窃哄抢的事情发生。”

(三)“反革命暴乱”

笔者翻阅地方志时,发现地方志的大事记中,1958—1962年间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暴乱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为多,许多县志中均有提及。这些记载,大多表述隐讳,语焉不详,但也有一些透露出与缺粮、抢粮有关。

贵州遵义专区多部县志提到了反革命组织和暴乱:如务川县,1960年8月27日,“县公安局破获新田、庙坝‘新二军’反革命集团案”。^{注12}遵义市(县级),1962年,“公安机关全力投入对敌斗争,相继破获‘民主自由党’、‘中国民联党’、‘反共青年军’、‘反共救国军遵义地区边防部’等反革命组织,逮捕首犯16名。”^{注13}上述记载对事件的起因交代不详。但下列事件则显示与粮食有关。1959年11月,习水县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

理区前丰生产队转业军人李泽江、李银江兄弟等为首组织的“中国工农党、反产起义军”反革命集团17人被捕获。“首犯李泽江、李银江早在10月就公开与党对抗。上级布置征购任务,他们不但不积极发动群众运粮入仓,反而在群众中煽动说‘不解决口粮,还要运粮入仓’‘要粮只有组织起来到官渡去背’。他们消极怠工,既不开会,又不生产,还公开反对支部说:‘那有人出工,粮食都没得吃,出什么工’。”“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有的是由于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这点和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纲领中所提出的‘反对国家资本主义,推翻农村称粮制,田土恢复单干’,起了共鸣作用”。1960年8月15日,织金、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以代天荣、何昌雄为首组织所谓“忠勇人民起义军”,聚众暴乱,抢劫商店、粮库。暴乱波及4个公社。事件发生后,省、地、县组成4个工作组进入该地区,经过做群众工作和军事围剿,到9月21日,事态平息。^{注14}

1960年5月,贵州省政法党组向省委提交《关于防止反革命暴乱事件意见的报告》,归纳说:“今年四个月来,全省共发生反革命预谋暴乱事件达22起”,另外还有两起,一起是4月14日晚发生在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乐园公社,共有暴乱分子69名,“煽惑、欺骗和裹胁群众200余人。在暴乱中,打死了管理区干部三人,杀伤了一人,并在我围剿中打死民兵一人,抢劫了三个管理区供销社的物资和部分粮食。事件发生后,经过政治争取和军事围剿,该集团暴乱分子除一名自杀外,其余68名为我全部捕获”。另一起是4月21日发生在正安县旧城公社槐坪管理区,共有暴乱分子11名,其中为首分子两名,在暴乱中,夺取了我步枪六支、子弹两百发,砍死了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各一人,砍伤了商店干部一人。事件发生后,暴乱分子在我追击下,即逃窜茶西山中,现除三名暴乱分子正被我继续围剿外,其余八名全部为我捕获。正安县的这一起,在县志中也有记载:1960年4月21日,“旧城公社永城管理区严碧明为首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翌日,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巨胜率部前往,配合县人民武装部、公安干警及当地民兵约1500人围剿,平息暴乱,历时24天。”^{注15}

四川,涪陵专区石柱县的记载则明确指明“暴乱”目标是“抢劫国家粮食物资”:1960年12月25日,“以陈树清为首裹胁百余人,在黄水农场六大队进行反革命暴乱,破坏电讯,吊打干部,抢劫国家粮食物资,立即被平息。翌年12月24日,在黄水坝公审枪决了陈树清。”^{注16}雅安专区芦山县,《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说:1960年7月5日,雅安地委向四川省委作出《关于平息芦山县宝盛公社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总结报告》,《报告》称:6月3日,芦山县宝盛公社中坝大队一小撮反坏分子突然进行武装叛乱,他们抢走枪支,杀害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商业局长,杀伤县公安局副局长、治安股长、地委农业检查团的干部等5人,并窜入森林,妄图长期对抗。地委立即组织人员本着以军事压力加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进行打击、瓦解,开展平叛工作。至6月27日,除首犯杨宗发正在追捕外,先后共抓获叛乱分子23名,击毙3名,自首2名,叛乱得以平息。^{注17}该《报告》没有说明“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目的是什么,而在《芦山县志》里面,却有所透露:1960年春,“县内发生粮荒,水肿病流行”,6月3日,该县“宝盛公社中坝管理区,以杨宗发为‘皇帝’组成的‘中国人民救命军’叛乱。杀死公社党委副书记高华丰等2人,杀伤公安局副局长余洪刚等3人,抢走长短枪3支。在地、县委领导下,雅安军分区、专区公安处派出部队清剿,于12月5日将叛乱分子全部捕获归案。叛乱平息,首犯处决。”^{注18}

福建,龙岩专区武平县,是福建省饥荒最严重的县,县志记载:1962年7月,“县公安局在城南破获‘反暴政行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被处决”。^{注19}

广东,据1959

年3月18日新华社内参,当月10日,韶关市郊马坝公社发生了有100多人参加的反革命暴乱事件,“暴徒在绑架林树清(马坝公社干部)之后,又窜到木坪村抢走民兵步枪20多支,在黄屋村又煽动群众抢去粮食17000多斤”。为首分子巫拌瑜是原沙溪小学教师。报道最后说:“关于这次暴乱的起因,现在还没有查清。”可能是和抢粮有关。

甘肃此类记载不少,最详细的是泾川、镇原县发生的“上肖叛乱”。

《泾川县志》记载:1960年12月20日,“镇原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波及县内荔堡、玉都公社。叛乱首要分子吴崇教(今红河乡吴家村人)率50余人自镇原进入荔堡街市,裹胁部分群众示威游行,砸坏公社电话总机,切断电话线,抢去步枪2枝、自行车7辆、电话机1部、人民币300余元,打伤干部2人。翌日窜回镇原。”^{注20}该记载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具体情况。在《镇原县志》里面,该事件被称为“上肖叛乱”,对其描述较为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其实是抢粮。《镇原县志》记:

1960年12月20日,在镇原县屯字公社上肖大队(今上肖乡)、泾川县荔堡、玉都公社一带,发生了“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

1960年9、10月间,以孙和忠(富农分子)、白浪亭(原国民党巡官)、曹世虎(原国民党乡队副,保外就医犯)、邢天星等为首,利用当时国民经济

40	泾川县志
1960年	
2月26日至31日	中共泾川县第四届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4月16日	全县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9月底结束。揭出有贪污、浪费行为的干部5494人(包括大队、生产队干部),贪污现金50.2万元、粮食24.4万公斤。
是月	全县抽调1200名劳力,去庆阳县修建巴家嘴水库,1962年3月撤回。
11月17日	县委根据中央“紧急指示信”精神,进一步检查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19个县直单位和17个公社给大队、生产队退赔平调土地7084亩、劳动工日8.9587万个、牲畜1182头(只)、现金4万多元、粮食6万公斤。
12月2日	开始精简兵简政,至年底,在工交、农林、财贸、文卫、党群五大口精简职工1704人,其中干部500人,工人1204人。
20日	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波及县内荔堡、玉都公社。叛乱首要分子吴崇教(今红河乡吴家村人)率50余人自镇原进入荔堡街市,裹胁部分群众示威游行,砸坏公社电话总机,切断电话线,抢去步枪2枝、自行车7辆、电话机1部、人民币300余元,打伤干部2人。翌日窜回镇原。
是年	在“浮夸风”影响下,县委提出“戴五河、堵万沟,开挖十万眼井,一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全县每天投入数万名劳力大搞水利建设,先后开工修建水库24座,打深井1200眼,花费资金130万元。但因缺乏科学依据,盲目蛮干,基本竣工的水库只有1座,深井多是废品。
	因连续两年口粮安排过低,农民生活困难,出现人口浮肿、干瘦和外流,发生非正常死亡,全县人口比1959年减少8697人。

第七节 上肖叛乱

1960年12月20日,在镇原县屯字公社上肖大队(今上肖乡)、泾川县荔堡、玉都公社一带,发生了“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反革命叛乱。

1960年9、10月间,以孙和忠(富农分子)、白浪亭(原国民党巡官)、曹世虎(原国民党乡队副,保外就医犯)、邢天星等为首,利用当时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和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造谣惑众说:“今年三月,天上出现五个星星,代表五个头子领导起义,共产党压制的是五类分子(当时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现在五类分子要抬头”;欺骗群众说:“为了吃饱肚子,起来进行斗争,天时已经到了”。扬言要“推翻政府”。煽惑群众,扩充力量,发动暴乱。12月14日,纠集二十八人,抢劫上肖大队新庄生产队仓库粮食九百多公斤。17日晚在上肖大队白草湾密会,封官委职。孙和忠为师长,白浪亭、王廷瑞为副师长,设师参谋、军械、军医、秘书主任和外交通讯等,下属六个团,团下编营、连等。并草拟反革命口号和传单,商定“起义”时间、地点。19日晚,妄图抢劫上肖大队北有仓库粮食,以作军械,未遂。20日下午4时许,孙和忠、白浪亭、曹世虎等纠集百余人,乘泾川县荔堡镇逢集之机,数人佯装打架吵嚷,求公社调解,其他人以看热闹为名,拥进公社,砸坏电话机,砍断电线杆,打伤公社干部,抢去步枪四枝、自行车七辆、电话机一部,随即到该镇邮电所,打伤工作人员,毁坏电话总机,抢去三百余元。向赶集群众散发反动传单,呼喊“谁要吃饱饭就跟上来”。^二

· 266 ·

《泾川县志》(左)《镇原县志》(右)关于“上肖叛乱”的相关记载

的暂时困难和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造谣惑众说:“今年三月,天上出现五个星星,代表五个头子领导起义,共产党压制的是五类分子(当时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现在五类分子要抬头”;欺骗群众说:“为了吃饱肚子,起来进行斗争,天时已经到了”。扬言要“推翻政府”。煽惑群众,扩充力量,发动暴乱。12月14日,纠集28人,抢劫上肖大队新庄生产队仓库粮食900多公斤。17日晚在上肖大队白草湾密会,封官委职。孙和忠为师长,白浪亭、王廷瑞为副师长,设师参谋、军械、军医、秘书主任和外交通讯等,下属六个团,团下编营、连等。并草拟反革命口号和传单,商定“起义”时间、地点。19日晚,妄图抢劫上肖大队北苟仓库粮食,以作军粮,未遂。20日下午4时许,孙和忠、白浪亭、曹世虎等纠集百余人,乘泾川县荔堡镇逢集之机,数人佯装打架斗殴,求公社调解,其他人以看热闹为名,拥进公社,砸坏电话机,砍断电线杆,打伤公社干部,抢去步枪四枝、自行车七辆、电话机一部,随即到该镇邮电所,打伤工作人员,毁坏电话总机,抢去300余元。向赶集群众散发反动传单,呼喊“谁要吃饱饭就跟上来”。20多分钟后,即向镇原县屯字公社逃窜,途经上肖大队雄武生产队时,打伤县工作组干部,抢去县、社三名干部所带之驳壳枪、步枪、小口径步枪,向上肖大队进发。此时,参加叛乱者和裹胁群众达200余人,包围了平凉公安处副处长所率领的干部、民兵十余人,双方交战数小时,击毙叛乱分子一人,缴枪一枝。在平凉地委平叛指挥部指挥下,21日拂晓,9021部队的一个连和地、县民警80余人及地、县工作组相继赶到出事地点,叛乱者纷纷潜逃,部队和民警分路追捕。23日晨,在屯字公社石崖金家捕获20人。当晚,在孟坝和庆阳县肖金捕获6人。27日夜至28日晨,在新集、屯字公社和庆阳县原城公社捕获孙和忠、邢天星等10人。在追捕中,匪首曹世虎被击毙。至此,受骗上当的群众已觉醒,纷纷返家。228人主动投案,叛首白浪亭亦主动投案。

在平息这次叛乱中,击毙2人,逮捕43人,缴获步枪4枝,手枪2枝,小口径步枪1枝,子弹39发,炸弹4枚,刺刀4把,马刀5把,斧头13把,电话机1部,印章3枚,自行车10辆,各种粮食3976

公斤,面粉51公斤,粮票6公斤,人民币7608元,衣物69件。

经司法机关审理,依法判处首犯孙和忠、邢天星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四至二十年徒刑的33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66人,定为案内成员的58人,划为知情人的276人。后于1973年10月,经地、县有关部门复查,维持原判82人,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8人,平反纠正348人。^{注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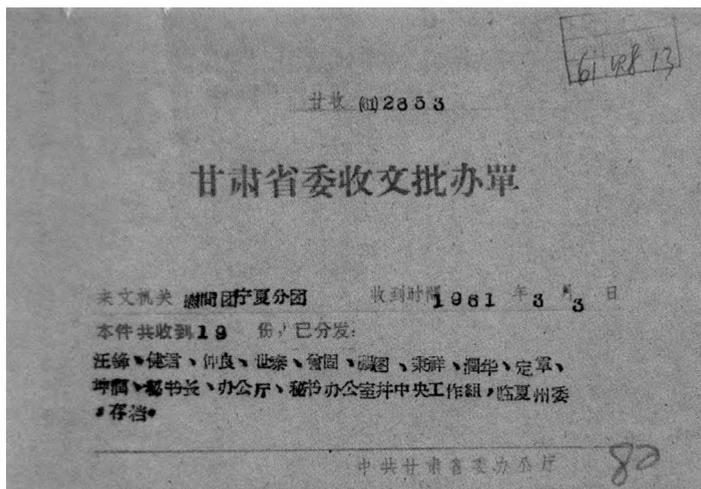
对于“上肖叛乱”,有研究者认为:甘肃省“对于一些地方农民闹粮或抢食粮站的案件处理是极其严酷的,一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有的还被处决,例如:甘肃泾川就曾对抢粮案件定为‘现行反革命’,首要者被判重刑。”^{注22}

同类相残的历史悲剧

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农民遭遇悲惨,这还只是历史悲剧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受害者的农民,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还同类相残,不仅欺凌、残害同类中的更弱者(如孤儿),甚至残害他人,杀人而食,这是更深层次的历史悲剧。

1960年10月29日,中共四川省委粮食检查组温江地区检查组向省委报告金堂县情况,说到:“打死人特别严重的是竹篙区。公社与公社之间,互相打死人,并彼此暴尸示众。转龙公社二管区社员陈德翠(62岁),偷了石佛公社胜利管区二队的40多个包谷,被看包谷的群众捉回食堂,用乱棒打死后,将其尸首抬到转龙公社的地界上摆起。10月18日晚,石佛公社胜利管区社员陈吉旺(31岁)挖了转龙公社三管区几窝花生,被该管区的干部和社员发觉后,也用乱棒活活打死,并将死者捆绑起丢在石佛公社的地界上。”

四川涪陵专区彭水县,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记录了以下事实:联合公社石峡大队14岁的蔡明松偷窃王章秀(女,27岁)的蔬菜被发现,王先用拳头打蔡明松,接着又用木棒打,致蔡的头部、双手、右腿、胸部、背部多处青肿、淤血,走不到半里远倒地死亡。迁乔公社国光大队廖文安1961年5月30日在坡上掏了廖治伦叔叔地里的三个洋芋,当晚又偷了廖治伦家锅里炕的湿麦子,廖治伦使用柴块、木棒、锄头等,连续五次毒



和政县 人吃人案件的统计和分析

发生时间	地点	作案人		被害人		方式	原因	主要情节	处理
		姓名	成份	姓名	与作案人关系				
50·1220	买集公社崖市张酒麻村	杨占林	贫农	王宗虎	同队人	病死煮吃	生活困难		
		杨占明	"						
		杨占全	"						
60·元·6	"	上述三人	3	王德主	"	捉活煮吃	"		
60·元·10	"	杨占林全家	12	郑景路	"	捉活煮吃	"		
60·元·9	买集公社崖市张酒麻村	康公麦	贫农	马哈买吉	同村人	用斧砍死煮吃	"		送捕
60·元·17	买集公社	焦文忠	"	全家2	"	病死一煮吃	"		
60·元·21	新庄公社三十里铺队	水旺英	"	包田露	同村人	病死煮吃	"		
60·元·21	大寨村	马一明	承	马二沙	"	病死煮吃	"		
60·元·28	三十三里铺大川村	马俊祥	"	张有才女儿	"	"	"		
60·元·28	"	马俊祥张个	地主	张有才	"	病死煮吃	"		

大饥荒期间甘肃“人吃人案件的统计和分析”档案(部分)

打廖文安,并指使其子廖文祥伙同毒打。最后一次毒打一小时后死亡。芦塘公社高明珍(男,16岁),1961年4月19日到冉业淑家偷窃,被冉的女儿邵文秀(8岁)、邵文碧(5岁)发现,高明珍害怕被告发,当即用大锄先后向邵文秀、邵文碧身上、头上猛击,邵文秀、邵文碧被当场活活打死,杀人后,又将尸体拖出扔在粪池内。事后清点偷窃的财物计有:包谷5斤,四季豆1斤,黄瓜子0.5斤,海椒1两,盐巴1斤,剪刀一把。13岁的孤儿周礼碧,1961年3月3日偷窃邻居地里的蔬菜,代养人、亲叔周仁华遭失主责备,用刀将其砍死。11岁孤儿李永直,3月9日偷窃亲叔李元娄家洋芋,被李元娄毒打致死。13岁女孩唐寿南,4月24日偷窃队里红苕,家庭受生产队干部责备,次日上午被哥哥唐寿信捆绑,母亲李登淑殴打,午后死亡。10岁女孩子陈香,3月8日偷吃家里食物,被父亲陈德安带到山上打死。16岁女孩董泽翠,5月8日偷窃家里食物,被父亲董世玉殴

打,第二日死亡。12岁男孩唐文成,告发哥哥唐文周盗窃生产队红苕,被唐文周打死。^{注23}

大饥荒期间,出现了很多人吃人事件。在甘肃省委办公厅1961年3月3日收到的由“慰问团宁夏分团”所做的一份关于“人吃人案件的统计和分析”的调查报告,人吃人方式被分为三种:挖吃尸体、吃尸体(即未埋葬之尸体)、杀吃(活人)。其中杀吃案件多起:在临夏市,1959年11月,队寨子村贫农朱五十七将同村人王玉成杀吃;1960年1月2日,韩集公社曹家坡圣家坪富农马文德将同村人马田奴杀吃;1960年2月25日,红台公社腰合家村贫农杨忠生杀吃亲弟弟杨三顺;1960年3月13日,红台公社赵家大队贫农赵香香杀吃小孩;1960年4月,4名外地人、2名同村人在队寨子村被杀吃;1960年,西河公社一贫农将一个“流窜人口”杀吃。在和政县,1960年1月9日,买集公社崖市张酒麻村贫农康公麦将同村人马哈买吉“用斧砍死烧吃”。

前述王民三1961年1月8日日记写到:“途经印江,县委书记汇报说,去年这个时候正是反瞒产、强迫命令盛行的时候。捆、绑、吊、打,用了八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去活活打死一个小孩煮来吃。”2月2日日记:“铜仁一个报告上说,思南县一个贫农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一个五岁、一个八岁。”3月2日日记:“在毕节地区一份关于农村食堂的情况简报中,报导了水城县一起杀人事件,有一户7口人之家,把自己一个7-8岁的小孩活活打死,然后煮吃了。”5月13日,“看了两份报告”,“另一份报告是水城县,南开公社入春以来,有11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有5起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的,有6起是将埋在土里的死人挖出来吃掉。”^{注24}

1958-1962年间发生的大饥荒,其悲惨超出人们的想象,只有直面和正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责任编辑 黄 钟)

毛泽东与竺可桢谈农业“十字宪法”

○ 樊洪业

毛泽东曾于1964年2月6日召见竺可桢于卧室,谈受其论文启发,欲将农业“八字宪法”改为“十字宪法”。此事须从“八字宪法”说起。

陷入困境的“农业八字宪法”

1956年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其中包括为实现农业增产而规定的若干具体措施。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要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提出的发展目标,随后在各种会议报道中都不断出现将毛泽东提出的增产措施与“农业宪法”挂钩的说法。终至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认为已经确立了“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的思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38页)。旋即有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其中明确写道:“水(水利)、肥(肥料)、土(深耕、改良土壤)、种(改良种子)、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改良工具)、管(田间管理)的农业八字宪法”。后来因为强调以“深耕”为中心,八个字的表述顺序调整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急切摆脱贫穷而迷信领袖英明的人们,都以为靠这部“宪法”,就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了。

这部“宪法”的提出和实施,是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三个法宝”(后称“三面红旗”)相伴同行的。那八个字中,在“大跃进”高潮中各显神通,前几项都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记录。

单说这打头的“土”吧。

《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提出:“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水肥土种密’,中心是土,就是深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9页)文件要求“在今后两年内,要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三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同前,第460页),而毛泽东又更进一步提出“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06页)。

适度的翻地深耕,可以改变土壤板结的状况,有利于土壤保持蓄水。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的中国农民,本来就有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一般耕地在接近地表部分存在一个有机质含量较多的营养层,如果过度深翻,就会把这个营养层翻到下面,却把缺少或没有营养的部分翻到上面来。粮食作物一般根系较浅,过度深翻就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粮食产量,更不要说劳动力的合理分配和成本问题了。

“土”是如此,“八字”中的其他各字也都有因过度夸大而走向反面的问题。但在政治高压之下,瞎指挥,高指标,虚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满天飞。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初衷是实现粮食的高产,得到的回报却是一场连续几年的全国性大饥荒。

竺可桢研究中国气候特点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有关国民经济建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随后发出要求全国各部门“支援农业”的号召。

自1949年建立中国科学院以来,竺可桢一直担任副院长,长期分管地学与生物学部门的研

究所。1961年以后,他将很大精力投入到组织院内科研力量支援农业的工作中。

在中国科学院之外,竺可桢还担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任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的理事长。在这些岗位上,他也是“支援农业”的强力推手。

1963年2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会决定,本年举行以支援农业为主题的学术年会,要求会员准备论文。竺可桢可能由此开始酝酿撰写有关文章。他在8月青岛避暑度假期间写出初稿,题目为《论决定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的几个气候因素》。回到北京后,继续补充修改,于9月8日(星期天)成稿约共八千字。文稿曾先后送黄秉维、汤佩松、吕炯、吴传钧、戴松恩、金善宝和叶渚沛等著名科学家征求意见。再经修改定稿,题目几经变化,最终定为《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的生产关系》。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63年综合性学术年会于11月12日在杭州举行,竺可桢即此文提交会议宣读。

竺可桢的文章认为:气候是目前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应急工作是要分析

气候如何影响粮食生产,随之探讨如何利用气候资源实现增加粮食生产的目标。

文章明确提出,影响粮食生产的三大气候要素是:太阳辐射总量、温度和雨量。全文的主体也是在具体分析我国这三大气候资源的分布状况,讨论它们影响我国稻麦两大作物生产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最后根据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两大原则,提出了九条对策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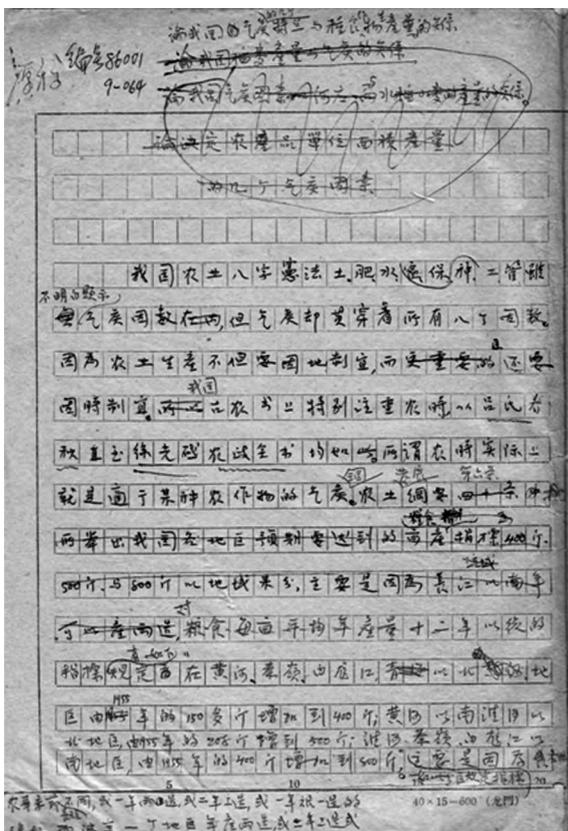
1月9日,竺可桢看到了自己这篇文章被节选编入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研究动态》第274期上。这是一份提供给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

毛泽东从这份简报中看到了竺可桢文章,立即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召见了竺可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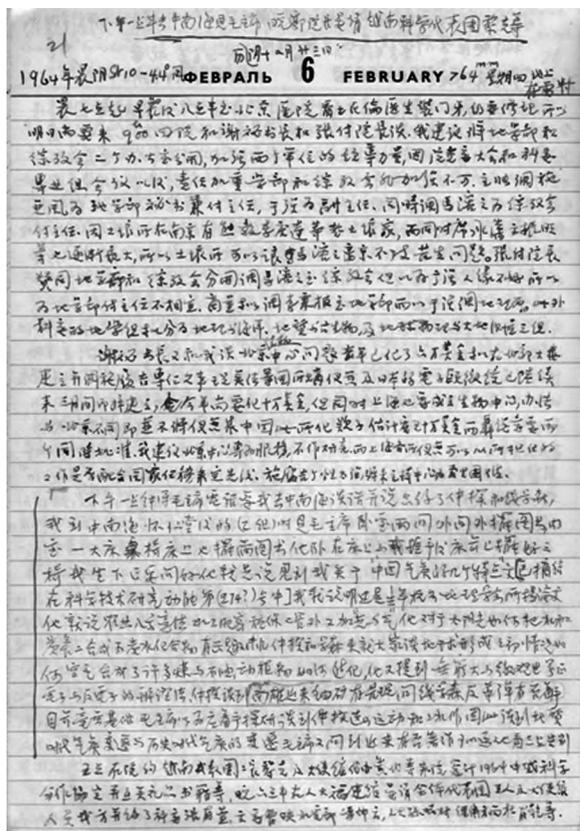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与竺可桢谈“农业宪法”

1964年2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卧室召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虽然关于此事的流传版本很多,但根据目前所见,只有竺可桢日记为第一手史料。

按竺可桢平时习惯,每日一般只记一页,对当



竺可桢论文1963年9月修订稿手稿之首页



竺可桢1964年2月6日日记

日入记诸事的选择是自取所需。2月6日这一天分为四段,上午事为看病,与其他院领导谈工作,文字最多,占有两段;下午即为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谈话,占一段;最后记晚上外事活动,文字较少。在日记原本中,下午内容特别用红墨水笔书写,以示其重要。虽然所记简单,但因存于私人日记之中而得以留传,弥足珍贵。经过辨识整理的有关文字见载于《竺可桢全集》第17卷第37页:

下午一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外摆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三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文,(已摘录在《科学技术研究动态》第(274?)号中)。我就说明这是去年杭州地理学会所提论文。他就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又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未几仲揆和学森来,就大家谈地球形成之初情况,如何空气合成了许多煤与石油,动植物如何进化。他又提到无穷大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反电子的辩证法。仲揆谈到南雄近来铀矿有发现。问钱学森反导弹有否着手,[知]目前毫无基础,毛主席以为应着手探研。谈到仲揆造山运动和冰川,因此谈到地质时代气候变迁与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毛主席又问到近来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三点告别。

从中可知,1964年2月6日下午一点,竺可桢在家中接到电话,通知称毛主席要他和李四光、钱学森到中南海去谈话。竺最先赶到,被引进毛的卧室,见床前已摆好三椅,毛卧在床上与他握手,待竺落座后,毛即说见到了他的文章,谓农业八字宪法只讲已有的那八个字还不够,要加上“日”(日光)和“气”(气候)两个字。毛在与竺的谈话中,表明他对植物如何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光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感兴趣。在李四光和钱学森来到之后,诸多话题涉及地球形成、生物起源、冰川与造山运动、气候变迁、石油成因,以及反导弹等等。

此次召见,竺可桢在毛处前后计一个半小时。竺老的记忆,当然远比当日所记要多。在后

来的日记中,至少还有四次涉及这次谈话的内容。其中三次与农业有关,依时序分述如下:

(一)1964年2月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裴丽生来询与毛主席谈话情况。竺告以经过情形,特别说明因耳聋和记性差,未必全能记得。他认为在所谈诸事中,理解毛泽东最关注的有两点:第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第二是毛对于反导弹一事极为注意,叮嘱钱学森能组织一个小委员会进行研究。

(二)1967年2月8日,有地理所气候室两人来谈,问及毛主席谈话内容,竺告以毛主席曾谈农业八字宪法,“八个字现在看来应加日光和气候,成为十字宪法”。

(三)1967年11月24日,竺回答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气象系本届毕业生的询问:毛主席说看了我那篇论文后,感觉到日光和气候的重要性,所以认为八字宪法应增“光、气”二字,而成“十字宪法”。

综合各次记述可见,毛泽东从竺可桢的论文中得到启发,已经认识到过去提出农业“八字宪法”之不足,应该补充“光”和“气”二字,修改为“十字宪法”。

“八字宪法”的终结

在毛卧室中被召见的三人中,未见有李四光和钱学森本人直接讲述这次召见的回忆文字。据竺可桢日记,1967年11月19日上午,李四光夫妇到竺家访问时,李称:过去地质部人员常问他1964年二月间毛主席召见我们二人及钱学森时说了什么话,他已忘了详细情形,人家疑为封锁最高指示云云。竺对李说自己虽记有日记,亦语焉不详,只记得那天从“万物生长靠太阳”讲起,海阔天空,谈得很多。

对这次海阔天空的漫谈,大多细节已记忆模糊,但正如竺可桢当初对裴丽生所言,有其印象深刻者,是认为毛泽东当时最为关注两件事:一是“农业八字宪法”应加“光和气”,二是“反导弹”。

“反导弹”后事如何?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汇

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已表示对反导弹问题的关注。后于1964年初曾专门约谈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要他找科学家咨询关于对付敌人导弹来袭的办法(《张劲夫文选》上册第288页)。毛在这次与钱学森的谈话中再做询问和指示,随之引出了“640工程”,开启了中国的反导事业,后有“863计划”相接续。两个代号都显示着它们发生的年代。

“农业十字宪法”后事又如何?

毛泽东虽然看到竺可桢的文章后受到触动而有急切召竺晤谈之举,并动过将“八字”修改为“十字”的念头。“八字宪法”由领袖意志化为群众运动,其直接后果已定格在历史上。产生于毛泽东卧室之中的“农业十字宪法”,又消解在了他的卧室之中。除了竺可桢的个别答问,也无人知晓这件事。自1982年起,中国农业的发展,彻底丢弃了生存20余年的“八字宪法”,迎来了一年又一年的有关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毛泽东与竺可桢晤谈的一个细节

1964年的2月6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民俗中的“小年”。星期四中午一点,是机关工作人员的休息时间。在年龄上,竺可桢再过一个月就74周岁了,比毛泽东年长将近四岁。体弱多病的李四光长毛泽东四岁两个月。毛此次召见,从谈话内容看,多半是与他个人哲学兴趣相关的科学问题,并无急要之事。

当时,钱学森家住在阜成路,李四光家住城西郊紫竹院北,都距离较远。竺可桢家住地安门东大街中科院第一宿舍,离中南海最近,因此能最先赶到。一点钟接到通知,事出不备,总要有联系司机和打理冬装的准备时间。据竺日记,当日“地上存雪半寸”,该是路况不佳,行车不易,于一点半赶到了毛的住处。竺记见到毛之后的情况是:“他在卧床上与我握手”。按毛的作息时时间,似乎为一觉方醒之时。

竺可桢的无奈迂回

竺可桢早年留学美国,深得“哈佛”真传,内心深处崇尚“自由主义”。长浙江大学之初,他就

借哈佛大学成立300周年纪念之机,鼓吹“学校思想之自由”(《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1938年,在遭受敌机狂轰滥炸的西迁路上,他为浙江大学立下“求是”校训,释其内涵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在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思想自由”已成政治禁忌,竺可桢当然会晓得“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道理。

1956年又稍有变化。竺可桢到怀仁堂听了陆定一所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之后,曾与一位党内老干部说:“我看蔡元培主持北大时,学术自由比现在还自由一些,那时他提倡科学自由。可是我们现在并不让胡适、胡风这类人进行自由争论。”

不久有反右派斗争,百家争鸣转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解。竺可桢每每在政治运动中自认落伍,自以为非,再无“自由”之谈。

依竺可桢的学术功底,他不可能接受毛泽东的“八字宪法”,但亲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他深知农业“八字宪法”的特殊政治身价。在以往的讲话和文章中,竺可桢从来没有真正从学术上评价过它。在私人日记中则只是转述有关领导人讲话时才提到它。

在《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的生产关系》这篇论文中,对农业八字宪法既不可能直接批评,又不可能绕过。他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自己的观点用八字宪法包装起来,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虽不明白显示气候因素,但气候却贯穿着所有八个因素。”

这是竺可桢在向人们做政治告白:本文所论不违背“农业八字宪法”,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做气候学的阐幽发微。

一位学养深厚的大科学家,不能从专业立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是科学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最后说明一点,关于毛泽东在卧室召见竺可桢等三位大科学家一事,当前流传版本很多,并多以“毛泽东让竺可桢管天”为标题吸引人们的眼球。据笔者考证,乃系由文学虚构而窜入历史的典型一例,须以另文专述,以正视听。■

(作者为原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 黄 钟)

华国锋最先为包产到户开口子

○ 吴 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风起云涌。许多文章和传说,都认为是三中全会提出了农村改革。

究竟是谁,首先在中央一级为包产到户开口子的呢?

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杜润生有一个总结讲话,他说:“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比如包产到户,三中全会是‘不准’,四中全会是‘不要’,31号文件是‘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75号文件是‘三靠地区可以搞’。这正说明我们中央是按照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办事的。”

三中全会时,有人提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大事,没有准备,不好表态。因此会议公报明确说“不准”。

近来,有些文章和史料表明,中央是陈云同志较早表态支持,包括姚依林等,这是不错的。事实上1962年陈云就主张过借田、扩大自留地,私人养母猪,乃至可试行包产到户等等。胡耀邦还到安徽调查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向中央报告认为是“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但又十分危险的方法”。当时我听到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解释是:积极作用是增产;十分危险,是可能有方向路线错误。因此他说,这个报告就不要扩散了。(他把这份报告锁在自己抽屉里。)

其实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为包产到户开口子的,不是别人,正是长期熟悉农村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有会议记录为证。

1979年春,《人民日报》发社论不准包产到户,3月15日一版头条刊发张浩来信,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3月14日致函《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要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退回去。胡在后来的文集中也提到此事并感到遗憾。

但就是当年“张浩风波”时召开的三省三市农业座谈会(又俗称前门饭店会议)上,引起了争

论。只有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坚持包产到户。这个会前,国家农委向华国锋汇报,时间是1979年3月10日。华国锋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着重点是笔者加的,转引自《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第50页)

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为包产到户开口子的。这次座谈会形成的会议纪要作了两点明确表态:

第一,纪要明确写上“深山、偏远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

第二,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判、不斗争、不强制纠正。(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这两条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支持,最后由华国锋同意才发文的。(见上书第49页至50页)

杜润生后来说,华把这个门开了条缝,后面就挤开来了。

(作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林彪的衣食住行与性格爱好

○ 李根清

奇特的衣食住行

新中国成立了，和平到来了，林彪也病倒了。被病魔纠缠的林彪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然而展现出来的另外一种奇特，同样让人们瞠目结舌。

比如说吃。人们通常都会这样想，像林彪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是天天山珍海味，顿顿美味佳肴，享尽人间口福的。我第一次给林彪送饭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出乎意料，厨师卜金华交给我的却是一个盛着白开水煮卷心菜的小保温桶，一个一两多的热馒头，一盘二两牛肉做的清蒸肉饼，这三样东西和一双用热毛巾紧紧包裹着的竹筷，被一起装进一个食盒里。我问卜师傅：“还有吗？”他回答：“没了。首长就吃这些。”我以为下一顿可能吃好的，可是下一顿还是这三样。我以为明天会吃好的，到了明天仍然是这三样。一年到头，天天老三样。1965年春天在苏州住时，一位姓吴的厨师负责给林彪做饭。一天，吴师傅哀求似地对我说：“小李，我是国家特一级厨师，什么样的面点，什么样的饭菜都会做。你给首长说说，就让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吧，我保证让他满意。”当我把吴师傅的心情说给林彪时，他嘴角含笑，轻轻摆手说：“谢谢他。我吃的很好了。每餐一份蔬菜，一个馒头，一钱盐，一钱油，二两肉饼，不加作料，雷打不动。”

“老三样”也有变样的时候。随着季节转换，卷心菜会换成应季蔬菜，煮菜的白开水会换成小米稀饭，稀得米粒碰不到米粒，喝开水变成喝菜粥。馒头可能换成玉米粉，牛肉可能换成猪肉、鱼肉，如此而已。变与不变，变成什么，全是林彪自己发令。一段时间吃延安产的小米，吃些天后他会说吃延安小米“出汗”，便下令吃井冈山小米。过一段时间有可能把井冈山小米换成麦片，

或者再吃延安小米。一年到头，换来换去，也逃不出他认可的几样东西。

林彪从不敢尝鲜。许世友常把打来的猎物选一些送给林彪，林彪从来不敢品尝。有人也会送些时令鲜果，他看也不看便送人了。1967年12月5日是林彪60岁生日，内勤向林彪提议“适当改善一下伙食”，林彪摆摆手说：“不要”，照吃他的老三样。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妻子儿女各自端着自已的饭碗陪着他吃了一顿饭。

林彪吃的贫乏无味，连家常饭菜都不如。但林彪用餐时那副贪婪的样子却是天下无二。他用的“碗”就是那只装了半桶白开水和青菜的小保温桶。只见他打开桶盖，首先把馒头掰成几块投进桶里，再倒入肉饼，然后用筷子快速搅拌桶里的食物，打得桶壁“啪，啪”作响，直到食物被全部搅碎，便端起保温桶“哧溜，哧溜”地吃起来。吃得那香甜，吃得那贪婪，像是几天没有吃过饭的饿汉。我常想，桶里食物的温度肯定还是烫嘴的，但林彪就喜欢吃烫嘴的饭菜，一旦端起饭桶，便片刻不停，直到全部消灭干净。林彪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重复地吃着一样东西——菜糊糊。

林彪行政三级，月薪四百多元。叶群行政九级，月薪二百多元，全部由管理员掌握使用。林彪不知道人民币什么样。那时，在中海岸边有一处中央国家机关供应站，林彪一家日常所需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从那里采购。当然，对符合特供条件的供应对象价格是优惠的。如果离京到外地居住，当地也有专门供应机构，加之林彪从不奢侈，所以，林彪一家每月开销并不太大，存折上总有钱。

由于林彪吃的过于单调，不饮水，不吃瓜果，运动又少，所以经常便秘。大多数时间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手，偶尔两三天解一次就说拉肚子了。由于排解困难，我几次听他便后诙谐地说：

“唉，简直像打仗一样！”

林彪冬不穿棉，夏不穿单，除必须穿军衣的场合外，常年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而这套中山装是没有衬里的。在中山装里面穿的不论是毛衣、布衣，其衣领、袖口和衣袋都是被拆掉的。一年365天，林彪就是穿着中山装加一层又



林彪全家合影于1962年

一层的布片，上天安门是这样，会见外宾也是这样，而那件中山装已经穿了十几年了，衬衣的袖口、肩背更是被王淑媛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林彪在毛家湾睡沙发床，到外地也睡棕床。一年四季从不盖棉被，几层毛巾被，一两层布单子，就是一床铺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脏了洗，洗了再盖，缝缝补补，越日越恋。

战场上的林彪精于谋略，生活中的林彪也是计出必奇。他自创了一套“着衣法”、“盖被法”，严格依“法”办事。林彪认为，厚薄不同、质地不同、新旧不同的衣被，各有不同的保暖性能。因此，他凭自己的经验，对穿的每一件衣服，盖的每一条毛巾都判定一个“保暖度数”，逐一缝上标签。例如，他说：“布衣为2度，毛衣相当3层布衣，薄呢相当2层布衣，厚呢相当2层薄呢。”穿衣时，以室内温度30℃为基点，当室内温度为30℃或高于30℃时，都只穿他平时穿的那件灰色中山装或布军衣。当室内温度低于30℃时，低多少度，就增加多少度的衣服。比如当天室内温度为22℃，那么就再穿8℃的衣服。

什么温度条件，怎么穿，怎么盖，林彪自己都提前计算好了。他让我把他亲自制定的“着衣法”、“盖被法”制成表格，挂在床头的屏风上，内勤伺候他穿衣、盖被时，只要查看好当天室内温度，然后照表格要求去办就行了。林彪的卧室、客厅、走廊、卫生间都摆有温度计，常年温度大体控制在22℃左右，所以，林彪穿衣盖被一年四季变化不大。

林彪自创的穿衣盖被法，较为有效地解决了

他适应外界环境能力差的问题。林彪视为护身法宝，数年如一日，因袭不变。他对自己穿的每件衣服，盖的每条毛巾被都熟记在心，一看一摸便知是几度，越是穿盖年头久的，他越觉放心。不少衣服、毛巾被补丁连着补丁，也不让换新的。1966年秋，由于频繁接见红卫兵，经他同意添置了两件白衬衣，他让王淑媛放在水里反复揉搓，直到他觉着跟穿过的旧衣服差不多时才肯穿。

林彪的作息时间表很有规律。每晚九点多躺下，早晨六点钟起床。下午一点多午休，两点多起来，常年如此。

林彪不洗澡是真的，但是刷牙、洗脸、洗脚、理发、剪指甲这些事还是做的。每天早起，我给他打一盆洗脸水，水温不超过40℃。他自己把毛巾放到水盆里浸湿，拿出来拧干后，用湿毛巾擦擦脸和手，然后刷牙。用的牙刷是只有6撮毛的小型牙刷，牙膏是“中华”牌留兰香型牙膏，每次挤出黄豆粒大小，三下五除二，涮完牙就散步或坐下来整理散记。洗脚水不超过45℃，双脚泡五至十分钟拿出，用毛巾包裹起来放进被窝里擦干，再穿上袜子睡觉。林彪在总结洗脚经验时写道：“以40℃以上的热水洗脚十分钟，泡后立即入被内擦干，是治疗体弱受外寒后低温羁留不退的办法。”因为他只在“有低温不退时”才洗脚，洗脚后又害怕着凉，所以，洗脚是大事。每逢洗脚，我们都感觉比给吃奶娃娃洗澡还紧张。

林彪常年穿着衬衣衬裤睡觉。冬季上床前，我们会用热水袋把被窝预先给他暖一遍，起床

前也用热水袋把他的衣服暖和过再给他穿。由于热水袋暖衣服不均匀，刘文儒经常把林彪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等捂热乎了再给林彪穿。

由于常年累月打针，林彪的臀部肌肉几乎完全失去了弹性，青一块，紫一块，摸上去都是硬块，打针时常常针头变形，难以拔出。林彪却总是一副我疼我的，你打你的，毫不在乎的样子，好像屁股不是他的肉一样。只有少数几次，刘文儒给他打针时，我看见林彪疼得直咧嘴，但并不出声，也不责备大刘。

林彪户外活动少，随着年龄增大，常说“身上冷”。在健康人那里，这些都是不难改变的，但对于林彪却需要一场革命。比如晒太阳，连小学生都知道人离不开阳光。可林彪呢，忽而说，“从无光的地点转到有光的地方坐，觉得身上不很冷了，可见阳光很重要”；忽而又说“晒太阳时有低温不退”，似乎阳光洒在身上有无重要性还值得怀疑。1967年初夏，林彪同意在他卧室开个天窗，装上从德国进口的紫外线玻璃，每天晒20分钟太阳。

林彪身体好的时候，也会到院子里去散步，但必须是风和日丽的日子。他散步就是围着院子中央的葡萄架和芍药圃转，像在室内一样漫不经心，时而停住脚步看看花草树木，时而仰望一下蓝天，并不做什么动作，我们就站在房门口远远看着他。一般情况下，一次散步20分钟左右。如果遇上刮起一阵风，他就会即刻转身回到客厅。

林彪坚持最好的户外活动就是“转车”——坐着汽车到北京街头或郊外转悠，每次半个多小时，除警卫秘书李文普外，不准任何人跟随。有一次，他发现后面一辆吉普车上有警卫人员尾随，就发了脾气，说你们再跟着，我就不走了。李文普只好要警卫人员改变对策，远远地跟着。1968年夏，林彪不知想起啥，让李文普给他借来几匹马，到香山一带骑马散心。此外，我再不知道他有什么别的户外活动了。

林彪爱好什么

我看到的林彪实在没有什么爱好，更没有不良嗜好。他不爱玩、不爱穿、不喝酒、不抽烟、不

钓鱼、不玩牌、不跳舞、不玩女人，也不游山玩水、提笼架鸟、养花弄草，不把玩古件、不烧香拜佛，甚至不喝茶水，几乎属于男人的爱好，在林彪那里都找不到。

我看到有些书上说，林彪吸食毒品，是个瘾君子。更有人说，林彪每逢上天安门之前都要打一支吗啡针，否则便不能支撑下来。但是他们都说不出来何人能证明林彪吸食毒品，更说不出来这些毒品是何年何月、经过什么人、什么渠道提供给林彪的。

我给林彪当内勤两年，整天在他身边转来转去伺候他的衣食住行，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要说抽大烟、打吗啡这样的事，就是喝口水也要经过我们，并且记在当天的《病程日志》里。林彪要吸食毒品，没有内勤帮助是做不到的，可是我们内勤谁也没有给林彪做过这样的事。李文普从五十年代起，就给林彪当警卫员，林彪的日常生活、安全保卫都是他负责。我问过他：“林彪吸毒吗？”他肯定地说：“没有的事，都是谣传。”

林彪不喝酒，但是闻过酒。说是习惯谈不上，偶尔闻闻酒香。我给他做内勤时，在衣柜间的一个贮藏柜中，常年备着两瓶茅台酒，是九元钱一瓶买来的。林彪偶尔会让我们把酒拿给他，他拧开瓶盖放在离鼻尖十来厘米远的地方，用手掌从瓶口外朝着鼻孔方向扇动，然后鼻孔凑过去闻闻酒香，可从来不敢尝一口。

林彪踱步时爱听唱片，但从不着哼。他最爱听京剧，唱片也以京剧片子为多。梅兰芳、张君秋、程砚秋、荀慧生、周信芳等京剧名家的唱片都有，但林彪最爱听的还是梅兰芳的片子。《宇宙锋》《霸王别姬》《凤还巢》等，翻来覆去，百听不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天安门上喊“破四旧”，但回到家里照听不误，而且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听到哪儿。

除了听唱片，林彪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也不爱看样板戏，生活枯燥而乏味。所以，叶群偶尔给他讲个小笑话便会乐得前仰后合。儿女也懂得他们的父亲，回到家里常会刻意给林彪讲些轻松愉快的事情，逗林彪开心。1970年春，不知道叶群从哪家王爷被抄的物件中，给林彪搞来一台八音盒，打开盒盖，拧紧发条，转动起来便会弹拨

出八种曲子,叮叮当当,别有韵味。虽说总是老调重弹,可毕竟是件新鲜物,林彪把它放在卧室门口,白天晚上都听。“九一三”后,这台八音盒被展览,大批特批林彪“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看见林彪题过不少词,但没看见过他吟诗作画。《重上井冈山》等诗词,是叶群叫人为林彪写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是作者附会,并非出自林彪之口。叶群办公室摆着一口青花瓷缸,里面保存着林彪写的东西,别人送给林彪的字画,也这样保存着。林彪的客厅、卧室



从不张贴、悬挂什么条幅。那几年,我见到林彪卧室悬挂过的字画只有黄胄画的驴和何香凝画的《梅花图》,悬挂不久就摘了下来。《梅花图》是林彪六十岁时何老亲笔绘制的,林彪甚爱,叫我给他挂在卧室东墙上。此外,客厅、卧室基本上常年白净一片,并不悬挂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类东西。

仔细想来,林彪唯一的爱好,大概只有炒黄豆了,也许还有划火柴,闻硝烟,在普通中透着一点怪。

林彪也发火

林彪性格内敛,心气平和,在工作人员面前很少有心花怒放、心急如火、气急败坏这样极端的表情。在我的印象里,林彪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所以,我在他面前,除了一分恭敬和一份谨慎之外,并无惶恐。正因为这样,林彪发脾气才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景。

我给林彪当内勤不久,他对我发了一次“火”,使我记忆深刻。那天早饭后,林彪按电铃,我上去了,看见林彪靠在沙发上,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对我说:“我觉得着有点不好,量一下体温吧。”我把体温计拿来递给林彪,见他含在舌下,便站在一旁等候。那时的我有工作热情,但是没有医护知识,像怎样测体温这样的事也不知道。大约五分钟过去了,林彪向我递眼色,我不理

作者(右)1968年与李文普在林办

解。林彪从鼻腔里发出“嗯、嗯”声,我还傻呼呼地站在那儿。他见状,便自己把体温计从口腔取了出来,问道:“几分钟啦?”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根本没拿表。那时我还没有手表,即使我戴着手表也不知道看点。我当时想,量完了,林彪会把体温计取出来给我看,我向他报告一下体温是多少就可以了,头脑里根本没有五分钟这个概念。林彪见我没拿表,便把体温计扔在地毯上,瞪我一眼,慢慢地说出两个字:“呆——子!”等我去捡体温计的时候,他又咕噜出三个字:“学学嘛!”

回到内勤值班室,我向刘文儒、屈真讲我的故事,他俩哈哈大笑,说我真是呆子,并当笑话讲了出去。叶群大概怕我经不起林彪批评,专门拉着我去见林彪:“一〇一呀,小李长这么大,没打过针,没吃过药,他哪儿懂量体温啊,你不会真生小李的气吧?”林彪走过来,说道:“不生气,不生气。”我也连忙表态:“首长,我会好好学的。”林彪听了,嘴角微微一笑,转身散步去了。从那天起,我便虚心学习医道,最后也成了一名“卫生员”。

林彪平时呢称林立衡、林立果“小孩儿,小孩子”。他拿我们内勤几个战士也是当小孩子一样看待的。无论我们工作做得多么好,他从不说一句表扬的话。无论我们做错点什么事,他也不责备,说我“呆子”,那是对我最严厉的批评了。

我见到林彪对秘书发火只有一次,那就是对

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李文普。

李文普,文革前都叫他李副官。文革开始后,林彪说,不要叫副官啦,叫秘书吧,于是大家叫他李秘书。李文普被提拔为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后,又叫他李处长。他分管内勤这一摊。林彪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这些事情我们都跟他商量。

一天晚上,林彪上床睡觉前,屈真看着林彪把安眠药服下去了。林彪也许是发现了什么,他又把药吐了出来。他掰开“鲁米那”胶囊,用舌尖舔舔里面的药粉,发现不是真的安眠药,于是发火了。只见他把药扔在地上,声色俱厉地朝着屈真说:“把李文普叫来!”见到李文普走进来便大吼起来:“李文普,我枪毙了你!”李文普见林彪把药吐在了地上,便知道造假的事情败露了。他不作掩饰,直截了当地对林彪说道:“安眠药里确实掺了淀粉和维生素,是医生建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药物的副作用。”林彪不听李文普解释,又大叫:“把叶群叫来!”叶群在内勤通报林彪发现药里秘密后,便急忙往客厅赶,听到林彪叫喊就连忙应声道:“一〇一呀,我来了。你不要批评他们了,是我叫他们这样做的。”林彪大嚷:“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叶群说:“我是你老婆嘛。我是担心你常年吃大量安眠药,副作用太大呀,肝脏受不了啊!我让他们在药里掺一点淀粉、维生素,减轻点副作用,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你懂不懂啊?”叶群这几句话就让林彪的火气消去一大半。只听他对叶群说:“我睡不好觉,明天工作不好,怎么办呢?”叶群答道:“怎么办呢,以后叫他们给你吃真的,行了吧。”林彪说:“那好,那好。”

一场风波就这样简单地平息了,林彪“打假”成功。但是由于林彪过量服用安眠药,特别是半夜加服一两次安眠药,常使他第二天早起后仍然“昏睡”,甚至闹出笑话。李文普就曾经讲过林彪的一个故事:1970年5月20日首都百万人大会声援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斗争,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五二〇声明”。林彪为了圆满完成第二天的任务,头天晚上加服了安眠药,以致第二天上午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见林彪摇摇晃晃地向毛泽东走过去,扯着嗓门叫喊道:“主——席——呀,你——好——吗?”搞得全场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他。

毛泽东问他:“我好。你怎么样啊?”林彪又尖着嗓子回答:“我——老——出汗呀。”毛泽东回他:“人哪有不出汗的?”会见西哈努克时,他靠在沙发上打瞌睡。在天安门宣读毛泽东的声明时,神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对着麦克风拉着长腔说什么“我要开始讲话”,把柬埔寨说成越南,把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究竟人民怕美帝,还是美帝怕人民”这样气贯长虹的句子念得毫无生气。会后,叶群安排李春生和我去钓鱼台“旁听”审查大会的新闻纪录片,康生、江青都建议对片子作技术处理后,再在电台、电视台播放,所以,从广播里听不到林彪说错话。事后,叶群把林彪出洋相归罪于工作人员,批评内勤给林彪服安眠药“过量了”、“服晚了”,批评李文普“没有把好关”,“失职”。

叶群对工作人员发火是家常便饭。林彪对工作人员发火,我就知道这一次。林彪对子女也不发火,对叶群就没有那么心平气和了。有一次,我给林彪摆上饭,他还没有吃上几口,叶群便叫着“一〇一”进来了,林彪对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干扰吃饭,可是叶群仍然张口说:“海军李、王、张……”这时只见林彪“啪”地一声把筷子摔在茶几上,厉声说道:“你走!你走!”

林彪嫌叶群说话“啰嗦”,除非是陪他聊天、讲故事、说笑话,否则在叶群给他“说事”时,总显得不耐烦,甚至不愿意见叶群。曾有几回对我说:“去告诉叶群,叫她不要来。”林彪说不让叶群见他,叶群便不敢去见。

有一次,秘书张益民看见林彪把叶群打得很厉害扇了一个耳光,接着又拳打脚踢,还不住地骂:“这个臭婆娘,你给我滚!我要和你离婚!”叶群嘴巧,见林彪如此怒火冲天,便止住哭闹,给林彪跪下,反求林彪不要生气。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也是唯一敢对江青发火的人。1967年初,因为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人煽动乱军,肖华被抄家,林彪把江青找到毛家湾当面大骂一顿,最后大声吼叫着:“快把江青赶走!”江青走后林彪说了一句话:“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我的武斗经历

○ 丁学良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整体在武斗方面的表现,是远远逊色于重庆(当时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广西和东北的,但又比大多数的省份出色,所以在全国属于中上游。这个基本的自我评价必须“丑话说在前头”,不然会惹得表现更为“出色”的地区的人们愤愤不平。

“少将”碰上“小将”

当全国很多地区的武斗已经起步,安徽的淮南、安庆和芜湖等战略要地的局势日趋严峻,本省的驻军变得不管用之际,毛泽东亲自下令原来驻扎在江苏北部的野战部队第十二军,于1967年下半年开进安徽,实行军事管制,以图阻止武斗大火越烧越烈。

这十二军刚一开进安徽,本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间就流传:十二军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战功平平,虽然也上过上甘岭,却没有打过什么特别有名的硬仗,云云。这很可能是谣言,但没有人去核实,倒听信了它;所以对这支奉钦命入皖收拾乱局的部队,大家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敬意。当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他是1955年解放军第一批授军衔时被封为“少将”的——召集武斗两大派的头头谈判停火时,红卫兵小将们斜着眼睛瞪他:“你算老几,让我们放下枪杆子?你不过是个少将,比我们小将只多把指挥刀”。——意思是“少”字下的那一撇。

可就是这位李德生,却立刻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天赋。时至1968年年中的他,也有五十岁出头了,为着劝说芜湖市鏖战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别再把武斗升级了,他竟然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的标准行头,不戴钢盔、不携警卫、不佩手枪,只身攀登云梯,爬上三、四层高的武斗据点大楼,从架着机关枪的窗口钻

进去。

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他爬云梯的时候,两派还在隔着大街对打,步枪、机关枪点射连射没停过。他这么一招,还真管用!红卫兵们认他是条硬汉子,就服了他,把大街上的武斗据点给撤了。

李德生一身红军打扮只身入虎穴做红卫兵思想工作的作为被毛泽东知道了,大为赏识,称他是“政治将军”,有头脑。一年多后,就破格提拔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此乃上将或大将级别的要职),1973年又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一步登了天。所以我们红卫兵小将说他是“先登云梯后登天”。

围 城

我本人在红卫兵武斗中的表现,似乎还比不上安徽省在全国武斗中的表现,排列不到中上游。因为年龄小、个头小、又戴着副近视眼镜,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被编进“武卫队”,而是在“文攻队”里任一员干将。

但是我不甘心于远离硝烟的文攻生活,只要哪里有大的武力冲突,我都会插上一脚;从文革开始直到结束,都跟有惊有险的日子沾着点儿边。第一次的大危险,算是1967年的“一·一四事件”。

那年的一月中旬,位于安徽佛教圣地九华山脚下的青阳县城的红卫兵告急:他们被几万农民包围了;数日之内,会断粮、断水、断医药、断通讯。

农民进城包围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文革早期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典型方式。按照中共“党军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从省到地市到县到人民公社,各级政权党委会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该层级地方武装力量的“第一政委”。“地方武装力量”在省和地市级上是“军区”和“军分区”,统管地

方驻军。到了县和人民公社层级上,就成了“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主要管民兵组织。

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的党委书记们,级别高的,就往省军区和地市军分区里面躲——那里是“军事要地”,门口有大兵荷枪站岗,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一开始还不敢朝里面横冲抓人(过了一阵子咱们就敢了,这是后话)。级别低一些的,就往县人武部里躲。县人武部通常只有一个小院子,躲在里面容易被外面的人看见,也憋得慌。胆子特别大的县委书记们不甘心被捉去游街示众,甚至会下令调遣四乡八镇的民兵,进城护驾。

青阳县城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县人武部通过遍布乡镇的民兵系统一声令下,说是“一小撮反革命右派学生策划绑架了县委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要挺身而出粉碎右派翻天!”并且许诺——这是最打动农民的——进城来护驾的农民,管吃管喝还补贴工分(“工分”是农民下地干活的计时报酬)。这样的美差谁不要参加?于是一昼夜之间,漫山遍野都涌出成群结队的农民,把个青阳县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率领农民大军围城的一位人武部副部长发出豪言壮语:“这下子进城抓造反派学生,跟进裤裆抓鸡鸡没两样,手到擒拿!”

驰 援

围城的民兵和农民们尚未携带正规的军械,那时候的武斗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却配备着一样利器——上等树杆经烟熏矫正、笔直成线、两端镶着铁头尖刺的扁担。在我们安徽乡间,普通农民的扁担是毛竹做成的,力气过人的农民的扁担才是树杆制作的,能挑三、四百斤不开裂。青阳深山里的农民的扁担又高了一等,属于“奇门农具”:它的两端包镶铁尖,有六、七寸长,平时上山砍柴,不管是成捆的茅草还是成捆的木柴,只要扁担铁尖朝里一戳,一头一捆,担起来就走,干净利落。青阳的山民们多半会几手武艺,一杆铁尖扁担挥舞起来,四五个壮汉近不得身。

我们宣城的援兵以学生和工人为主,加上普通职员和市民,约有两千人,征得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上了路。过了一个多小时,就与其他县市来的增援车队在途中会师。快到青阳县境的

时候,已经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数百辆大卡车连接成蜿蜒几十里的长龙,发出低沉的撼地的马达声,飞扬的尘烟直冲云霄。

渐渐地,我们前头部队到达距青阳县城只有几里路的要道口。我们这几辆车属于指挥、协调、宣传众核心小组的,配备有当时能够合法非法弄到的最好的步话机、无线电发报机、小型发电机、播音系统和医疗急救设备。这时已经暮色浓重,四周的山地黑黝黝的,并不见围城的农民们在入城的要道口设障阻挡。我们估计,十有八九是这帮没见过大世面的山民们被汽车长阵给吓跑了——数百辆大卡车的灯光这时在曲折的山道上连成串串火龙,首尾呼应,气势慑人。

指挥车发出命令:全体车队马上进城,尽快与被围困的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会合,协调下一步的联合行动步骤。

这一天便是“一·一四事件”的前奏——1967年1月13日。

若干年以后我才注意到,那一天是星期五。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三号碰上星期五,预示着不是好事。

被 围

一路颠簸赶来声援的外地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随便找个能睡觉的地方——学校教室、公共澡堂、旅店客栈、机关单位、国营商店、医院诊所,倒头便睡。我们宣传组的一小群人,却必须守在卡车里,连夜赶编赶印赶发革命传单。忙到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忽然看到两个值夜班的人神色紧张地小跑过来,报告我们旁边那辆负责通讯协调的卡车上的人说:进城出城的交通要道路面统统被挖断,城周边树林里有多处篝火,人影幢幢,号角声依稀可辨。

天色越接近明亮,情况越接近明朗。等到冬日早晨的阳光把这个小山城唤醒以后,咱这一方就全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当我们从各县市赶来声援被围困的青阳县城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时候,青阳县委、县人武部也在加紧组织更多的民兵和农民赶来增援围城的人马。头一天傍晚我们在入城要道口那里嘲笑没见过大世面的山民被汽车长阵吓跑了的当儿,他们的指挥官和

民兵营长、连长们在嘲笑我们这群外地飞来的傻鸟“光着头钻刺窝”——路口上原来封城的民兵岗哨撤走是为了“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等到我们的车队开进城里，他们就趁着夜色的遮蔽，把四面八方能行驶车辆的道路全给挖开了。

我们连夜赶编赶印的传单上，把自己一方的“滚滚铁骑”（汽车大队）载来的援兵赞为“飞将军自重霄入”——那是借用毛泽东1931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的名句。在传单的结尾处套红印着这首词的下半阙三行：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们的传单散发出去没两个时辰，对方的传单就撒进城里来了。那上面也套红印着毛泽东的一首词，也是作于1931年夏，也是用的《渔家傲》词牌，不过是《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岗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他们把我们比作1930年12月底在江西龙岗大战中被红军活捉的“敌军师长”张辉瓒；张是蒋介石派去围剿共产党根据地的“前敌总指挥”。

觅 食

青阳县城里的我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虎。小小的山城里，顿然增添数千名生猛人口，原本就缺粮的状况立时变成燃眉之急。我们来的时候也随身带了一点干粮，两三顿下来，也就基本上给报销了。那个年头的我们，除了粗菜糙粮以外，肠胃里进不了多少油水，肚子的容量也就特别可观。我们常表示，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来一次军官授衔，咱们都别争高低，一律要求被封为“大尉”（大胃）得了。

到了1月14日的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满青阳县城里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了我们的车，能走路的地方都拥挤着我们的人。所有这些窜来窜去的人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找吃的。我们到处乱窜觅食，找的并不是寥寥无几、空空如也

的饭馆餐厅，而是“副食品商店”——所有那些卖糕点、零食、豆制品、瓜果和南北干货的杂货店。

我幸运地在一间后街窄巷的小店铺里买到两只麻饼，巴掌大小，约莫半寸厚，加起来七、八两重。这两只令很多人眼红的麻饼，没有亲密战友卢扁的通风报信，我靠自力更生是断然找不着的。在临近街面的所有店铺都已经被半饥饿的造反派战士几番寻觅以后，精明的卢扁决定不再白费力气在老地方周旋。他让本地的两个小男孩领着他找副食品商店，许诺——这是他从青阳县委、县人武部动员农民围城法中现买现学来的——只要找到了有吃食出卖的店铺，就给他们每人买一根棒棒糖。那两个男孩没命地领着卢扁奔后街穿小巷挨店挨铺地搜索，终于找到了一家还有少许麻饼和董糖（通称“酥糖”）的小店。卢扁掏出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钞票和粮票——那年头买食品只有钞票是不成的，还得有粮票；我们城镇户口的中学生，每人每月21斤（市斤）粮票——买了六只大麻饼。我跟踪而去，买了两只，那是我力所能及的大手笔。

绝 食

当城里能找到的吃食急速减少的同时，城里流传的各式各样的消息却急速增加。有人告诉我们，围城农民中的骨干力量民兵干部们暗地里带了手枪和手榴弹。又有人告诉我们，城里已经潜进对方的奸细数十名，分布于要害地段，以作里外策应。

围城大军迟迟没有攻进城来，主要原因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等几个党政要员被扣押在青阳县红卫兵的手里。红卫兵们十分清楚，这几个县党政头头，是策动民兵和农民围城的幕后黑手。围城农民大军的指挥部早就放话：“你们只要放了县委领导，我们就散伙回村，抓革命促生产。”青阳县红卫兵嗤之以鼻：“红卫兵小将是革命的孙大圣，火眼金睛早就看穿了你们的诡计！你们先撤兵，咱们再坐下来谈判。”

于是就形成了眼下的僵局：围城大军不敢立刻攻进城来，生怕红卫兵急迫之下伤害他们手中的人质，尽管那时候大家还不习惯用“人质”的说法。红卫兵也不敢突围冲出城去，对方的力量太

大,成千上万枝铁尖扁担结成的阵势,谅你冲出去几步也跑不远,就给生擒活捉。

围城指挥部的战术变得越来越清楚:他们要把城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围困到饿得打不了架、乏得跑不动路的地步,方才大举入城,不费吹灰之力,一个个活捉我方大小头目。

面对这样的局势,青阳县城和外地增援的红卫兵造反派联席会议当即决定:从1月14日下午六时起全体绝食。

这个决定十分及时,反正城里剩下来能吃的东西也不多了。与其被生生饿垮,不如把饥饿当作政治武器,与对方摊牌较量。

虚脱和解脱

绝食指挥大本营便设在青阳县委大院里,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那几个走资派便扣押在院内的办公楼里。我们的汽车停在院子门外两排,院子门内两排,为的是保护指挥大本营。指挥组、通讯组、宣传组的专用车和小组工作人员当然也在这个核心圈子里。

绝食斗争的中心是县委大院里的那一块场地,别处的红卫兵造反派战士可以在他们寄宿的室内绝食,而大院里的那块场地是露天的。时值1月中旬,夕阳西下之后绝食发起之时,室外气温降到只有摄氏三、四度。

报名参加室外绝食的红卫兵造反派战士约有300多人,大家席地而坐,围成几个圈圈,每个圈圈的外围是男战士,内圈是女战士。天黑以后,我们升起了篝火,柴薪便是县委办公楼里的桌椅板凳衣柜书架。我们将家具拖出来,砸碎点燃,边砸边大呼“不破不立!”这青阳山区盛产上好木材,家具耐烧,并且散发出郁烈香气。

这一夜的绝食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的光景,先倒下去两位体弱者,均是女性。她俩头晕不支,渐而眼前出现幻觉,抬去医院,也没有葡萄糖生理盐水。找来一点红糖泡开水给她们喝,她俩坚辞不受,宁愿绝食牺牲也不肯中途易弦滋补糖水。

大清早趁着少数当地人出城,我方混杂在其中几名探子,去刺探围城大军的动静,不幸半数被抓获。围城的民兵指挥部捎过话来:如果我们在城里伤害了他们一派的战友,他们就把我们的

探子点天灯。“点天灯”是山民们惩罚土匪毛贼的传统方式:把人剥光以后吊在树梢上,下面堆放松油树枝,点燃以后,将人活活烧死。人被烧烤时油脂滴下来,勾引松油树枝的火焰上蹿;远远望去,像是一盏特大的豆油灯。

1月15日的中午,又倒下去几个绝食者。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天上忽飘下雪片,支撑不住、虚脱晕倒的已达30多人。原本绝食战士还间或吟唱《毛主席语录歌》,到了这当儿,就哼不出声来了。我们宣传组的几个人靠在卡车的轮胎上,坐守着文攻的器材纸张。放眼四周,县委大院里一片白茫茫;飞舞的雪花下,暗红的篝火衬托出黑黝黝的团团人影,互相紧紧倚靠着,偶尔会发出衰弱的咳嗽声。

医院和诊所那边非常担忧,照这样下去,虚脱的人数会急剧上升,又没有必需的药品,体质差的怕难保性命。那个年头的中国人民少有营养健全的,一顿不吃,就顶不住;一天两夜不进食,哪能抵挡得了冬季的寒冷,急性肺炎之类是难免的。

绝食指挥大本营一面命令把被扣押的县党政领导们从生着炭火的里屋拖出来,搁在露天的阳台上晾着,让他们亲眼目睹绝食场面;一面加紧把青阳县城里的局势向安庆、芜湖、合肥、南京等大中城市告急。拍出去的电报一份比一份悲壮,一份比一份更撞击人心:

“青阳城里风雪交加,革命造反派战士已绝食一昼夜!”

“露天雪地里,数十名战友绝食晕倒!”

“十万火急,夜间气温零下五度,百多名绝食战友奄奄一息!”

“青阳走资派的反革命阴谋即将实现,上千名红卫兵造反派就要被饥寒夺去生命!”

这些骇人的电报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在那些与我们同属一大派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中像雪球一样滚动着,越滚越大,越滚越猛,最终向着同一个目的地——首都北京滚去。

与此同时,对青阳县头儿号走资派的再教育正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从温暖的屋里霎时被拖到露天阳台上,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的再教育便是裹在厚重的棉军大衣里,也禁不住鼻涕直淌。不多时,挂在短须上的鼻涕就变成了小型冰激凌一样介乎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东西。在是不是

应该给这几个走资派饭吃的问题上,红卫兵小将中间发生了尖锐的争执。一些人认为不给他们饭吃便违反了毛主席亲手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明确规定的“不虐待俘虏”一项。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投降,怎么可以算作“俘虏”?这几个家伙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毛主席早就教导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在一开始的时候,前一种主张占着上风,红卫兵小将甚至给走资派的阳春面里放进青葱和酱油,可是当越来越多的绝食战友衰竭倒地之后,第二种主张便大得人心。几个走资派被迫参加了我方的绝食,这些在1959—1961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期间也没少吃一口的人民公仆,终于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首次尝到饿饭的滋味。断了他们一顿晚饭,便涕泪横流地哀号,说在阳台上熬不住了,恳求小将们让他们进里屋去继续陪着挨饿。押送他们的几个小将恶狠狠地指着阳台下面的青石板正告他们:“我们绝食饿死前的最后一口气是专留给你们的——把你们头朝下推下去”!

像雪片一般飞向北京的加急电报,经由安徽省革命造反派驻京联络站和首都红卫兵的传递,终于呈报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那里。组长陈伯达和第一副组长江青口述了《四点处理意见》:指示青阳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立即调送食品和药品给城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全力抢救生命垂危的绝食人员;指示它们立即解散围城的民兵和农民;指示青阳红卫兵造反派马上释放被扣押的县党政领导干部;指示外地来声援的红卫兵造反派马上返回原地闹革命。

中央文革的《四点处理意见》堪称老到,打了我们三十大板,却打了青阳县党政头头们七十大板。可是这份及时雨般的急电却欲送无门:县邮电局的职工已不知去向,铁将军守大门;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里的机要秘书室也没有人在值班,门上贴着封条。我们随车携带的收发报机是私自设置的,严格说起来属于“非法电台”,北京当然不会朝它发送电报。中央文革最后把电报发至临近青阳的一座军用战备电台,指令部队向涉事的各方转交。

青阳城附近的军用电台用吉普车在凌晨三、

四点钟的时候给我们送来中央文革的指示;当我方的男女广播员用激动颤抖的语调念出自首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全场绝食人员——包括那几位被迫陪同绝食的走资派——都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毛主席和咱们心连心!中央文革和咱们亲又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只不过被打了七十大板的他们,喊得不如我们激情充沛。

为着让城内城外各帮各派都能尽快落实中央文革的英明指示,所有的广播车和喇叭站都开足马力,不休止地宣读《四点处理意见》;一切可以找到的油印器材,也都连夜运转起来,印刷传单,星夜散发。到了天明之际,拥护《四点处理意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贴满了小小县城的大街小巷。时至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城外的民兵和农民大军失去了踪影,我们同时也领到了急救的食物。那是我长到那么大第一次吃到咸味饼干,南京制造的。

1月16日下午,我们的车队得胜归朝,返回宣城。可怜的母亲看到我满脸青灰色,猜到这几天吃了不少苦头,泡了一碗珍贵的红糖开水——那年头城里人每户每月只配备四两(二百克)红糖——让我喝下。吞下一海碗阳春面,我心满意足地便去城北门的澡堂子泡澡,清洗满身的征尘。

半小时以后,我晕倒在热气腾腾的浴室里,被好心的同浴者架着出来;他们挺纳闷,这么小小的年纪,怎么像老年人一样“晕澡”?我像一只断了筋骨的大爬虫,在躺椅上光着屁股盖着毛巾养息了两个时辰,才爬得起来颤巍巍地走了出去;再过一会儿,澡堂子就要关门了。■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
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
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 崔秀岭

手机: 13611159388

电话(传真): 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 102488 收款人: 崔秀岭

中南海舞会见闻

○ 崔维聪

文革前的中南海里有两个娱乐场所，一个是春藕斋，一个是西楼餐厅。春藕斋便是开国领袖们周末舞会的场地，偶尔也放电影。

1955年元旦过后，春节来临。除夕吃罢早饭，我们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乐队便接到紧急通知，要我们元旦在北京饭店参加演奏的人员，于9点准时赶到总团会议室开会。接到通知后，我们20多人便从驻地西总布胡同出发，匆匆赶到了外交部街的总团会议室。

进入会议室后，我看到两个烧煤的大炉子正冒出熊熊的火舌，总团首长、军区保卫部和军区文化部领导已经等在那里。9点，会议准时开始，气氛非常庄重。总团团长沙非向我们交待任务说：“今天向你们下达一项极为光荣、极为重要的任务，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好。但是，现在还不能给你们说任务的具体内容。因为你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后对内对外，甚至对你们的父母妻子，也不能透露执行任务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你们在执行任务时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就连执行任务的地点、时间也要绝对保密。如果有谁泄露了机密，将会受到严肃的处理。现在你们就赶紧回乐队驻地，抓紧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工作。”

简短的动员会结束之后，李湘林队长立即带领我们迅速赶回到乐队驻地，整理检查所用的乐器。他还传达上级的命令说，今晚演奏，要求一律穿便服，没有便衣的，要抓紧时间上街去买，钱不够的可向财务借支。我就是没有便衣的一个，那天中午赶忙在东四商场买了一件春秋穿的布料中山装上衣。

当天下午4点半乐队食堂开饭，5点就赶到排练室集合。在那里，军区保卫部乔科长、文工团总团保卫干事及乐队领导，一起检查了我们准备携带的所有乐器、乐器盒、乐器套等。乐队的班组长还相互进行了检查，连队员穿的大衣和内衣的衣兜也翻了个遍，水果刀、指甲刀、打火机、火柴等都被掏了出来，不准带在身上。检查结束后，我们执行演

奏任务的20多人，加上从舞蹈队、合唱队挑选出来的七八位女演员，于6点多钟登上了在大门外停着的一辆破旧大轿车（事后知道是中南海管理局的车）。车子开了一会儿，便到了中南海西门。经过警卫简短的盘问，车子从西门一直往东，开到了南海边停下。我们随即下车，被领进了门楣上方挂有“春藕斋”匾额的大房子。这是一座大约200平方米的长方形古建筑，厅内雕梁画栋，古香古色，灯火通明，彩灯高悬，装饰得朴实自然，看得出是一个临时布置的跳舞场所。陪同前来的军区保卫部乔科长神秘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今晚来到什么地方了吗？告诉你们，这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首长们服务。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感到光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圆满完成好党交给你们的任务。”领队李湘林队长也激动地对我们说：“我们今天能来这里执行任务，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推荐我们来的，如果任务完成得不好，怎能对得起周总理的信任呢？”大家听了两位领导恳切的动员，顿时心里热呼呼的，心情十分激动。当时我心里就默默地念叨着：春藕斋为我们作证吧，我们一定会完成好今天的政治任务！

听完领导的简短动员，我们赶紧在小舞台上摆好乐谱，安装好架子鼓。一切就绪后，我便坐在扬琴旁再一次认真调音。晚上6点3刻左右，我看到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率先走进舞场，舞厅内开始热闹起来。大约刚过7点，我听到门口一阵骚动，有人小声地说：“来了，来了……”我急忙抬眼向门口望去，只见走进春藕斋舞厅的是朱德总司令及夫人康克清大姐。这时舞厅安静了下来了，灯光也变暗了些，我们乐队开始演奏。我记得演奏的第一首乐曲是《抗日出征歌》，第二首舞曲是《南泥湾》。随着悠扬的乐曲，朱总司令和康大姐开始翩翩起舞。我看到朱老总满面红光，带着慈祥的微笑，在跳舞

中老两口还不时地说着什么。当他们旋转到我们乐队前面时,常常亲切地凝视我们乐队。他们真诚的微笑和示意,像一股暖流直达我们演奏员的心房,使我们倍感激动,倍感亲切,倍感鼓舞。

我听战友们说,朱总司令来跳舞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他跳舞时对音乐节拍的感觉稍差,不管是什么步伐的乐曲,他都是不紧不慢地按着自己的节奏走,加之年纪较大,因此每支舞曲他只围着舞厅转一圈就会坐下休息。后来我们总结了经验,给朱总司令伴舞,所选乐曲要短些,以民乐为主,以节奏较慢的慢四步、平四步乐曲为主。在演奏中,我们不是要求朱老总跟着音乐节奏走,而是我们的鼓手跟着他的步子快慢走。因此,朱老总对我们乐队的演奏十分满意,他老人家跳得也特别开心。

9点半左右,小舞台对面的门突然打开,刘少奇和王光美进入春藕斋。他们快步走到朱老总落座的沙发前,笑容满面地伸出双手向朱老总及康大姐拜年问候,感情十分亲密。他们交谈几分钟后,刘少奇退回了座位。这时,我们的管弦乐队替下了民族乐队,继续演奏。我是民乐队扬琴演奏员,又是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演奏员,和我一起成为多能演员的还有方生、靳囚、吴光祖、黄家峰、王永振、赵学仁等同志。我们这些同志从晚上17点到凌晨4点,不停地演奏了长达10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很幸福。当乐队响起了轻松愉快的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小路》等舞曲时,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双双起舞。这时我看到,朱总司令、康大姐悄悄地走向衣帽间,由警卫员陪着离开了春藕斋。

刘少奇夫妇一起跳舞的次数要比其他几位领袖多些。他们俩舞姿潇洒协调,配合默契,还不时地亲密交谈,有时还会旋转到舞池中央转两圈或三圈,跳出一些花样来。大约晚上10点多钟,周恩来总理突然从侧门进入舞厅。邓颖超不喜欢跳舞,所以没有跟来,我们团选来伴舞的几位女舞蹈演员便一拥而上,争着和总理跳舞。周总理进入舞池后,一边跳舞,一边和刘少奇夫妇打招呼,互致拜年问候,还向在场的陈毅、贺龙等打了招呼。这时候舞厅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乐队奏响了《多瑙河之波》《杜鹃圆舞曲》和探戈《鸽子》《宝贝》,还奏响了欢快的《春节序曲》等,把节日气氛推到了最高点。

23点40分左右,舞厅里突然响起一片掌声和欢笑声,接着便听到有人高呼:“毛主席来了!毛主

席来了!”全场人员立马站起来迎接毛主席。我看到毛主席是从北门走进春藕斋舞厅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纷纷迎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手,向毛主席致以拜年问候。毛主席也高兴地挥舞双手高声问候大家:“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这时候现场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开始奏乐。我们民乐队演奏的第一首乐曲是《浏阳河》,第二首是《湖南花鼓戏》牌子曲。毛主席第一场舞是和江青一起跳的。江青当时还没有担负什么公职,又很少与新闻媒体接触,所以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并不是太多。江青虽然是个跳舞高手,但在跳舞中很少笑容,很少说话。我们直观感觉,毛主席和江青的舞跳得并不是很协调。那晚,毛主席身穿一套浅灰色旧中山装,脚上穿着已经脱色露出白色折纹的棕红色皮鞋。毛主席和江青跳了一曲之后,就与我们团舞蹈队和歌唱队的女队员跳了。这个时候,我看到毛主席就像父辈对待自己晚辈那样亲切,那样自然慈祥。他与我团的女兵协调地跳着,还不断地交谈和询问着什么。经过乐队面前时,毛主席还总是抬头望着我们,透露出对我们的关爱和谢意。我们乐队队员都感到无比的激动与幸福,心情真是难于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我们只能将真诚的情感,注入到音乐旋律中,让我们的幸福与快乐的音符一起在春藕斋里飞翔。

(作者曾为解放军战友歌舞团作曲家)

(责任编辑 黄 钟)

贵刊2014年第1期第39页《李震自杀前后》的结尾倒数第二自然段中涉及“二陈”案件的表述,有两处与事实不符。本人自广东省解放初期,至1951年发生“二陈”案件及其之后,一直担任广东省公安厅机要秘书。首先,陈泊不是“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案发时是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其次,“二陈”案件基本上没有牵连广东省公安厅的干部,而且“二陈”案件发生时,广东省公安厅的干部总数也不足700人。

公安部离休干部 王素徽

更 正

今年第7期第32页左栏第9行中的“杨秀峰”应改为“谢觉哉”;《亳县“特殊案件”的记述》一文中的“泾庙”应为“三圣庙”,“城关公社”应为“城父公社”,“张任大队”应为“张沃大队”,“营教所”应为“劳教所”,“刘窑林”应为“刘窑村”,“李8大队”应为“李腰大队”。

对“农民起义”认识的多重误会

○ 叶林生

学者已经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一两人,如何能叫“农民起义”?其实,不仅是宋江起义,历代被称作“农民起义”的大抵都名不副实。这是由多重误会引起。具体地说,是由古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所引起。

(一)

中国古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实际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何谓“农民起义”?在本世纪之前众多的研究农民起义的文章中,或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谈,没有人真正做过科学的界定。最具权威性的《辞海》解释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英汉词典》的中文解释是: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农民战争。是不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问题下文再谈,这个解释从修辞学上看是同义反复,“起义”换成了“武装斗争”或“战争”,意义差近;却没有说明农民“武装斗争”、“农民战争”的本质含义:是农民发动的、领导的斗争、战争,还是农民参加的斗争、战争?回答这个问题才是诠释“农民起义”的关键。

我们认为,所谓“农民起义”,应当是指农民发动和领导的起义。至于参加者,并不是决定起义性质的主要因素。譬如,西汉的铁官徒起义,参加者都是官营冶铁作坊的手工业工人,若由参加者而论,能定性为工人运动吗?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参加者多数是农民和工人,也不能称为农民起义或工人运动。至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参加者主要是农民,但并不是,也不应当等同于农民起义。这个道理是十分简单的。

既然如此,我们来看看历代的所谓“农民起

义”吧。先从本文开头所说的宋江起义说起。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有地主(如晁盖、卢俊义等),有下层吏员(宋江等),有落魄书生(吴用等),有猎手(解珍、解宝等),有渔人(阮氏兄弟、张横、张顺、李俊等),有流氓无产者(时迁等),有宗教徒(公孙胜等),有马贩(段景住等)。这些发动者、领导者都不是农民,显然不应当称作“农民起义”。

宋江起义只不过是历代所谓“农民起义”的缩影。两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起义,只有少数是农民发动和领导的,大多数很难说是农民起义。秦末起义的陈胜此人,过去说是佃农,近来互联网上提出了许多疑问,我们不去讨论。东汉黄巾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是道教徒,其参加人员多为太平道的信徒,其中有农民,也有其他人员,成分复杂,不能以农民概括。隋末大起义中,杜伏威、辅公祐是贫苦农民,其他则形形色色。如著名的起义领袖人物窦建德是游侠,瓦岗军的发动者翟让为下层吏员,其后的领袖人物李密则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瓦岗起义的参加者则以渔猎手为主;其他起义的领导者如李子通“少以渔猎为事”,高开道则是盐户出身。唐末大起义中,最著名的发动者领导者王仙芝、黄巢都是盐贩;桂林戍卒起义的领导人庞勋出身于中下级军官。北宋的王小波、李顺都是茶叶贩子。元末大起义情况更为复杂,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但郭子兴、明玉珍、芝麻李等都是地主,张士诚、方国珍则是盐贩,陈友谅是渔民出身,曾为小吏。将他们发动和领导的起义统纳入了“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框框中,实在过于牵强。

以往,学界对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大抵用两种办法来解释,但两种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有强词夺理之嫌。

一是“代表说”：“许多起义领导者虽然不是农民,但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这种解释实

在令人哭笑不得：人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说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在二者激烈对抗的关键时刻，又让许多（绝不是个别的）地主分子来“代表”农民，这不是逻辑混乱么？退而言之，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农民利益，那和他们是不是“农民起义”也无关系。譬如上文所说的近代史上的革命，从反抗专制统治阶级的意义上说，应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毕竟不应归为农民起义。

二是“投机说”：“某些地主分子成为起义领导者，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投机，他们混迹于起义队伍，篡夺起义领导权”。何谓“投机”？无非是借起义之机实现个人野心，改朝换代、称王称帝吧。如果这样看，那么，朱元璋等真正的农民又何尝不是为了“王图霸业”？陈胜起义之前就想着“富贵”，起义之初就做起了“陈胜王”的美梦，这见诸《史记》。是否也可归为“野心”或“投机”？中国古代的起义队伍中，如隋末的“官二代”李密等投机者诚或有之，但在许多情况下，实为强加之罪名。如明末起义的芝麻李，灾荒时将自家的一仓库芝麻拿出来赈济贫苦农民；明玉珍则广散家财，号召起义，他们在农民“觉醒”之前就在进行起义的宣传、发动工作，以后为起义而献出了生命，说他们“投机”岂不冤杀人也？学术界这种“因人定性”的手法还有客观标准可言么？

我以为，历代起义者身份的复杂性，是由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而将人员复杂的起义统称为“农民起义”，也是由于对“主要矛盾”的误解造成的。若干年来，学术界认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以，起义这种激烈的阶级对抗自然就是打击地主阶级，起义者自然是主要矛盾的另一方——农民阶级，“农民起义”就这样被定性了。不难看出，这种归类法其实是为了证成对古代社会主要矛盾似是而非的论断中延伸出来。

（二）

中国古代社会的矛盾到底是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我的回答：不是。主要矛盾

应当是官僚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矛盾。

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正是官僚政治形成的时期，《墨子·尚贤》中就说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话，正是基于官“贵”民“贱”、两者对立的事实而发的。宋元之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更明确地说：“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役和被役，正是压迫剥削和被压迫被剥削、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是古代官僚政治下官民对立的纪实。换言之，官民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前几年，叶文宪教授在《重新解读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官民矛盾”。

不可否认，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但和官民矛盾相比，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其一，由历代记载来看，农民受剥削压迫最深重的是官僚阶级和维护官僚统治的政府，而不是地主。我们从历代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中可窥知大概：

《华阳国志》中的诗句说：“……有吏来在门……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是官吏在催租逼债。

唐人杜甫诗《遣遇》中说：“贵人岂不仁，视汝为莠蒿，索钱多门户……渔夺成逋逃……”视民如草芥，以名目繁多的手段勒索民众钱财，逼得百姓逃亡的是“贵人”，也就是官僚。元结在《舂陵行》诗中也揭露贫民虽吃草根木皮，官府仍然催逼不已，只好卖儿卖女的惨剧。

宋人梅尧臣在《田家语》中说：“官府令又严，老吏持鞭扑”。王安石《河北民》诗中说：“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陆游《剑南诗稿》中记载了欠租农民被抓到“县庭”，“日夜穷榜笞”的事实。

这类诗句在元明清诗人笔下何啻十百，无须多引。历史记载中也不乏其例。据《新唐书》记载，大官僚段秀实拥有大量田产，出租时与佃户立约，将收入之一半交给他。有一年遇特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无力交租，请求减缓。段秀实说：“我知人，不知旱也。”这种大官僚毫无人性，

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只知道催租逼债,置农民死活于不顾。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对农民横征暴敛,榜掠拷打,逼得农民妻离子散的主要是官僚阶级,而不是地主。查历代起义的直接原因,几乎都是官府压迫、敲诈勒索所引起。因此,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矛盾,不应当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有人说,官僚也用地租剥削,所以也属于地主阶级,其实,这是皮相之论。不管官僚之家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地租收入,他们都不同于庶族地主。因为他们主要靠权力剥削。

正因为这样,历代起义首先打击的是官僚阶级。据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说,唐末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以至于像韦庄诗中所说的那样:“天街踏尽公卿骨”。宋人方腊“以官为仇”,凡得到官吏,必施以杀戮、残尸等酷刑。元末陈友谅起义军,每攻克一地,得官员皆活煮之。今天人们可以责备他们过于残忍,但这个问题当另作别论。这些行为所反映的是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性质。一部《水浒传》,也揭示了“官逼民反”、官民对立的真实。应当说官僚阶级与广大民众的矛盾是居于首要位置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民众起义打击官僚、推翻官僚阶级的统治就是必然的。

其二,地主——我这里说的是真正以田产业、没有官僚背景的庶族地主,他们也属于“民”的范畴,这个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用地租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官僚阶级欺压的对象。从道理上讲,地主比农民有更多“油水”,官僚对他们搜刮、掠夺更能获利。《红楼梦》中,兼有皇亲国戚身份的贾赦,为了得到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借知府贾雨村之手,巧取豪夺,反诬陷石呆子“拖欠官银”,抄家抵债,夺其古扇;石呆子是不是地主姑置不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官僚为夺人土地,霸人钱财而诬人为盗、陷人于法的事不胜枚举,其中许多被害对象就是庶族地主。因为地主有一定财产,官僚可以从他们身上掠夺更多钱财。据陶宗仪《辍耕录》说,元末朝廷公开卖官,派官员到比较富裕的江南各地“劝募”。但其时元王朝“气数将尽”,无人肯为其殉葬。松江知府为讨好朝廷,将各县“富户”拘押起来,逼其买

官,如果不肯买,就严刑拷打,被打者“号泣求免,勿之顾”,直到同意买官为止。这些“富户”多数正是没有权力背景的庶族地主(也有商户,但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商户应是少数)。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各王朝都有一些地主出身的人及商人投身起义就不奇怪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级和民众的矛盾,虽然历代参加起义的人员情况复杂,但大致都属于“民”的范畴,统统可称作“民众起义”。这样我们对历代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成分多样就释然了;同时,也就不必牵强附会地把某些武装斗争都称作“农民起义”了。

(三)

说过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来谈谈“起义”的问题。

近二三十年来,历代民众起义备受鞭笞,什么“破坏性极大”,什么“邪教猖獗”,“没有积极意义可言”等等。而“起义”是个褒义词,这样看,称作“民众起义”似乎也大有问题。我们姑且用一个中性词“暴动”来加以讨论。

要讨论民众暴动的意义,首先要看其正当性或正义性,这决定其本质属性。

如果有人认为,民众暴动没有正当性,正义性,就需要同时明确承认,他们受官府、官僚剥削压迫,催租逼债,甚至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惨剧就是应当的,天经地义的。那么,这和历代贪官污吏的立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民众暴动的落后性,破坏性是毋庸置疑的,某些学者把民众起义无限抬高、吹得天花乱坠是错误的。所以,作为研究,适当指出其落后性和破坏性也是必要的。但这绝不当成为否定其正当性的理由。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人们无法要求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具有多高的水平。不仅是民众,就是饱读“圣贤书”的官僚也是如此。他们“超经济强制”、“竭泽而渔”式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压迫是非理性的,首先是他们不断地破坏着、摧残着社会生产力。史不绝书的“赤地千里”、流民“转死沟壑”等记载,固有天灾,但更多的是人祸。而人祸无疑是官僚阶级非理性的剥削压迫造成。因此,民众暴动的非理性色彩,包括严重的破坏性,就不奇怪。落后的剥削压迫

手段,落后的反抗方式,都不过那个时代的产物。某些人专门无情地鞭笞民众“起义”恐怕另有原因。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种言论都不过是一定阶级利益的诉求。鞭笞民众起义,否定其积极意义,实际反映的是害怕民众、仇视民众起义的官僚阶级的意志。

(四)

上文说到,庶族地主是官僚压迫剥削的对象,还说到地主和农民也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那么,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不是同一个阶级?官僚阶级是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以往,大量的著作中,都将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视为一体。许多著作中的论题明明是“地主阶级”如何如何,但所举的例子几乎全是官僚的,如此偷梁换柱,视为当然。这其实是由对主要矛盾的误解而迫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以为,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不能混为一谈,它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说过,中国的官僚“一方面和地主有共通的利益,一方面却与生产组织中任何阶级利益不同”。他认为官僚阶级有别于其他“任何阶级”是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同于地主阶级的特殊阶级,是基于以下两条主要理由:

其一,官僚阶级与地主阶级财富来源不同。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各阶级》一文中说: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就是说,地主阶级的财富来源是靠地租。官僚阶级占有巨幅田产,地租剥削是重要途径,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地主有某种表面的共性。但是,除地租之外,官僚还可能有商业剥削,有利用权力获得的灰色、黑色收入,还有俸禄。就是说,其财富来源有很多途径。我们今天无法确知、事实上也没有必要确认哪一项是官僚财富的主要来源。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官僚拥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地租收入,也无论他们的收入有多少途径,基本是依赖权力而获得。就是说,他们和地主阶级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迥然不同,而来源于权力。

俸禄、受贿、勒索与权力的关联显而易见,姑且不论。即以官僚的土地而言,人们大抵可看到权力杠杆的作用力。官僚获得土地无非有两条途径,一是皇帝赏赐,各王朝开国之初对“从龙功臣”往往赐以“田宅”,以后遇到重大庆典或“功勋”也常常赐田。这是他们田地的公开来源,这无疑是与权力捆绑在一起的。其二便是侵占掠夺。《汉书》载,西汉开国功臣萧何“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成帝年间的三公张禹,“家以田为业”,本是一个地主,“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他“富贵”之后才能“买”如此巨幅良田,利用官权是无可置疑的。《隋书》说,权臣杨素“营求产业”“爰及四方都会,邸店、水碓、并田利以千百数”。《新唐书》说,大官僚李愷“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唐玄宗时多次充任考校使的官僚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宋代开国功臣赵普“抢占人田宅”,见诸御史弹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强贱买”也罢,“营求”也罢,“强占”也罢,“殖”也罢,都不过是以权力霸占的变相说法。从史书的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到,某些官僚被罢官夺职,往往被抄没田产家财,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霸道”,因为他们的田产家财是和官职、权力捆绑在一起的,财随官去,于理不悖。这是官僚不同于地主的根本之处。这样,我们就不能因为官僚拥有田地就把他们与地主归于同一阶级。

其二,官僚阶级与地主阶级经济基础不同。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认为,官僚阶级“其阶级的生存赖赋税”。似乎认为“赋税”是其基础。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认为,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并认为,两税法是支撑官僚政治的第一大杠杆。似乎也认为赋税是官僚阶级的基础。但我们略一思考就知道,现代民主政治下官员的生存也是依赖于赋税,这样岂不是混淆了民主政治下的官员和官僚政治下的官僚阶级的界限?

我认为,古代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其权力笼罩下的一切经济形态。马克思说:“在中世纪,权力、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宫廷官职和审判权等等是各个特殊等级的私有财产,各个省是各别的诸侯等等的私有

财产……我的权利也是特殊的私有财产。”中国古代正是如此。权力是官员发财的主要手段：审判机关可以卖法，官员选拔机关可以卖官鬻爵，行政机关可以收取苛捐杂税、陋规之费，其他官员都可以用相应的权力敲诈勒索，如此等等。他们所依靠的正是手中的权力。所以，不论官僚名下有多少土地、多少手工作坊、多少商铺、多少生产工具，也不论他们拥有多少佃户、多少奴隶，更不论有多少财富“该由”他们所得，只要权力所及，统统构成他们高踞于社会之上、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基础。这似乎用不着繁琐的论证。

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古代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就是他们权力网络所及的（包括直接间接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而不只是土地。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是一个与地主阶级有本质不同的阶级，不应当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能认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从上到下结成一个或几个权力网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只代表本阶级集团的利益。

（五）

以上我们论证了古代“起义”应是反对官僚阶级的“民众起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级和民众的矛盾。本文论题中规定的内容似乎已经说清。但人们要问，皇权在社会主要矛盾中处于什么位置？

我们认为，皇权既不是官僚阶级的代表，也不是民众的保护神。它代表的是新贵族阶级的利益。

所谓新贵族阶级，是相对于春秋之前的旧贵族阶级而言的，是指以皇帝宗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其裂土分封、父死子继、享受特权等制度与旧贵族有共性，但也有许多差异。因此，我称其为新贵族阶级。

帝王代表的只是新贵族阶级的利益。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臣民和他的家族之间，他完全代表家族的利益，刘邦、朱元璋可作为典型，他们把子弟、亲属分封为王，盘踞各地，是为了依靠血缘的力量

“拱卫社稷”。刘邦明确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朱元璋则认为，反对他分封子弟的官员是“离间吾骨肉”。在他们看来，天下财富是“我家的”，皇家的“奶酪”是任何人都不能触动的。

其二，在自己和家族其他人之间，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维护自己的独裁专制之权。无论父子之亲，夫妻之爱，谁敢触动他的权力神经，都将毫不留情地被杀逐，汉武帝、唐太宗等所谓“英武之君”逼得太子造反，把自己的儿子送上绝路，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那把龙椅神圣不可侵犯。

由皇权的这种极端自私性决定，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它处于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位置。

一方面，它依赖于民众，因为民众是主要的纳税对象、是劳役和兵役的来源——没有民众，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所以有保护民众的愿望，也常常推行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措施。譬如，刘邦进入关中后“约法三章”，符合民众愿望；西汉中期设部刺史，以“六条诏书”监察郡县官员，“六条诏书”中，就有五条是针对地方官员勾结豪强残害民众的，此举也有保护民众的意义；体现皇帝意志的诏令、训示、经济措施中也多有“关心”民众的内容。譬如，历代帝王们推行“均田”等措施，也是为了抑制豪强兼并，对小农有好处。这样看，帝王似乎代表着庶民阶级利益。

官僚阶级作为皇权的派生物，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角色，无疑受到皇权的倚重。皇帝对官僚的封赏、褒奖，皇家法律条文中对“朝廷命官”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这样看，皇权似乎是官僚阶级的代表。

但是，由皇权极端自私的本质属性决定，皇权与官僚阶级和民众的一致性只不过是其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的手段、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权术。他们往往两手兼用，因时而变，各尽其妙。

正因为如此，皇权在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可一概而论。从理论上说，官僚阶级是皇权的延伸，但一旦分化出来，就异化为对立物，在天下大定的和平年代，皇权与官僚的矛盾对立是主要的。他们或则担心官僚任意横行，搅乱天下，动摇其家天下统治；或则忧虑官僚拉帮结派，政出私门，削弱其权威；或则担心子孙无法驾驭能臣猛将而大权旁落，江山易主；或则惧怕官僚利用手中大权，弑君自立，取而代之。他们常为官僚的处置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正如王亚南先生在《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所说,皇帝“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下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这样,皇帝常常打击贪赃,以安民心;有时责备官僚,以示爱民。《贞观政要》载,唐太宗认为:百姓之所以“为盗为匪”,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四川少数民族起义,益州大都督窦轨奏请派兵镇压,唐太宗说,对这些民众只能示以恩信,“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耶”。有时民众闹事,皇帝打击官僚以息民怨。

从另一个侧面看,民众起义也常将皇帝与官僚区别对待,宋江起义“反贪官不反皇帝”即可说明。李自成的即位诏书中说:“君非甚闇,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僚。所以,在某些情况下,皇权不处于主要矛盾的位置。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以皇权为核心的新贵族阶级从本质上说是个寄生阶级,与广大民众同样是剥削压迫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关系。上面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某些特

定情况下,尤其是王朝末年,大规模民众起义爆发时期,皇帝从维护自身的统治出发,往往委派大员统兵镇压,严令清剿。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与官僚阶级处在同一条行将沉没的破船上,二者只能生死相依,它自然处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中心位置。这个结论不影响古代社会的“官民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总体判断。■

(作者为苏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本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010-84608877 400-610-0896

盒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60530 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60710 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2460711 号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注: 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内容 或注意到事项详见说明书
苏医械广审(文)第 2013120253 号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

○ 姚轩鸽

“税收国家”内涵与类型辨析

(一) 内涵

“税收国家”不是指主要依靠税收收入生存的国家。有国家就有税收,有税收即有国家,国家的性质与形态决定税收的性质与形态。同样,“税收国家”也不是指传统的,或现代的,更不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或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当然,也不是指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公有制的或私有制的,等等。

质言之,“税收国家”的真正内涵在于,谁的“税收国家”,或者说,谁主导的“税收”国家。进一步说,是指由一个人主导的“税收国家”,还是由几个人主导的“税收国家”?是大多数人主导的“税收国家”,还是全体人主导的“税收国家”?精确地说,是指由一个公民主导的,还是由几个公民主导的?是由大多数公民主导的,还是全体公民主导的?无疑,虽然所有国家都是“税收国家”,但唯有“全体公民主导的”“税收国家”才是完备的“税收国家”,由“一个公民主导的”“税收国家”是最不完备的,由“几个公民主导的”“税收国家”是次不完备的,由“大多数公民主导的”的“税收国家”是次完备的。

(二) 类型

事实上,唯有从税收的本质属性——税权——出发对国家形态的分类,才有可能真正触及国家与税收的本质。凡是拥有国家最高权力合法性的税收,就是合法性税收。国家最高权力的性质,也就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它决定着税权的合法性,决定着税收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平等与否,决定着“税收国家”的基本结构是否坚实,以及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增减。

问题更在于,国家最高权力的性质,取决于一个社会究竟奉行的是什么政体:君主制,寡头制还是民主制?也因此,“税收国家”就分为“君

主制税收国家”、“寡头制税收国家”与“民主制税收国家”三种类型。如果以最高权力执掌人数为根据的话,税收国家则可分为两类四种。两类是:“君主制税收国家”与“共和国制税收国家”。四种是:“君主专制税收国家”或“无限君主制税收国家”与“分权君主制税收国家”或“有限君主制税收国家”,以及“寡头共和税收国家”或“贵族共和税收国家”与“民主共和税收国家”。

“民主制税收国家”或“民主共和税收国家”是多数公民或所有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包括税权);“寡头制税收国家”、“寡头共和制税收国家”或“贵族共和制税收国家”是少数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包括税权);“专制税收国家”、“君主专制税收国家”或“无限君主制税收国家”是一个公民独掌最高权力(包括税权);“有限君主制税收国家”或“分权君主制税收国家”是指一人为主而与其他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包括税权),是指一个公民受到其他公民及其组织限制地执掌最高权力(包括税权)。

这仅仅是“税收国家”的基本类型。如果这四种类型组合起来就可形成“税收国家”的各种混合类型,有十六种之多。如果君主与贵族精英以及庶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包括税权),就有四种组合:君主、贵族精英(寡头)和庶民三者同等执掌最高权力(包括税权),以及分别以其中之一占据主导地位与其他二种不同等的执掌最高权力(包括税权)。

就内容与形式的一致与不一致而言,混合类型的“税收国家”还有其他形态。混合类型的“税收国家”是指由于不同政体在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上的混合,也即一种政体作为形式,另一种政体作为内容而形成的混合类型的“税收国家”。典型如,一种“税收国家”名义上或形式上是民主制的,而实际上或内容上则既可能是民主制的,从而形式与内容一致;也可能是专制的,从而形式与内容不一致。而这种形式与内容或名义与

实际不一致的“税收国家”则是一种混合类型。也即,基于一种政体的“税收国家”只是一种形式,而基于另一种政体的“税收国家”则是内容。而且,内容与形式不一致——或名义与实际不一致——的混合类型“税收国家”在全部混合类型中,是最重要也最具现实意义的。从理论上讲,名义与实际不一致的混合类型“税收国家”有12种。而历史与现实也一再告诉我们,“民主制税收国家”是最灵活的形式,也是最容易更多地被用来当作任何“税收国家”类型的外在形式;“专制税收国家”则是最灵活的“税收国家”内容,是最容易也更多地可能借助任何“税收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名义有限君主制税收国家而实为民主制税收国家”等混合类型也相当重要,比如英国。而名义上是民主或共和而实为专制之“税收国家”混合类型,主要见之于像苏联这类国家。

中国目前处于“税收国家”的哪个位阶

中国要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从根本上消减现行财税治理体系存在的系统误差,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首先问题是,中国目前处于“税收国家”的哪一个位阶?即处于最高、次高,还是次低、最低的位阶?

坦率地说,中国目前仍然属于不完备的形态,处于“次低”位阶。这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国家最高权力(税收)缺乏坚实的民意基础。直言之,当下中国税收的重大问题决策权仅由少数官员执掌,诸如征多少税,向谁征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用税等等重大税收问题的决策权,都是由少数官员执掌,大多数国民只是在形式上享有国家的最高权力(税收)。而且,对此官方也毫不避讳。

当然,就国家最高权力和税收的形式与内容一致与否而言,当下中国仍然处于在形式上和名义上都是由全体公民掌握,属于“民主制税收国家”,但实际上却由少数官员掌控。因此,唯有通过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夯实财税权力的民意基础,促成财税体制、“税收国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直言之,税收问题其实就是国家问题,国家

问题就是税收问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必有什么样的税收,有什么样的税收必有什么样的国家。唯有根据政体性质对“税收国家”的分类,才是“税收国家”理论实现其文明功能的根本所在。或者说,政体如果不优化,国家文明就不可能进步,税收文明就不可能得到提升,建设完备的“税收国家”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的近、中、远期目标

中国要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近期目标在于:

第一,要降低税负,规范各级行政规费,避免“费”挤税,防止税收滥用,防止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争利。因为就完备型“税收国家”的内涵而言,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分配是基本诉求。但面对现实,由于税收合法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税收长效监督机制不健全,税收滥用的现象比较普遍,纳税者税负比较重。而且,纳税者承担的费负也不轻。因此,近期目标应在于如何降低税负,规范各级行政规费,以免过重的“税费”压垮纳税人。

以2013年为例,中国财政预算内收入仅占GDP总量的22.58%。问题在于,去年中国政府全口径收入21.9382万亿。其中,财政预算内收入129143亿,政府性基金收入52239亿,社会保险费收入约28000亿,可能如交通、计生、城管等没有纳入政府基金的收入最少约10000亿。去年GDP总量57.2万亿,因此,宏观税负达到38.35%。与此同时,“用之于民”,特别是“用之于民之所需”的状况并不能叫国民满意。直言之,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性价比太低。还是以去年为例,全国财政支出已攀升至13.97万亿元,增长10.9%。但其中教育支出只有21877亿元,仅占财政收入的15.65%;医疗卫生支出只有8209亿元,仅占5.8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只有14417亿元,仅占10.31%;住房保障支出只有4433亿元,仅占3.17%,四项合计仅占35%。而且,如果把非税收入也纳入总预算的话,这四组数字之低,或更为尴尬,而去年国家用于国防的预算为7201.68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15%。

第二,亟待建立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汇总

纳税人真实税收需求和意愿。在税权民意基础尚未夯实,而且不可能短期内扩大的现实下,如果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及时汇总纳税人的真实需求,诸如交税意愿与用税意愿,或可暂时缓解征纳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为全面地解决中国财税治理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问题,为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赢得一些时间与机会。

第三,关键是要建立“闭环式”税权监督机制,防范税权滥用对纳税者利益的系统性伤害。“闭环式”意味着,税权监督无“死角”,特指对最高税权的实质性监督要有力有效。因此,在根本性的“闭环式”税权监督制度尚未建构的当下,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启动,对税权通过民主选举的基础制度进行实质监督的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或许只能仰赖于有限的内部与外部税权监督机制去防范税权滥用。

第四,建立“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唤醒纳税者的税痛,为彻底全面的税改积聚动力。当下中国实行的是“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间接税是一种价内税,是一种可以转嫁税负的税种,是一种纳税人与负税人可能发生背离的税种,也是一种容易麻痹纳税者“税痛”神经的税种。因此,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安排下,纳税者虽然交了税,但却既不知道自己交了税,也不知道自己交了多少税,不关心自己财富的去向,也不会有意识地去监督税权,追问政府对税款的实际用途与效率,自然也就容易压抑纳税者的权利意识。但直接税就不同,纳税者每交一分税款,心里都很清楚,最容易唤醒纳税者的真实税痛,有助于培养纳税者的权利意识,追问税款的真实去向,要求财政透明,预算公开,监督政府对税款的使用效率。

第五,推动财政透明、预算公开改革,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建立完备型的“税收国家”,也就是建立透明财政、公共财政的过程。现实是,秘密财政仍然是当下中国的基本形态。而秘密财政正是建立完备型的“税收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这个障碍不排除,真正的财税体制改革也就没有实质性启动。而且,财政透明、预算公开本是实现税权监督的前提。

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连续4

年推出的“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报告,按百分制计算,2012年没有一个中央部门在预算透明度上得分超过50分,得分最高的环境保护部只有43.8分。又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披露,以市级政府为例,据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数据显示,81个市政府,达到全国财政透明度平均水平的仅43%。将平均水平作为及格线,多数市政府“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仅有7个城市过线,及格率仅为8.6%。“财政透明度”最高的前三名为北京、上海和河南南阳。

第六,建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减少权力对国民的侵害。这件事民间呼吁了多少年,至今没有实现,呼吁者还受到打压。

中国要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中期目标在于:

第一,全力推进民主化建设,解决国家最高权力及其税权的合法性问题。相对民主法治国家而言,民主制的“税收国家”属于次完备型的。就是说,以民主制政体为基础的“税收国家”,就是税权民意基础已经实质性扩大的“税收国家”。因此,民主化建设的推进当是次完备型“税收国家”建设的必要前提,自然也是完备型“税收国家”建设的前提。没有民主,税权的合法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这自然意味着,税权的监督缺乏制度性的根本保障。

第二,改进国家最高权力与税权内容与形式背离的现状。最高权力与税权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强力,更在于它是一种应该且必须的强力。而缺乏应该性的强力,只能是暴力。因此,全面实行民主制,必须有赖于国家对民意的真诚尊重与敬畏。建立民主制是实现大多数公民平等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及其税权的唯一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国家最高权力及其税权内容与形式背离的现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改善,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还权于民众和纳税人。

第三,要建立“闭环式”最高权力及其税权监督的长效机制,包括官员问责制。这显然是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的一个中长期目标。要把权力(包括财税权力)真正装进制度的“笼子”。而且,最近的途径,无非是公开与透明;最有效的制度,无非是民主制。

中国要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远期目标或

在于：

第一，税收思想要解放。如果继续固执于“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按照预定标准，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形成的社会产品分配”的概念，仍然固守税收的“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狭隘认识，不从税收与国家的共同本质去思考“税收国家”，进行理论创新，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根本也只是纸上谈兵。

税收思想解放的关键是：要尊重纳税人的主体地位。既要把“纳税人当人看”，更要“使纳税人成为人”，诸如在征多少税，征什么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用税等等重大问题上，应该且必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而且，“未经纳税人同意”，既不能征税，也不能用税。完备型的“税收国家”，一定是纳税人主导的。在这样的国家，征税人不过是纳税人公共事务的代理人而已！

第二，建立民主法治，实行国家最高权力及其税权的“闭环式”监督与制衡。民主法治是完备型“税收国家”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第三，建立国民基本权利保障机制与违宪责任追究制。建立完备型“税收国家”，就是要建立纳税人基本权利保障机制。唯有民主法治才是国民基本权利保障最为可靠的制度平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受到限制。”而要发挥宪法对国家最高权力和税权的制衡作用，则需要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来保证。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是完备型“税收国家”的必要条件。

中国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的阻力与障碍

中国要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其阻力与障碍，概括地说，在于现行财税体制培育的特权阶层及其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有四类：

一是由各级官员构成的权力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群体的财税特权，一方面来源于制度性的安排，一方面来源于权力拥有者滥用权力所致。前者大多合法但不合情理，后者则既违背法律，也不合情理。前者如职务消费、医疗特权及其自由裁量权等，后者主要是指腐败、寻租等行为。因此，自会从制度上首先给予各级官员特殊

的利益。而在这一权力群体内部，主要奉行的是按照权力大小分配利益和好处的不公正原则。一般情况是，官职越高，享有的权利与利益就越大，官职越小，则享有的权利与利益就越小。

这一利益群体当下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一个单位一个太阳”式的“一把手”权力独裁格局。其次则是公共权力“集体世袭化”的倾向，或者说“云世袭”的公权私授与传递格局。而目前正在转移和传递的特权，无疑继续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扩大着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与撕裂。最后则是由于官员职数有限导致的岗位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也在大规模地恶化官民关系，加剧官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具体说，由于官员提拔之路狭窄与拥挤，大多数基层官员与公务员，其理性的选择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使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二是指依靠财政供养的既得利益群体。这类既得利益群体，是指一切依靠纳税人税款供养的事业单位等机构和人员。其主要表现为：由于长期被国家财政供养而形成了顽固的惰性与特权心态，大多不愿主动放弃现有的财税特权，但却是导致纳税人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

三是由国有企业造就的垄断利益群体。这一特权利益群体，主要源于他们对全体国民生产与生活资料资源的长期垄断，以及对全体国民利益的掠夺式剥夺。他们总是在国有的名义下，通过权力垄断，把利益划归某个部门或单位或群体享用。因此，出于利益的计较，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的反对者与阻挠者。

四是由与权力及准权力和垄断企业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和个人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群体，虽然并不直接享有权力及准权力和垄断企业的好处，但却由于天然，或人为地与这一特权群体的关系，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间接地享有特权阶层提供给他们利益，包括发展的机会等等。因此，这一群体，也会因为眼前的利益计较，成为现行财税体制改革的反对者与阻挠者。

中国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的动力与希望

中国要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下转92页）

1949年后辞书中陈独秀的形象变化

○ 董立功

20世纪50年代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民营的上海春明书店就迅速组织人员出版了《新名词辞典》,并获得了出版总署的认可。这种辞书印量很大,1949年9月后曾多次再版。所以,《新名词辞典》虽由民营书店出版,但辞书中“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实际上也代表了官方对陈独秀的一种评价。

在春明书店1949年12月版的《新名词辞典》里,“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一八七九年生,留学日本、法国。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同胡适领导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运动,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亦是最初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曾任第一任共产党书记。但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致革命事业大受摧残,但他非但不自悔悟,且索性投入敌人怀抱,出卖革命,成了托匪头子。抗战中死于四川江津。

在1949年12月版的解释中,1927年是陈独秀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对他1927年之前的经历,辞典编纂者的描述尚属客观,并没有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句;但对于陈独秀1927年之后的经历,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称他“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致革命事业大受摧残”。由于陈独秀拒绝向党中央认错,辞典编纂者还将陈独秀定性为“出卖革命”的“托匪头子”。

在春明书店1950年6月版的《新名词辞典》里,“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劳工阶级的叛徒,中国托匪的头子。安徽怀宁人,一八七九年生,留学日本、法国。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同胡适领导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运动,主编《新青年》杂志,亦是最初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曾任第一任共

产党书记。但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致革命事业大受摧残,而他非但不自悔悟,且索性投入敌人怀抱,出卖革命,成了托匪头子。抗战中死于四川江津。

在1950年6月版的解释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将陈独秀“托匪头子”的定性移到整个词条的前面,并增加了“劳工阶级的叛徒”这个新的定性。“劳工阶级的叛徒”这个称谓从此成了陈独秀的代名词。

在春明出版社1952年8月版的《新名词辞典》里,“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劳工阶级的叛徒,中国托匪的头子。安徽怀宁人。“五四”时,领导过“文学革命”运动,主编《新青年》杂志,亦是最初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但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致革命事业受到极大挫折。他非但不自悔悟,且索性投入敌人怀抱,出卖革命,成了托匪头子。抗战中死于四川。

在1952年8月版的解释中,并未新增内容,但却将陈独秀的出生年份,曾留学日本、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任第一任共产党书记等信息删除。

在春明出版社1953年4月版的《新名词辞典》里,“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中国革命的叛徒。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曾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紧要关头,陈独秀独揽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从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阶级投降主义,使这次革命遭受到极可痛心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的紧急会议,结算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并撤换了他的领导。陈独秀不承认既往的错误,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党。抗日战争期间病死于四川。

在1953年4月版的解释中,对陈独秀的定性

已从“劳工阶级的叛徒”升级为“中国革命的叛徒”，罪行似乎更重了。新增的一个内容是提到了“八七会议”，并言明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还在1929年将陈独秀“驱逐出党”，即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

在1958年4月版的《新知识词典》中，“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来堕落成为革命叛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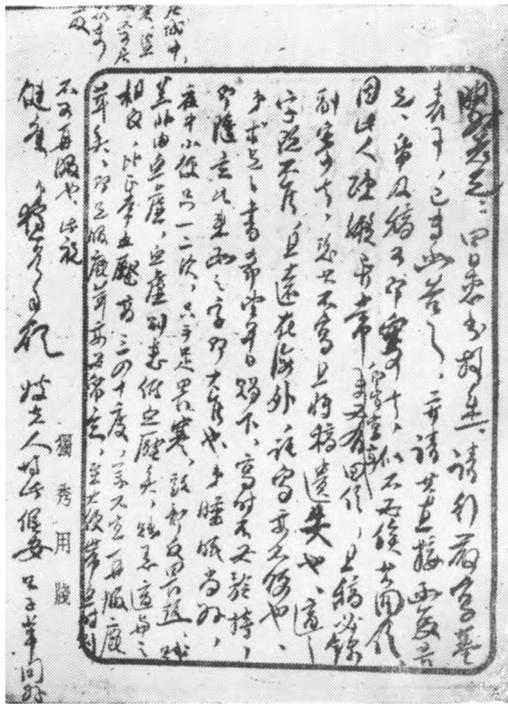
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他曾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1924至1927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驱逐出党。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

在1958年4月版的解释中，虽承认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但还不忘强调他“后来堕落成为革命叛徒”，字里行间对陈独秀充满了失望。这个版本还对陈独秀曾当选过党的总书记进行了解释，即“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

20世纪60至70年代

在1961年11月版的《辞海(试行本)》中，“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主编《新青年》杂志，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鼓吹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和当时的各种反动思潮作斗争，成为五四前后的急进民主派。1920年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



陈独秀手迹

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了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取消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成立反党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

在1965年版的《辞海(未定稿)》中，“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主编《新青年》，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鼓吹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急进民主派。1920年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选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路线，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坚持错误观点，之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成为取消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成立反党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党内对陈独秀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但总的来看，对陈独秀仍持否定的态度。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1880—1942)安徽怀宁人，字仲甫。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急进民主派。1920年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由

于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名声,被选为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路线,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但仍坚持错误。其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成为取消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成立反党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纠集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中共建党60周年前夕,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吴信忠在1981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红楼两巨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初期》一文,回顾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二人在中共建党初期的交往和友谊。这是文革后陈独秀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

从1986年到1988年,由陈云题写书名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8卷)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共收录了五四运动以后的137位著名教育家,就连过去曾被打入另册的胡适、陈独秀二人也得以入选,并且入选了丛书第一卷,可见编者对二人的重视。《人民日报》1986年8月26日还为此专门发了一则新闻《建国以来首次发表胡适陈独秀传》。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宽容使得重新评价陈独秀成为可能。

在1989年版的《辞海》中,“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字仲甫。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15年起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致使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1927年7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取消主义者,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八十一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后与托洛茨基派组织相结合,1931年5月曾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在之前的解释中,陈独秀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但在1989年版的解释中,这个表述变成了“1927年7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另外,在1989年版的解释中,还有两处变化值得注意:一是陈独秀“成立反党组织”的内容被删除,二是将之前的“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改为“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

在1999年版的《辞海》中,“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十里铺(今属安庆)人。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15年起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致使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1927年7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取消主义者,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八十一人署

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31年5月曾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

在1999年版《辞海》中,“陈独秀”词条的最前方被加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的头衔,这相当于承认陈独秀在中共创始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恢复了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名誉和地位。这时距离1949年中共建政已过去了50年,距离陈独秀去世则已57年。

在最新一版的2009年版《辞海》中,“陈独秀”词条的内容如下: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笔名众多,安徽怀宁十里铺(今属安庆)人。1896年中秀才,1901年留学日本。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后参加讨袁“二次革命”。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被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达等创办《每周评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1919年领导五四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6月因起草、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9月出狱。五四运动后期,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1920年初与李达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2月到上海,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建党活动。5月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创建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任书记,并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同年应邀去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9月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1922年7月主持召开中共二大,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9月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10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被选为国际执委会委员。1923年6月召开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合作决议,

再次当选为委员长。后在中共四大、五大上继续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其间领导了五卅运动,发动群众参加北伐战争,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参与成立上海市民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大革命后期,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下遭到失败。1927年7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参加中国托派。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获释,出狱后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以教书为生,后在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著作选编》(6卷)。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本是一个无需回避的事实。但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陈独秀的共产党创始人地位未能得到正视,辞书中陈独秀的形象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安在陈独秀头上的种种帽子被陆续摘掉了,但是关于陈独秀,还有相当多的历史事实和细节有待研究和厘清。■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黄 钟)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400-005-0480

我是华源书阁,我来了,你在哪? ——为了“您”和书的邂逅!

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代理个人出书、老人出书、学生出书、职称出书、公司出书,我们和国内多家出版社有密切的业务合作,帮助老师申请国内正规书号,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可在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查询,也可进入新华书店、当当网和卓越亚马逊等网站进行发行销售!

出书模式:

A类:从书号出书优惠套餐最低11500元起;

B类:无书号出书用于交流赠送2000元起印刷。

出书流程:

无书号出书流程:作者来电咨询(如需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根据详情报价—签订协议支付定金—交付稿件(手写稿需先电脑录入)—设计排版校对—确认版式和封面—寄送样书—作者终审样书签字确认—回邮样书—付清余款—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国内出版流程:作者来电咨询—公司发送选题表报审选题—回复选题—根据详情报价—签订协议支付定金—交付稿件(手写稿需先电脑录入)—设计排版校对—送审出版社审核—邮寄样书—作者终审样书签字确认—回邮样书—付清余款—印刷发行

服务热线:010-56423912 56423911

投稿邮箱:huayuanshug@163.com

公司网址:(华源出版网)www.hy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

A座206室

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

○ 吕成冬

在1957年反右期间,一位教授公开组织“劳动党”,并向社会公布“劳动党”宣言和招募党员。他还被传言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由此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同时还由于有着被戴笠派遣留学美国的嫌疑,于是又加上一条“历史反革命”的罪行,在反右期间竟呼吁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地位,于是被定性为“右派死硬分子”。这几条罪行加在一起可谓“罪大恶极”,但在其狱友中却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周恩来总理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过,只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他就是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1955年刚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国,就在1957年被捕入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类文献以及口述史料的披露,有关徐璋本的经历及其组织“劳动党”的前后逐渐明朗起来。



1935年,徐璋本毕业于交通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徐璋本在1957年之前的经历

徐璋本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11年7月,中学时代是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的。1931年9月,他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比他高一届的钱学森说:“在交通大学时,我就知道他是学究,不问政治。以致他在交大毕业后居然到一个特务电台去做工程师。我知道了之后曾劝他不要做下去,但我以后出国,下文不知。”

1938年,徐璋本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并于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国了。同期在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还有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等人。徐璋本回国后,先在湖南大学物理系

任教,1947年转到江南大学理工学院任教。江南大学是由荣德生捐资创办,1947年10月27日正式开学,所以徐璋本也是江南大学的元老之一。

1947年,徐璋本和蔡金涛、毕德显等人发起并主编不定期杂志《科学世界》(中华自然科学社出版),还在1948年发行一期“雷达”专号,其目的在于推动雷达方面的学术研究。徐璋本在江南大学任教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回到母校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专门教授高等电磁理论。交大学生陈太一评价徐璋本讲授的长波理论,“非常透彻”。

1949年之前,徐璋本再次赴美国;先在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后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在反右运动中,有人说他此次留学是受到戴笠的派遣,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经常和钱学森等中国留学生在一起。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他也受到美国移民局的“关照”。此间,他经常对钱学森等人说要争取回国,有时候又表达出要在美国住下去的想法,并且要把国内的家眷接过来。但是在1954年前后留美学生争取回国的斗争过程中,徐璋本是积极分子之一,经常参加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和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1954年8月5日,徐璋本还和他人联合给艾森豪威尔写公开信,要求总统下令撤销禁止中国学生回国的命令。1955年3月,王仁在回国途中路过洛杉矶时,曾驱车前往加州理工学院看望徐璋本。据王仁讲,徐璋本当时也已经获得回国的许可,“归国有期,不胜高兴”。

1955年5月,徐璋本和俞启忠、王明贞夫妇

等15人同船回国。徐璋本在回国之前曾受到钱学森委托,让其向中央政府传达希望回国的意愿。7月29日,徐璋本给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徐璋本于五月离美返国时,现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钱学森先生曾再三相告,他亟望于今年暑期中返国服务,按钱学森先生于一九五〇年起程返国时横遭美政府移民局阻止并加速逮捕后起诉,结果反被美政府无理判决不准离境且限制他不得自由离开洛杉矶区,迄今五年,情势并无变更,为协助钱先生心切返国服务之热忱,希望学联会诸位先生赐与研商并与我政府外交部协商于日内瓦中美两政府大使级会谈时尽力设法,俾钱学森先生能于最短期间返国服务,不再受美政府无理阻挠,是为我国学术界和他的朋友们所馨香祈祷的,书不尽意。”

8月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将这封信转交给外交部。为此,钱学森在回国之后还两次去拜访徐璋本。同时也可见,徐璋本在回国前虽然有两次赴美的经历,但也并不复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以其学识,也会成为和钱学森一样的科学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命运的天平在1957年之后开始倾斜,并且呈现出一头倒的趋势。

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1955年,徐璋本回国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物理理论教研组。教研组中从美国回来的还有徐亦庄、张泽瑜和王明贞三人。其中,王明贞和徐璋本同船回国,又被分配在同一个单位,彼此关系比较要好。徐璋本到清华大学上班要经过王明贞的办公室,两人经常聊天,有时候还在王明贞家里打桥牌。

1956年2月20日,《物理学报》编辑部收到徐璋本的研究论文《能源策动的天线的普遍边界条件和它们对一个有限圆柱形天线的应用》。这篇论文长达21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物理学报》将其发表在1956年第四期。可以想见,此时的徐璋本在科学研究上适逢其时,国家也需要这样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在1957年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徐璋本的一次发言却成

为其命运的转折点。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的来源与我们的领导思想有关系”;并且解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随后接着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思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理想就是教条主义。”

到此,徐璋本的发言似乎还带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意味。但是,紧接着的发言就直接指向马列主义。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不仅如此,徐璋本还在其他场合提出诸多不可思议的观点:“杜勒斯也是为了人民”、“老蒋不代表帝国主义”、“弱者不是反革命”、“地主只是小猫”。这些言论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其不揣冒昧的直接结果就是在接下来的反右中自然地成为“右派”,并且还是清华当年仅有两个“一类右派”之一,另一个是“庶民社”的孙宝琮。而他的这些言论也很快编入各类内部材料,或上报中央,或成为学习和批判的材料。

因公开组建“劳动党”而获罪

相对于右派言论而言,真正令徐璋本陷入牢狱之灾的其实是他在1957年公开组建“劳动党”

的行为。并且,还曾传言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而令人疑惑的是,他公开组建“劳动党”的行为是在中央已经明确作出反右指示之后,仍在1957年7月8日向社会公布《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以及一份具有政治纲领性质的《劳动党发起宣言》,并且还要“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

徐璋本在《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中,首先阐述一个基本概念:“人类的体力和脑力的劳动创造了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是创造了人类特有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和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区别开来。”随后又指出:“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同时也创造了艺术、文学、音乐、绘画和人类整个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每个时期和地区的政治和文化都是有以往历史的结果和反映,同时也包含着以后演变因素。一切因素都建筑在人类劳动果实上。”

其次,谈了人的两种本能:自私利己和互助利他。他说:“自私利己和互助利他。自私本能的过分发展和没有限制便是人类社会一切剥削现象和制度的最后根源,一切罪恶的最后根源。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着理想的共产主义永无止境的迈进途中,限制自私利己的本能和发展互助利他的本能,便是人类道德和法律不断改进和厘定的最高标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态便是建筑在这个标准上面的。”

最后,还指出之所以要成立劳动党的目的。他说:“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对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以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

而在《劳动党发起宣言》中,明确声称:“为着实现人类劳动的神圣价值;为着使劳动果实不带来剥削和被剥削现象;为着使人类劳动所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获得最广泛公平最有效的使用;为着使这些劳动果实不受人类两种生物矛盾本能——利己和利他,爱和恨——的支配,继续在前进的社会中产生矛盾;为着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及和平共处;为着使人类社会向着共同的

理想的大同公有共享社会顺利地和平地迈进;为着使人类劳动在社会的持久的和平及繁荣中发挥其最高价值;因此发起组织劳动党宣言。”随后,徐璋本就党的宗旨、党的纲领和党的组织作了详细论述。

首先,对于党的宗旨,他提出要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共享社会。其次,在党的纲领中,他提出两个部分,分别为:关于世界各国和国际的十二条,关于国内的二十条。其中有两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特别显眼,分别是第十七条:本党主张宪法和一切社会法律中不能加入“主义”“革命”“反主义”“反革命”等字眼条文;第二十九条:本党同意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对执政共产党之施政方针,保留随人随时随事加以研究检讨和争论,并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加以更改和否定之自由。最后,在党的组织中列出十二条,并在其中一条提出:“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对本党业务之进行给与物质上和道义上的帮助。”

徐璋本的行为,很快引起妻子王锡琼的忧虑。她在劝说无果之后,向钱学森和王明贞寻求帮助。钱学森后来回忆:“我对他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劝他不要搞,说他不懂政治,不要乱来,他当时不同意,一定要搞劳动党,我也就离开他了,后几天听说他以反革命而为公安部扑去。”而据王明贞回忆:“有一次,我请徐璋本吃饭,想劝劝他,特意找了李恒德一起去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李恒德有事提前走了,只剩我们三个人。徐璋本跟我们半开玩笑说,他那个‘劳动党’要任命组织部长、文化部长。开始我们也跟他开玩笑,后来我们劝他别搞这些名堂了。徐璋本还让我们举手,看赞成不赞成,一举手两个不赞成。”

更加严重的是,徐璋本还拉清华大学的张维、王英杰、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加入劳动党和支持他的宣言。看来,徐璋本是铁了心要组建“劳动党”,为此还贴过小字报,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党”,并提出:“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争取青年!”之类的口号。

徐璋本的结果可想而知。8月19日的《新清华》发表题为《理论物理教研组连续开会批判徐璋本反动言行》。该文指出,正当全校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

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遭到全校一致声讨，彻底批判，从而陷入完全孤立的时候，徐璋本却突然暴跳出来，公然打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组织反革命政党——所谓“劳动党”，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还企图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发动拼死的斗争。

12月25日，这一天他在清华大学被逮捕，并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被判15年有期徒刑，在清华大礼堂公开宣布他的罪行。

在监狱中享受的“特殊”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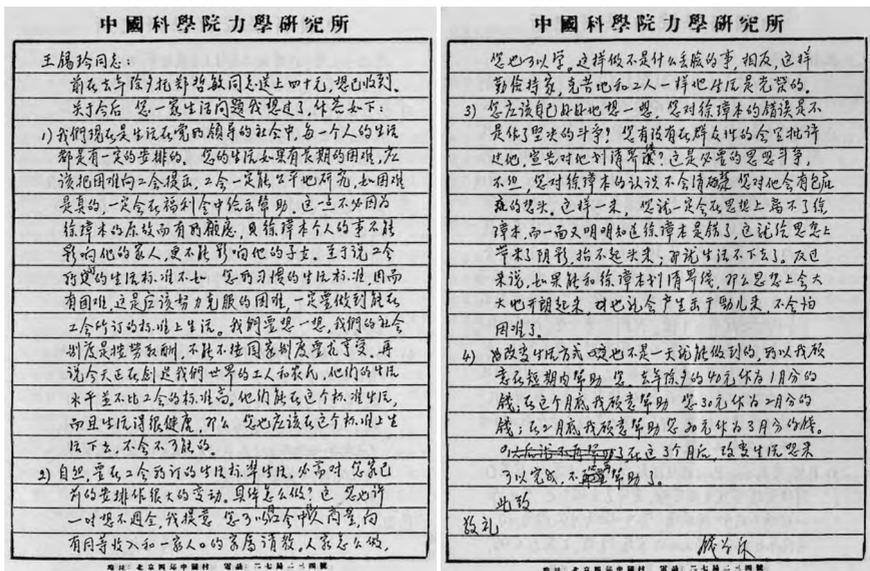
徐璋本被判入狱后，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不过，他在监狱里却享受过特殊的待遇。据他的“狱友”王学泰回忆：“在监狱中，他受到了特别的待遇。狱方给他一间小屋，他住在那里，吃饭也是小灶，甚至为他单做。还有一个青年犯人伺候他。每天徐璋本在自己的小屋看书，写东西。有时老同学钱学森还到监狱里看他。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度周末。周一上午或周日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不仅如此，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周恩来总理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过，只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

虽然徐璋本在监狱中享受“特殊”待遇，但毫无疑问，此事对他的家庭产生了巨大冲击。1957年底，王锡琼找到钱学森，希望在经济上得到帮助。1958年除夕，钱学森向王锡琼伸出援助之手，委托郑哲敏转交四十元钱。而王锡琼也给钱学森写过一封信，表示不能习惯工会现在所定的生活标准。钱学森在1958年初给王锡琼的回信中，对此作出认真地回复。

钱学森首先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党所领导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安排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按劳取酬，不能不按国家制度要求享受。再说今天正在创造我们世界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生活水平并不

比工会的标准高。他们能在这个标准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健康，那么您也应该在这个标准上生活下去，不会不可能。”他还安慰并建议王锡琼说：“自然，要在工会所订的生活标准生活，必需对您家以前的安排作很大的变动，具体怎么做？这您也许一时想不周全，我提意您可以同工会中的人商量，向有同等收入和一家人的家属请教。人家怎么做，您也可以学。这样做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相反，这样勤俭持家，克苦地和工人一样地生活是光荣的。”

钱学森在信中还问到：“您应该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您对徐璋本的错误是不是作了坚决的斗争？您有没有在群众性的心里批评过他，宣告对他划清界线？这是必要的思想斗争，不然，您对徐璋本的认识不会清楚，您对他会有包庇的想头。这样一来，您就一定会上不了徐璋本，而一面又明明知道徐璋本是错了，这就给思想上带来了阴影，抬不起头来，那就生活不下去了。反过来说，如果能和徐璋本划清界线，那么思想上会大大地开朗起来，也就产生出干劲儿来，不会怕困难了。”最后，钱学森还是考虑到突然改变生活方式，可能对其家庭的影响。他表示，愿意在短期内给与王锡琼帮助，除了去年除夕的40元作为1月份的钱，还将提供30元作为2月份的钱、20元作为3月的钱。但是，钱学森希望：“在这3个月后，改变生活想来可以完成，不必再帮助了。”



1957年底钱学森给王锡琼的信

钱学森写完这封信之后,并未直接寄出,而是请他的秘书张可文先对王锡琼的情况进行了解。他说:“这是一封给徐璋本爱人王锡琼的信(清华大学,可由郑哲敏面交)。但是发不发这封信要搞清楚一点:就是徐璋本是前清华大学教授,近为公安部捕走的,问题是王锡琼虽然仍在清华大学水工教研室工作,但她有没有问题?在这点上你能不能设法搞明白?只有在她没有问题的条件下,我才能发这封信。发信时间再抄一次,把这个底稿留下。”

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北京第一监狱的犯人们也分批被“撤出”北京城。徐璋本被“转移”到河北某农场,他的待遇被取消了。徐璋本在这里也要参加劳动,大概是由于已经年近60,再加上从来没有过在农村劳动的经验,所以他的劳动形象在狱友中是“很糟糕的”,还对狱友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实在是反动的啊。”据他的“狱友”严昌回忆,是在1970年4月25日知道徐璋本的身份。4月25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4月25日晚上8点,农场负责人带领20多名人员直接到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这名负责人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就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并接过负责人手中的海报,被命令:“念!”徐璋本不敢不从命,认真地念起来。念完之后,这名负责人说:“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地说道:“惭愧,惭愧!”

1975年春天,国家发布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警宪特人员。徐璋本在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赦令在执行过程中,大概认为二级教授相当于县团级,就将徐璋本释放了。所以徐璋本是作为特赦人员被释放的,这样的结果显得有些吊诡。

一点余论

徐璋本的人生以1957年为界,分为鲜明对比

璋本学兄:

我们一家都非常感谢您一家送来的贺年卡!真如卡片上说的,“我们友谊”“随岁月而茁壮”!我们是六十多年的同学学友了呀,中间多少事呵!令人欢快的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已经走上自己的发展大道,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目标及方法已经清楚了!

也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卡片的创作者却画出雾蒙蒙地上莽莽遍野?难道创作者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万家墨面没蒿莱”了吗?这是我国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的表现,作家们有不少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落后了!这样他们又怎样当人民的灵魂工程师?

我觉得在这字意义上起朴初的元旦献词

《圆梦驻云》是好的:

“喜报春回,十三先开岭上梅。
开放云会,改革洪波沸。
飞!神龙起迅雷。澄澈积滞。
万里长空,四海光明被。
十亿同心振国威。”
老同学,让我们共振国威吧!

闻锡琼嫂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77.1.4

1988年1月4日钱学森给徐璋本的信

的两个阶段。1957年之前,他在国内外一流大学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拥有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时就已经是著名的科学家。然而,他在1957年之后却想要通过发表政治言论和组建“劳动党”,到达他所宣称的“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共享社会”。对此,他的清华同事谢毓章解释说:“徐璋本曾在美国留学,回国后,总使用美国的思维方式做事情。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组织政党的自由,他也要组织政党,并且找人参加。尽管没有组织成,但有这种想法就不行,也把他抓起来了,定性为‘反革命’。”

虽然,他在被释放之后又重拾学术研究。但此时物理学早已发展到新的阶段,他要重新回归学术,需要付出的努力是何等的艰辛。然而,他却执着于此,并以摘取诺贝尔奖章为目标,终于因积劳成疾病逝于1988年。而在这一年元旦,他还给好友钱学森寄出贺年卡,写到“我们友谊”“随岁月而茁壮”。1月4日,钱学森就给他回信。信中说:“我们是六十多年的同学学友了呀,中间多少事啊!令人欢快的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已经走上自己的发展大道,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目标及方法已经清楚了!”钱学森的这句“中间多少事啊”,真是耐人寻味,事实上也是徐璋本的人生写照。■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 陈徒手

一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与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做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1965年2月10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2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25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为“团结大街”。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到,“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

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二

1964年起,北京市花费一年多时间,曾经进行过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领导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经常发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顿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

三

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组长李续刚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反对。”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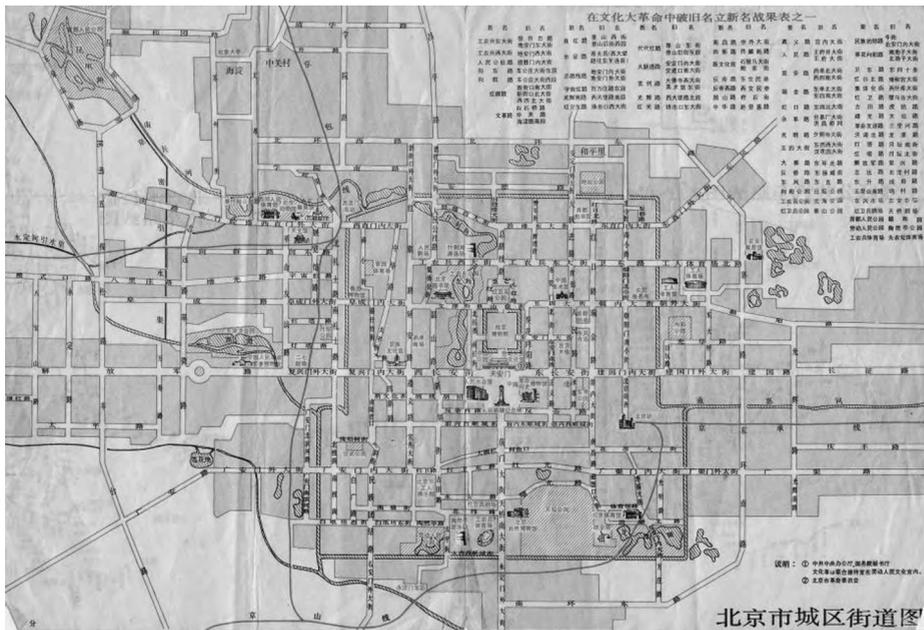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1966年6月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怯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1965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

对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已经是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有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

1966年6、7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现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此议。



文革时期的北京地图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的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東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

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报告中附有图示,清晰标明环绕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拟定名,如鼓楼至景山北墙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等。图例中还留有几条线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见之中”,如“大跃进路”(地安门东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门西大街)、“必胜路”(西交民巷)、“大庆路”(东环南路)等。

这个送达国务院的报告只是集中关注了中心街区的变动内容,全市更大面积的地名整顿情况并没有得以及时呈报。更为混乱的修改地名的趋势还在延续,狂热之中的领导机构和红卫兵组织对路名修订之事投入极深,市委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做好命名工作”,竭尽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事件达到高潮时,市人委会于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报国务院,转告红卫兵和来访的革命群众的两条紧急建议,一是请毛主席给“东方红大道”和“共产主义大道”两条新命名的大街题字,要求能在国庆节以前把毛主席题字的路名牌制作安装;二是请国务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报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国庆节前安装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并未答应题写路名牌,而且国务院也没有彻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内容,像西城、东城、宣武等区名还是照常保留下来。

四

据1974年11月14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红卫兵把北京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对这样的举动,市人委部分领导还是多少有些担心,新市委处理之时也有几分踌躇。

1966年6、7月,在红卫兵的参与下,主事机构一边批判前市委的不作为,一边加快整顿路名工作的进程。李续刚对此颇感忧虑,认为办事过于仓促反而会使工作难于圆满,他于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连壁、万里:“这项工作很复杂,北京的庵、观、寺、院、旧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划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拟出这么多街道的新名颇不易,需要开很多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还要有个强有力的班子。原来办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处的人)也不完全胜任。我的意见,这件工作时间关系不大,是否:(一)尚未进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来(免得需要再改时造成浪费);(二)等待运动高潮过去工作一切就绪后,腾出手来再搞。”新市委相关负责人牛连壁同意此意见,他在信上批阅道:“暂时停下来,待以后有力量时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气势已经无法阻挡,李续刚自己觉得近期拟出成千上百个新地名“颇不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各城区纷纷上报修改材料,争抢热门的红色用语做地名,以致于重复的名称大量出现。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称,截止11月7日止,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一千一百零七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四百一十七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为此提出,各区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处理。市人委在当年年底致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透露,由于有不少街巷地名,群众已经自动命名,重复甚多,目前正在忙于统一平衡。

最受人们推崇的街巷名称应是具备红色、东方、蓬勃、群众等特征的革命性词语,各城区争先恐后地申请标注,根本不考虑历史缘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众习惯,谁先抢注谁就占先。下列这些街道名称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快速产物,由政府部门先后批准发布,可以涵盖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种类和特点:“育红路”(景山东街)、“四季红路”(大羊房路)、“宇宙红路”(百万庄大街)、“红光路”(珠市口东大街)、“东红路”(酒仙桥路)、“红电路”(广宁路)、“普红胡同”(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厂大街)、“永进路”(黄寺大街)、“霞光街”(东黄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东路”(车公庄大街)、“赞东街”(东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坛路)、“志远路”(北洼村路)、“炬辉路”(北蜂窝路)、“智勇路”(晋元庄路)、“秋收起义路”(马家堡路)、“大寨路”(东环北路)等等。

最为省事的办法是以一个革命化的新名称替换一大片胡同名,譬如东城区决定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改名为瑞金路头条至三十条;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厂胡同、锡拉胡同、东厂胡同,列为人民路一至九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相隔分司厅、谢家、车辇店、灵光等胡同,一律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十五条;从南锣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儿胡同、黑芝麻胡同,一连串最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名统一变更为辉煌街头条至八条;西银丝胡同到缎库、飞龙桥、灯笼库、文书巷、骑河楼、草垛胡同,这么多充满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为葵花向阳路头条至二十四条。

东城、崇文等城区主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报胡同”,等等。

五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谱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

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政局趋于纠左和务实,一些激进做法也得以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复为“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恢复为“景山东街”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为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

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位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高层考虑到尼克松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进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专题，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放下了，其它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

六

1972年开始路名整顿，效率低下，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3、4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群众集中点到的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

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意的老胡同。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细致研究后，赶紧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未改名，现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单，共有86条，请示领导是否需要更改。报告中称，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形势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烧制，烧制工人也会有意见。万里批示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但万里又略有踌躇，他添写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终市委谨慎再三，确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顺胡同、育仁里等九条街巷的名称，更改的幅度少于预料。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然来临，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蕴孔孟之意的胡同名称，由此打乱了门牌烧制安装的预定计划，致使新门牌迟迟不能安装，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人员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也无法办理交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11月14日市整顿办公室上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罕见地称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为“同时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义，承认了当时的举措失当：“因为是自发地搞起来的，带‘红’字的太多，达七十一个容易混淆（如红兵、红小兵、红江、红湖、红塔、红电等），有些名称作为街道名称也不合适（如红到底、红宝书胡同等）。这几年来的实践也未被群众所接受，习惯上还用原有名称（如颐和园、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给信件投递、消防急救、群众查找等带来不便。”这无形中就在内部否定了文革初期的“红遍地”改名浪潮，并悄然形成党内外的共识，但极力回避公开表态，没有随意在党内文件、报刊上提及。

据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519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389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14条。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会批复朝阳区革委会，同意将“曙光里”改回原名“垡头”，“东红路”改回“酒仙桥”，“大寨路”改回呼家楼。这是文革结束前、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后一笔官方记录。■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

（责任编辑 黄 钟）

风风雨雨千家驹

○ 王 健

—

1949年2月平、津解放，沈钧儒等从东北到达北平。我是3月下旬，随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进城的。李维汉和李克农商议即派我去给沈钧儒担任政治秘书。

4月间，刘少奇去天津调查工商界情况。这期间千家驹和章乃器也去了天津，并参加刘少奇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研究天津工商界特别是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千和章提出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是比较“左”的。经刘少奇的解释，千感到惭愧。天津市市长黄敬宴请他们，最后刘少奇在天津对工商业界人士作了一次报告。当时对全国工商界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这时，千家驹、章乃器、沈志远三人已被北平市政府（市长叶剑英）聘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

8月下旬，沈老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必然要定居北平，市政府给沈老看了几幢住宅，有四合院、有小洋房。最后，沈老选定东城东总布胡同24号一幢洋房。恰巧和千家驹、章乃器、沈志远三人合住的大羊宜宾胡同19号，只有一街之隔，步行不过三四百米。那是中国人民银行给这三位顾问物色的一幢宽敞的四合院。千等三人都是救国会同志，特别是章乃器又是“七君子”之一，所以他们和沈老经常有所往来。两年前我去香港就和千家驹住在一所楼里，朝夕见面，可以说老相识了。

救国会同志成立了救国会临时工作委员会，我也参加了临工会，会上曾作出两件重要的决定（不是在一次会上），一件是决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救国会代表名单问题（人数官方定为12人），经多次讨论，最后决定为：李章达、孙晓村、曹孟君（女）、沙千里、千家驹、沈志远、萨空了、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候补代表秦柳方、张曼筠（女）。

沈老、史良、胡愈之由民主同盟提出，章乃器由民主建国会提出。另一件事是讨论救国会自动结束问题。这个问题争论很久，沈老和胡愈之认为新中国成立，救国会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自动结束。有人反对，但最终沈老、胡愈之说服了反对者，决定于新中国成立后12月间即宣布结束。同时决定成立救国会纪念委员会，由沈钧儒、史良、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胡愈之、萨空了、曹孟君、王健等九人，负责收集整理出版救国会烈士及救国会史料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公布了各部委员会负责人名单，千家驹是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简称中财委）兼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局长是薛暮桥。千的副局长业务很忙。陈云又任命一位民族资本家吴羹梅为第二副局长。吴是铅笔公司总经理，有“铅笔大王”之称。

根据“共同纲领”精神是要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千家驹曾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说：过去中国民族工业受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奄奄一息，现在三座大山已经推倒，今后民族工业可以大展宏图了。

“三反”、“五反”开始后，私营企业局势必首当其冲。吴羹梅副局长本身就是民族资本家，被“革命群众”视为“打进国家机关的资产阶级奸细”，开了批斗会，把他扫地出门了。“革命群众”给千家驹贴了大字报，说他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处理问题，使国家损失几十万、几百万”，群众怀疑千一定拿到资本家的好处，但又拿不出证据，开了批斗会也斗不出什么问题来，既无贪污，也无受贿。最后，薛暮桥受陈云指示，要千作一次检查，保护过了关。

千于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中央统战部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学院，是专为改造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而设的。吴玉章为院长，千家驹被推为副院长之一。据千



1949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的救国会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左一为千家驹)

说,学员除各民主党派选来的干部外,还有一班学员里有溥仪、郑洞国、卫立煌夫妇,还有杜聿明、黄维等人,见到千都叫“老师”。千都感到十分惊奇、“吓人”。

1956年11月,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吴晗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决定出版《争鸣》月刊。民盟中央提出拟与市委合办,吴晗也表示同意,实际上他是有意全部推给民盟中央(吴晗一直是与民盟中央不合作的。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一切听从市长彭真。民盟中央是听从中央统战部的,吴晗和民盟中央经常发生矛盾)。

1957年新年过后,编辑部搬到民盟中央,成立以千家驹为首的19人编委会,并推千家驹、萧乾、陶大镛、费孝通、潘光旦、萨空了6人为常务编委,千家驹为主编。编辑部原为北京市委同志负责,但多次约请他们,总是推托不来。千家驹要我负责重组编辑部。1月初出版第三期,《争鸣》原为内部刊物,从三期起改为国内公开发行。千家驹经常邀请一些文化、教育、科技界知名人士组织座谈会,把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在《争鸣》上发表。千主张开展争鸣,要大家讲真话。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知识分子的欢迎。有人说《争鸣》真的争起来了。

是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发动大家对共产党提意见。从5月到6月,中央统战部召开

了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千家驹参加由李维汉部长主持的工商界座谈会。他的发言是就会上辩论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有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中间有一道墙,应该拆除。千说,如果有道墙也是资本家世代代剥削工人所造成的,应该由资本家主动来拆。关于定息问题,有人说应再延长20年才能还清债务。千家驹认为定息是国家对资本家的一种赎买,不是国家欠资本家的债。章乃器说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也应向资产阶级学习。千家驹说,工人阶级需要学习是思想

改造,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是立场的根本改造,不可相提并论。几天后,李维汉约了千家驹、孙起孟、孙晓村去谈话,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并表示对资产阶级的右派言论“要一棍子打死”。这时,工商界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千等三人在斗争中是左派了。

这个时期,民盟中央作出在全盟内开展反右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组成了中央领导小组,由胡愈之为主任,千家驹任副主任之一。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揭露章伯钧和罗隆基结成同盟,反对共产党并想取而代之。还说他们的同盟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其所谓纲领,就是指《争鸣》上发表的两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以千家驹为首的19人编委会,半数以上被判为右派,投稿人中也有不少是右派。《争鸣》成了右派的刊物了。千家驹被统战部视为左派。我在1956年党籍公开。我努力要作党的“驯服工具”,各种会上很少发言,《争鸣》上也未发表过文章,所以我和千得以幸免。

反右以后,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千家驹经过反右运动,存有戒心,他说“我宁愿作‘观潮派’”,但他在朋友面前则大发议论。他开玩笑地说“我这些都是右派言论,但没作毛泽东俘虏”,自以为幸。

1962年春,政协举行大会。千家驹和陈翰笙

(党员)、沈志远、彭迪先、关梦觉、吴半农(都是盟员)在大会上作联合发言,发言要点有三项:一、粮食过关,应指全国而言,不求要求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粮食过关,否则就要把经济作物挤掉了;二、我们不同意当时提出的工业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口号,否则上海、青岛、天津这些轻工业基地的原料从哪儿来呢?三、我们主张开放集市贸易市场以活跃经济。这个发言是千家驹代表六个人在大会讲的,会上博得一些人的好评。没有想到,在下届政协大会上竟有一位政协副主席发言,说在上次政协大会上,有民主党派成员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要“挖社会主义经济的墙脚”,要“复辟资本主义”、“其严重性不亚于民盟六教授的右派言论”。千家驹等六人一听就听出来,这个发言所指就是他们,尤其千家驹首当其冲。会上各小组立即议论起来,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之下,批判的多,赞成的寥寥。民盟中央所设的几个学习组也成了批判会了,主要的是批“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以活经济”问题。

1963年沈老去世,1964年我报名下农村参加四清,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一直到1965年。这一年1月接到机关同志来信,特别告诉我沈志远因受不了批斗走上了自杀之路,并说现在正在开展“五反”,查政治、查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更深化了。信里没有谈千家驹情况,使我非常担心,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也不知处境如何。

1965年8月底,四清结束回到北京。我得知在学习组里批了一阵千家驹,千作了自我检查,“实行自我革命,过好社会主义关”。千的问题也就算过去了,但民盟的同志对他有些侧目相视了。

二

1966年8月24日,民盟接到某中学红卫兵通告,勒令民盟于72小时内自动解散,民盟自即日起停止办公(其他党派也是如此)。第二天,几十名红卫兵来到民盟批斗吴晗,并要千家驹、章伯钧、张毕来等人陪斗。每人跪在地上,颈上挂着大木牌。我记得千的木牌上写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批斗后,宣读了《致民主党派最后通

牒》,当即由民盟中央秘书长交出民盟中央委员会和办公厅印章。从此,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停止办公,办公用房也被强占。所谓“长期共存”实际已不复存在了。

千家驹回到家里,妻子告诉他红卫兵又来过一次,翻些东西走,说几天后再来。千家驹听了感觉实在受不下去了,决心一死了之。第二天一早,买了一瓶二锅头,坐公共汽车去香山,爬上“鬼见愁”,喝了二锅头,头已昏昏沉沉走向悬崖。正在徘徊时,有位旅游者看他行迹异常,即追过去盘问他。他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行人翻他衣服,找到工作证,知道他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即拉着他下山找到电话,通知他们机关。机关开了小汽车把他接回。过了几天,红卫兵批斗,说他“畏罪自杀”、“自绝于革命,自绝于人民”。斗争完毕,强迫他劳动,打扫院子。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出了这件事不能不上报国务院财办党委,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停职反省”。从此,副局长已成革命专政对象了。

千家驹在1928年参加过共青团,曾被张作霖逮捕,北伐胜利后才被释放,但在狱中的供词里供出了参加共青团并有“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一句话。1967年中国人民大学造反派从北洋政府的档案中发现这张供词,误认为千已是共产党员,即向管理局报告,并想批斗。管理局负责人说千某不是共产党员,是知名的民主人士,造反派大失所望,但说他是“叛徒”铁定了,还是批斗了一场。

是年,千家驹夫人杨黎音去世,千家驹深感悲痛。我也去表示哀悼。

1969年,中央工商局全体干部下放到辽宁省盘锦区的商业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的条件艰苦不亚于北大荒。千家驹一家妻亡子散,把95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里,他才放心去了五七干校。千作为专政对象,干校对他实际就是劳改,除劳动外,还受批斗、审查。

1970年,一天有位军代表和专案组的人来找千谈话,说你的问题就是北大被捕那一段,别的都查清了,没有问题,要他在连队大会上做一次自我检查。连里又开了一次批判会,最后组织上宣布千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算是解放了。

1971年,商业部干校合并于河北省固安县五七干校,在固安轻松多了,不再搞过去的农业劳动,而改为建设工程,当进砖、进瓦、运泥、运沙的小工。同年,千家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赵甲素,不到一年就登记结婚了,未举行任何仪式。

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一直到“四人帮”被抓的几年中,他不愿参加任何民主党派的活动,全国政协委员也未恢复,除了和谈得来的朋友来往外,决心读书。千认为这是他平生读书集中、知识收获最丰富的年代。

三

1986年3月下旬,全国政协举行六届四次大会(我是从五届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的),会前召开了人大、政协党员的预备会议,向党员打招呼,会上不要提三峡问题。千家驹不是党员,也不知打过招呼,他大会发言时特别提到三峡问题。他建议三峡工程应该缓建,要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同时,还提出教育经费要增加的建议。据说,大会秘书处看了这篇发言稿很为难,是不是印出来给大家。请示上级领导,最后请示政协主席邓颖超。邓说千家驹的发言怎么不能发呢?最后还是印出来发给每个委员。千的发言受到热烈的鼓掌(本来很多委员不见到科学论证是不同意匆促上马的)。到了大会闭幕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特地向大会郑重宣布“三峡工程还要进行论证,中央并没有决定上马”。

是年10月,民盟中央举行罗隆基90周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千家驹在会上讲话,他认为“章罗联盟”是千古奇冤。中央对章罗既然有了公正的评价,现在是应该到了改正平反的时候了。

1987年1月,民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增选了千家驹为中央副主席。3月,千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大会。这次在大会发言的有姚雪垠、千家驹、赵朴初。千的发言是讲经济方面的问题。几天后,千回到深圳,遇到习仲勋。习对千说,你在大会的发言好得很,我为你鼓掌。千对习说,我感谢你欣赏我的发言,但新华社报道我的发言只有四个字,千家驹委员就“经济问题”发了言。而对姚的发言全文照登、一字不漏。习听了只是一笑而已。在北京我听到一位委员说,千的发言

都是大实话,不是讲“政协话”,没有“套话”。我想,这也是新华社不发全文的原因吧。

1988年3月下旬,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大会开幕。会议最后两天是大会发言,其中千家驹作了30分钟的讲话,题目是《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的几点意见》。谈到物价问题他认为“物价上涨的幅度超过工资增加的幅度”,并讲了当前存在的经济问题,举了一些生动的事例,认为我们的经济体制非动大手术不可,迟动不如早动。谈到教育问题,千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讲应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地位,而实际上各省市还是把基建投资放在首位。各地领导抓经济而不是教育。千还说义务教育法颁布了三年,文盲不见减少,反而增多。千举例说,老作家谢冰心看到中小学教师们的悲惨境遇,写了一篇《我请求》为教师们大声呼吁,并未被大人先生们所重视。千并把中国的教师和香港的教师相比差距太大,所以有人说:现在样样都涨价,只有教师和废品跌价了。最后谈到社会风气问题,他认为每况愈下。讲了一些权钱勾结、营私舞弊、贪污腐败的内容,舆论上报喜不报忧等等。千的讲话切中时弊,既风趣又幽默,讲了30分钟,我在台下以“正”字划出群众鼓掌次数,竟记了六个“正”字,另外还有一次共31次。有的鼓掌长达一分钟,这是政协会议所罕见的。

大会最后选举新的领导班子,照例是按照候选人名单定额选举。千不在名单之上,但选举结果,千得了三票选他为主席,数十张选他为副主席。但这些票都作为不合格的废票。会后传说,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千的发言是“蛊惑人心、哗众取宠”。

1989年3月,全国政协召开七届二次大会。大会开会前民盟特派一位副主席到深圳见千家驹,对千说,如果你在这次大会上发言须经民盟组织通过,因为你是民盟小组的成员。因此,千借故不来北京参加。

四

根据千家驹“年谱”记载,他于1989年7月8日去了美国,是美国有朋友约他去讲学的。但民盟的同志都以为他是另有原因。出国前也没有



左起：谈家桢、千家驹、王健，在美国千家驹的家里

和民盟领导打个招呼。

我的三个女儿在美国，两个留学，一个定居，我1990年去美国探亲。我们在出国前向民盟组织请了假，向中央统战部也打了报告，临行前还参加了一次主席会议。大家要我去美国看看千家驹，希望他洁身自爱，尽快早点回来，“不要走得太远了”。

1990年1月中旬，我乘飞机到达洛杉矶（千家驹夫妇已定居洛杉矶）。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1989年8月号），上面有千家驹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半个世纪历史的重演》，从北洋军阀时代的“三一八惨案”写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另一篇是《我在文革中的遭遇与自杀经过》。

我决定去看千家驹，但我还是先到领事馆了解千的一些情况。马毓真总领事说他写了一些文章，对文革他心里有些怨气。现在他还是政协常委，政协开会通知都是由领事馆转给他的。我们谈话间，我看他对千到美国以及写了一些文章似乎不大以为然。

几天后，我和夫人专程看望千家驹。他住在台湾人集中的高级住宅区，住的是一所宽敞的小别墅。千很想知道民盟的朋友对他的反应如何，是想推他还是想拉他。我转达了楚图南、费孝通对他的致意，希望他早些回国。他向我表明，他是接受美国一个学术团体的邀请在7月间来到美国。他说在这里除了有些学校或团体请他作

学术报告外，一不接触“民运分子”，二不接受记者采访，三不去台湾，文章还是要写的。

我带着几分规劝说：现在国内有一种心理，凡是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你讲的再好，他总觉得你有背景，都抱着怀疑态度，还是回去讲。像1988年你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听众热烈的欢迎，30分钟就有31次鼓掌，得到良好的效果。千说，还不是有人说我“哗众取宠”吗？我说你的讲话哗了众取了宠，有30多次鼓掌，这有什么不好。千的夫人在旁边插话说：千老想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想回去的，在

这里我们很谨慎，处处留有后步。我听了心里也有底了。

站在千家驹住的别墅后凉台上，可以看到台湾人投资修建的金碧辉煌的西来寺。寺里主持人是星云法师，千说他 and 法师往常有来往，“我已看破红尘皈依佛门了”。我听了觉得很奇怪。3月底，他收到领事馆转来政协开会的通知，他请了假（我也早就写信请了假）。但他为这次大会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一篇针对国际经济谈论经济规律问题的文章。我看了文章，觉得千身在佛门而心还在红尘。我心想，他是不会离开红尘的。

8月初，民盟中央副主席谈家桢夫妇来美国探亲，我们约好去看千家驹。我们异国相聚倍感亲切。千设午宴招待，一面吃，一面谈。谈美国生活、国内生活，最后谈老劝千还是回国，回国要比国外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千说看看情况，总是要回去的。10月底，我离开洛杉矶，又去看了千家驹，向他辞行。他要我向民盟的领导同志们问候，并要我带几篇最近写的文章给领导同志以表明心志。

我回国以后，在一次民盟的会上，我报告千家驹在美国的情况，我最后一句话说：“千家驹还是原来的千家驹。”

1991年初，民盟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后又召开主席会议讨论千家驹问题，决定撤销其政协委员职务。一星期后召开中常会决定撤销千家驹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务委员职务，但仍保留中

央委员。看来千没有回来,民盟还是不相信他。

1991年11月底,我们又去洛杉矶。到了洛杉矶当然要去看看千家驹。一见面,千家驹就说,政协、民盟撤销我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还是我意料之中的。这样倒好,从此无官一身轻了。接着,他把上月写的《明报》发表的《一封给陈云、薄一波的公开信》。题目是《唯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我一看“和平演变”四字很刺目。我说“和平演变”在国内是最忌讳的、最可怕的字眼,这封公开信在国内肯定不会公开的。千说国内一说“和平演变”就谈虎色变,其实有什么可怕,改革开放就是和平演变,两者是一回事。例如:我国开办经济特区、吸收外资、三资企业,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以促进我国发展,这样的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我坐下来细读了这封信,我觉得他是积极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

我们还谈到许家屯,千告诉我,许的命运比他更坏,罢免了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党内顾问委员会职务,实际上是断绝了他归国之路。千说:民盟还没有开除我的盟籍,我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回去的。在我离开洛杉矶的前几天,我去了千家驹家,更想听听他对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什么看法。我提问题后,他即拿出最近写的文章,他说他非常拥护邓的讲话,而且还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说我把你的文章带回去给民盟领导们看看。他说不必了,去年几篇文章都不相信我,把我撤了职,这篇文章他们也不会相信的。接着他拿出一张报纸,上面有“民运分子”写的文章,说千家驹对共产党是小骂大帮忙。我们看了一笑置之。

1992年2月中旬,我们回到北京。3月全国政协召开七届五次大会(因年龄所限,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了)。民盟小组第一次会,召集人首先向大家打招呼,说今天是开放组,有港台记者列席参加,大家不要谈三峡问题,也不要谈千家驹问题,注意内外有别。大家一听也都意识到了。会后,我问《人民日报》记者,民盟组讨论的情况如何。他说内容平淡,不像过去讨论那么热烈了。

1992年7月,我去美国时又去看望千家驹。千拿出三篇文章都是对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说他作为一个中

国人,一个经济学者,这是应尽的义务。他再次表明不接触“民运分子”,不去台湾。他说:台湾蒋纬国派人来邀请我去台湾,我拒绝了。

12月22日,民盟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民盟中央委员王丹凤(电影女明星)从香港赶来。我们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千家驹已回到香港。我们开办的素餐馆还宴请了他们。现在正在办理回深圳的手续,不知大陆领导容不容他回来。大会开到最后,先选举中委,本来候选人名单上没有千家驹,而千竟得46张票。在新的中委会上选举中常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也有人选举千家驹为主席。我仍被选为中常委(历次选举都是定额选举,不是差额选举)。

千家驹在香港要求回到深圳受到阻碍,一气之下,即给江泽民、乔石写了一封信,请香港工委传真过去。信里说明他出国经过,在美国的情况,现在香港想回深圳受到阻碍,希望总书记予以批示。三天后,就回了信,表示同意他回深圳。以后千家驹决定就在深圳定居。但他在香港出版的著作,不能邮寄,只能私人亲自带回来。看来千的自由还受到一定的限制。

千不来北京,我们有时通电话互相问候。据说,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领导人有人去看过千。2001年11月,一天我与千家驹通电话,想问问他的近况。千夫人接的,她说千今年已93岁,头脑还清醒,行动有些困难。千老的生日李瑞环、王兆国曾来给他作寿。最后她说:千老已成了统战对象了。

2002年9月3日,千家驹逝世。李瑞环、中央统战部发了唁电,《人民日报》也发了新闻,介绍了他的生平,赞扬他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政策,积极支持改革开放,并经常提出建设性意见。但对去美国这段历史只字未提。

千家驹去世,民盟没有举行追悼仪式,民盟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几乎都没有见过他,民盟机关老干部对千去美国几年总还抱着几分怀疑态度,社会上的报刊也很少纪念千家驹的文章。我今年已98岁,想在离世前要写出一篇给大家认识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千家驹,也是对我这位良师益友最好的纪念。■

(作者曾任沈钧儒政治秘书)

(责任编辑 黄 钟)

读《历史的误读》

○ 邓文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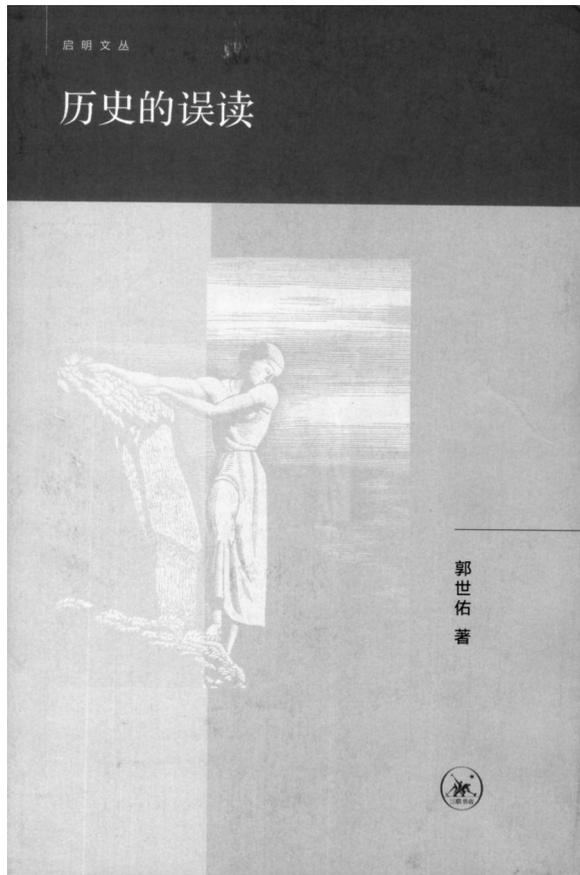
北京三联书店最近推出了郭世佑先生史学论文集《历史的误读》。所选文章时间跨度大,发表时间上限在上世纪80年代,历经30余年。一卷在手,不仅可以呈现郭先生个人的近代史研究历程,还能展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因为,自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中的关键性理论突破,郭先生几乎是每役都有参与。如太平天国的阶级属性,曾国藩的历史功罪,李鸿章是爱国还是卖国,洋务运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争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争论,甲午战败的原因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提法的起源,历史教科书的评价等等问题。他与他的前行者提出的观点,一些在当时曾被当作“异端”,现今已被史学界接受,成为我们时代所共享的“常识”,一些观点在

当时是惊世骇俗,此后史学界仍在讨论,而今天读来,却还能感觉它那振聋发聩的力量。

正是因为这一特征,郭先生这本史学论文集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

三联版的《历史的误读》,尽量恢复了文章在正式刊发时删节了的段落、章节与文字。正如作者所说,尽管我们一再宣称思想无禁区,但出版有纪律。这种“内部纪律”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之大,直接导致许多学者的自我审查。而对于郭先生这样的“观念上的突破者”,则意味着,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运思如何才能把一件新的史料、一个新的观点,一个“犯忌”的概念表达出来,而不是一开始就被扼杀在编辑们的裁剪刀下。本应“我手写我心”的思想表达却不得不沦为一种走钢丝般的特技。其中一些文章的发表,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笔下的近代史》《毛泽东是不是历史学家》两篇文章,本来是一气呵成的一篇长文,却被编辑们强行拆散。现在想“破镜重圆”也无能为力了,作者只好附加脚注略为提示。

一般史家论学,总要表白自己“价值无涉”,以“学术中立”的时髦遮盖自己的价值空洞与行事犬儒,似乎历史学也能像物理化学、桥梁工程一样“客观”,可以排除研究过程中史家的价值判断与人文关怀,可以与自己的史观、史识、史德“无涉”。但郭先生此著却公开自己的价值诉求,清晰表达出一个史家应有的历史观念,提出“四项原则”:一是从事实出发,任何先入为主的是非、好恶、优劣、主次观念都无条件地让位于事实;二是从历史条件出发,既不作超时空的道德苛求、能力苛求或漫天飞舞的无类比附,又不以简单的历史结局去推导复杂的历史过程,充当“胜利者的宣传”;三是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既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又不以任何个人与团体的好恶和利益为依归;四是从历史发展潮流出发,不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念所左右。通读全



书,可以感觉到郭先生史论中对此价值评判的坚守,虽然,在中国语境中,这样做颇为艰难,有时还很不讨好。

作者的近代史研究历程曾经历人物、事件、史论这样的顺序,而今研究领域向历史哲学、史学教育方向拓展,《历史的误读》即按这种理路编排,以“史事归真”、“人物显真”、“史评道真”、“史论求真”四个栏目辑录文章。这样的编排,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无论是“显真”、“归真”,还是“道真”、“求真”,均含一个“真”字,“这并非作者的个人偏好或刻意标榜,而是历史学的精义与历史专业的基本规训之所在,也是作者忝列教师职业的行规所在,历史专业与教师职业的双重规范,决定了吾辈除了求真道真,就别无选择了”。

历史学家的天职在求真,与郭先生先前几本著作一样,《历史的误读》一仍“真”之主题。在史学之求真方面,郭先生似有系统的思考与开拓创新处,本文也拟以此为题,对郭先生史学求真的运思,略作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固然,史学之求真,最基础的是史实的真伪,证据的虚实。这一层面的史学之真,不需太多的解说,让证据说话便罢。但历史的真伪并非只在这一技术层面,而有着远为复杂的情状与远为丰富的层次。

首先,在中国语境中谈历史之真,必然面对意识形态的制约。

中国近代史研究面对的最大障碍,不是史实真伪混淆,而是正统史观对求真的制约。历史教科书,从小学到大学,千篇一律,都是革命史观建构的“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但郭世佑先生通过严谨而娴熟的文本分析指出:毛泽东论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前后矛盾之处颇多,他是“按照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来阐述中国近代史”,“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因此,其史观,就具有“主观性”、“时效性”、“政治性”、“多变性”,“不仅论点不一致,变动不居,而且还不全符合历史实际”。更进一步,他以充分的同情,揭示出这种特征的产生与作为职业革命者、而非历史学家的毛泽东个人身份之关系:“他对近代历史资料的掌握相对有限,并不十分丰富;他的叙史、评史之目的与其说是求真,还

不如说是求用,政论多于史论,时评多于史评;他的近代史论述只散见于某些讲话与文稿,有的论点经常多变,还缺乏独立完成的历史论文,遑论历史著作,代表作阙如。平心而论,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是职业革命家,并不兼具历史学家的身份。”

郭先生认为,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有关近代史论述自成体系,可以成“一家之言”。文章还特别点出一些被忽略的“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真知灼见”,如中国社会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中国社会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性特征等。

将毛泽东的革命史还原为“一家之言”,本身就是史学求真的第一步。这个层面之真伪自然并非史实考辨之真伪,而是史论层面的去伪崇真。如果将史实真伪之考辨当做史学求真第一义,此即史学求真的第二义。

“一家之言”一旦成为“史学正统”,且以此为标准衡量史学,则学术之灾也就不远了。标准一旦失去比较,标准也就失去效力。

正统史学乃是建立在真理的独占上,需要打压一切异见,排除所有质疑,需要对“真”进行单方向的解释与规定,建立一元论的绝对历史观,这种“单一”历史不仅排除了历史领域所有的偶然性因素,而且窒息了所有的可能性与多样性。它是对历史解释权的垄断与独占,也就是对历史之真的垄断与独占。“学术公器”被权力工具化,历史叙述成为权力注脚,历史成为一党一派一家一人的说明书与宣传品。一家之言一旦成为史学正统,它就变质为意识形态,而非纯正学术。因为它被意识形态化,故其解释要求绝对化;因为它沦为宣传品,所以历史被简化为抽象概念。

哈耶克说,一种文明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已被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正统史学的危害正在“扼杀新知识”,中国文明长期停滞,乃至近半个世纪的大步倒退,也得归功于这一扼杀机制。

但郭先生坚持,历史不是胜利者的猎物,也不是他的宣传品,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公共记忆、集体财富。“学术乃天下公器”,而非权者的神器,正因为是“公器”,所以史学之真有着复杂多面的存在。郭先生说,“历史是丰富多彩的,

也是错综复杂的”，“治史如看山，看山的角度多一点，认识全貌的片面性就会少一点。充满血泪与悲欢的中国近代史尤其驳杂斑斓，任何一种历史观点或研究体系，任何一部近代史论著都不可能把它包罗万象地概述无遗。”

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历史进程的不同步性、反复性，历史动力的分散性、对抗性、向心力与离心力；社会远景设想的个体性、多变性；历史理解的歧义性、模糊性等等，构成近代中国众声喧哗的历史场景，这种混乱纷扰的局面、复杂歧义的情状，乃是史学之“真”的第二义。

郭先生在《历史的误读》自序中说：“就整体情状而论，观念的重铸并不比观念的混乱来的容易”，其“情状”所指即是这种整体的历史。历史研究的还原、求真，只有达到这个层次才算是确立了历史的“本真”，也只有达到这个层次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史家。历史学家是那些发现了人类活动新领域，并开拓其广度和深度的思想者，是那些找到并重建人类心灵家园的人。历史的多样性如同人类文化与自然生物的多样性，在他的笔下生长、繁荣。史学的求真，最核心的是求这个本真，它是一般历史学研究的背景与前提，是历史学的工作框架。

《历史的误读》自序中说，受意识形态的灌输熏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要谈历史，国人喜欢重定性、轻事实，重评价、轻分析，重论点、轻论据，重结果、轻过程，至于历史评价，更是重暴力、轻知识，重破坏、轻建设，重贫穷、轻财富，重下层民众、轻中层上层，还守住一分为二的战争思维，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复杂的历史就是这样走向简单与公式化的，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解释与评论尤其如此”。

郭先生认为，一家之言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一旦官化为史学正统，则这样的“史学”必然让我们丧失最基本的逻辑推断能力，丧失复杂性思维的训练，丧失对可能性的想象空间，更让我们民族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时迷失方向。

史学真伪之争表面看是学界内部的杯底烟云、笔端波澜，是象牙塔内的电光石火，但究其根本，却事关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认知，事关国家命运与未来。史学求真之路，一方面是学术自身的要求，但更是学人的使命。

求真不仅涉及史实真伪的考辨、历史本真的追寻，更与史家的求真冲动、意识与求真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郭先生所说：

正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才使历史的本质与历史学的科学属性等问题在中外学界仍属见仁见智，争辩如初。倘若历史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倘若“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那么，求真云云，谈何容易。

郭先生此论，其实提出了史学求真的第三层意义，史学之真，是历史学家与他的史实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问答交谈”。借用哲学术语，即史学之真乃是“主体之间”的事，具“主体间性”。这个层面史学之“真”，就不仅是一种“物”的存在，也不仅是某种纯主观的表达，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即“真”不仅是结果（我们一般只能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史学之真），更是过程，是一个并未完结的探索。史学界常说“尽量还原真相”，其实也是从这种无限接近真相过程来说的。没有一个史家敢断言自己的结论绝对真实，只能说在努力接近真实，这才是史学对真的科学态度。

史学之真的第三义，它是事实之真与历史本真的前提与保证。

郭先生正是认识到历史研究的“主体间”性质，才对史家自身的状态予以高度重视。在中国大陆，史家被贬为“历史工作者”，仿佛历史研究是工厂生产、流水作业。这种认知严重忽略了历史学的主体存在。历史学是心智的探索与创造工作，历史学者的心智水平决定了历史学的水平。然而，历史学者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语境中，历史学者们还是扭曲的教育批量制造出来的，是历史教科书灌输出来的意识形态产品。久处这种环境中，很少人能有反思能力，批判精神，难以反省自身的知识局限与工作背景，以其人之昏昏欲使人之昭昭，这样的史学岂非笑话？中国学术不能成就，与这种无明状态有直接关系。

所以，郭先生提出：历史研究者不仅需要对自己的局限有着清醒的认知，还必须对历史保持必要的敬畏，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时段虽短，“然而，它的复杂性不仅堪称中国历史之最，而且远

出近代史研究者自身的预计之上”，再加上，“近代历史与当代现实之间还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时空关联，当代国人的某些主观情感与利益考量，也制约着不同类型的人群对近代历史的认知与诠释，求真云云，良非易事。”

因此，史学之求真，对于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能力构成巨大的挑战，需要研究者“对这种局限保持高度的自觉，尽可能不为情感与利益所左右，并在‘还本来面目’之类的豪言壮语面前多留一点余地”。史家一方面需要培养一种“隔离的智慧”，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对社会的关怀，隔离而非隐遁，静观而非冷漠，这样的心智对于常人来说确乎难事。郭先生充分揭示了其中的困境：“研究者与历史之间的时空距离越近，‘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能力就越大，但同时抛弃主观情感解释历史的可能性与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数也就越少，这就可能产生对历史的误读”。

为避免“历史的误读”，从史学研究者自身层面，需要培养复杂性的认知体系与审思标准，这是郭先生多年来在历史教育中一再强调的需突

破方法论上“四个定势”，即革命史观决定论、西方中心论、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片面的阶级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历史研究中的“四个关系”：一是定论与逻辑，二是事实与价值，三是结果与过程，四是论点与论据。

在此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逻辑比定论更重要；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历史过程比历史结果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既不要混淆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也不要价值评判取代事实评判；既不要只注重历史的结果，更不要用结果去推导过程，苛求过程，虚构历史规律；不要只看重论点，演绎论点，却不在论据上下功夫，避重就轻。

史学求真之旅，说到底是史家的求真之路，如果史家不能“求其放心”，无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饱受污染的心智，何能产生精纯的思想？所以郭先生曾多次引述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的名言：“只有一颗年轻、清新而又纯真的心才能发现真理。”这颗纯真之心，可以算是史学求真之第四义吧。■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公益广告





孤儿保障大行动

每50元善款即可为一名孤儿提供一年期、保障额度为100,000元
全面覆盖12种少年儿童常发重大疾病的公益保险

关注我们

腾讯微博：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
新浪微博：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
微信公众号：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
来往公众号：孤儿保障大行动

网上捐款

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官网：
<http://baoxian.cctf.org.cn/> 点击“我要捐助”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官网：
<http://www.cctf.org.cn/> 点击“在线捐赠”选择“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

一位旧政人员的自传

○ 孙握之

【整理者按：先君握之公(1914—1976)，字祥瑜，虽一生未上过正式学堂，然凭书香世家学渊源和天赋勤奋，于1939年二月廿五岁时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任会计师；并谙熟岐黄、韵律、金石篆刻、书法绘画、古籍版本等。《自传》正文系蓝色字体写在长36cm、宽27cm的棉纸朱丝栏20格通行稿笺上，应是原件复写存底；计8页，页首订有长28.5cm、宽18.5cm的棉纸竖行朱丝栏10格稿笺，竖写从右至左《自传要点》五项；每项后列小项若干，计14项；小项后又列若干小项，累计38项，几同审问人犯。显然是抄录“自传”要求。所写皆为繁体字，此改为简体，并规范了标点符号；书写格式为打印方便，亦改为从左至右横写；需要注释处用括号内仿宋体。——孙恪庶】

自传要点

(仅供参考)

一、家庭情况：

1. 你家有些什么人？他(她)都是做什么的？
2. 你家有多少动产与不动产？目前靠何种收入生活？

二、个人历史：

1. 你生于什么时候？
2. 你何年何月考入什么学校？是否毕业？应按自己年龄详细说明。
3. 你解放前做过什么事？当时是如何进去工作的？何人可以证明？
4. 你解放后如何参加工作的？现任何职？
5. 你参加过些什么党派、团体等组织？在何处参加？怎样参加的？当时动机为何？有何活动？现在关系如何？曾否向组织上交待？有何证件？何时交出？

三、社会关系：

1. 你有些什么亲近的朋友、同学、亲戚？他

(她)们现在何处？做什么？现在往来如何？你们是如何认识的？他(她)对你思想上影响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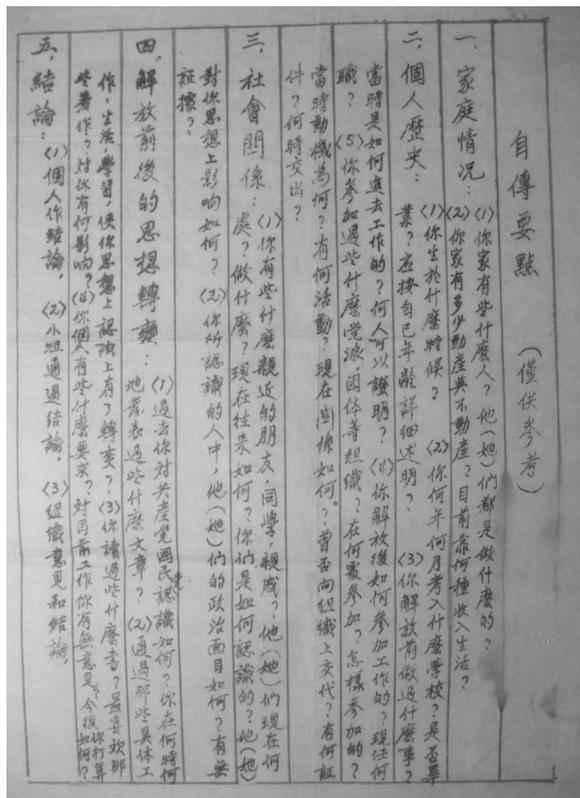
2. 你认识的人中，他(她)他们的政治面目如何？有无证据？

四、解放前后的思想转变：

1. 过去你对共产党、国民党认识如何？你在何时何地发表过些什么文章？
2. 通过哪些具体工作、生活、学习，使你思想上认识上有了转变？
3. 你读过些什么书？最喜欢哪些著作？对你有何影响？
4. 你个人有些什么要求？对目前工作你有无意见？今后你打算如何？

五、结论：

1. 个人的结论。
2. 组织意见和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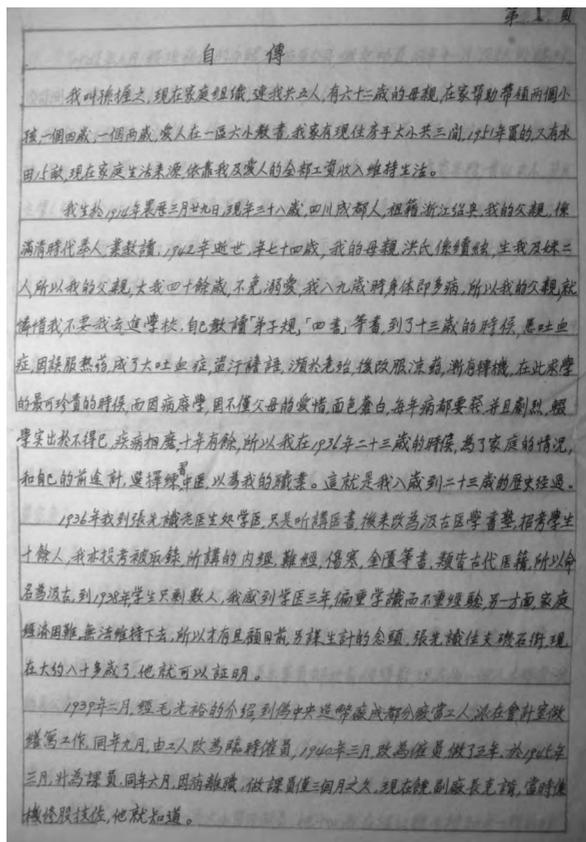
自 传

我叫孙握之，现在家庭组织，连我共五口：有六十二岁的母亲，在家帮助带领两个小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爱人在一区六小教书。我家现有住房大小共三间，1951年买的；有水田十五亩。现在家庭生活来源，依靠我和爱人的全部工资维持生活。

我生于1914年农历三月廿九日，现年三十八岁，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绍兴。我的父亲，系满清时代举人，业教读，1942年逝世，年七十四岁；我的母亲洪氏，系续弦，生我及妹二人。所以我的父亲，大我四十余岁，不免溺爱。我八九岁时身体即多病，所以我的父亲，就怜惜我，不要我去进学校，自己教读《弟子规》、“四书”等书。到了十三岁的时候，患吐血症，因误服热药，成了大吐血症，盗汗谵语，濒于危殆；后服凉药，渐有转机。在此求学的最可珍贵的时候，而因病废学。固不仅父母的爱惜，面色苍白，每年都要发，并且剧烈，辍学实出于不得已。疾病相磨，十年有余。所以我在1936年二十三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的情况和自己的前途计，选择练习中医，以为我的职业。这就是我八岁到二十三岁的历史经过。

1936年我到张先识老医生处学医，只是听讲医书；后来改为汲古医学书塾，招考学生十余人，我亦投考被录取。所讲的《内经》、《难经》、《伤寒》、《金匱》等书，类皆古代医籍，所以命名为汲古。到了1938年，学生只剩数人，我感到学医三年，偏重学识而不重经验；另一方面，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维持下去，所以才有了且顾目前，另谋生计的念头。张先识住支矶石街，现在大约八十多岁了，他就可以证明。

1939年二月，经毛光裕介绍，到伪（按：斯时凡国民政府所有机关、部门、单位、学校、职衔称谓之前，皆冠以“伪”字，如“伪川大”、“伪军人”等，不一而论。下同）中央造币厂成都分厂当工人，派在会计室做缮写工作；同年九月，由工人改为临时雇员；1940年三月，改为雇员，做了五年，于1945年三月，升为课员；同年六月，因病离职。做课员仅三月之久。现在饶副厂长克谐，当时系机修股技左，他



就知道。

1945年八月，经孙祖武介绍，进西原公司，做记账员；同年十一月，因抗战胜利，公司关门，得了一个月的遣散费，离开公司了。1946年四月，经曾禾生介绍，到四川大学工学院附设水工试验室做雇员，系顶补缺额，用别人的图章领薪。嗣以办理会计，兼管事务，仅我一人，疲劳已极，担任不下；再以未装机件等，乱堆地下，夜窃甚多，责任不小；并且主管人张有龄性情乖张，屡遭詈骂。于1946年七月，经杨端甫的介绍，到伪四川省公路局做雇员而离开了水工试验室。在公路局也是顶他人的遗缺，用他人的图章领薪，因为适逢裁员，不能报请正式递补；同年十一月实行裁员，终被资遣，得了三个月的遣散费。至1947年二月，经西原公司同事刘仙源的介绍，第二次进了公司，仍做记账工作。至1947年十月，因邹秉鲁的介绍，进入伪中央造币厂四川厂会计科做办事员，而离开了西原公司；同年十二月欣逢解放而被留用，以迄于今，继续在本机关做会计工作，一年又九个月。

我在习医三年和在机关做缮写及记账工作八年中，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等组织，

更无任何活动；至于危害人民的事，直接没有，间接也没有。我的亲戚不多，舅家无人。大姊彭氏，有田四十多亩，是一个地主，住双流，不常见。二姊曾氏，住成都，有子四人：长子参加革命工作，在成都，解放后相见甚少；三子现任南京市党委，解放后未曾通信。四姊夫毛友诚原在邮局工作，现已年老家居，他有两个儿子：毛邦达、毛邦荣，都在四川大学教书。我在水工试验室工作的时候，他们二人在工学院读书，与我常见。妹夫杨端甫，原在伪公路局做过办事员，解放前被遣散，现在做一个小本经营。我的岳



1955年7月12日孙握之摄于沈阳中央造币厂任上。

父，有田六亩，做过伪四川省卫生处科员，时间不久，改做纸烟小商，现住成都常见。至于朋友、同学方面，在汲古医塾的同学，仅有十余人，素无往还。机关公司的同事，当时就少追随，离开机关公司之后，信函往来，亦绝无仅有。

我的爱人王素芳，系一区六小留用教员。她十四岁在温江县中读初中一期的时候，童军校官叫他们童子军，集体加入三青团；记下一个名字，从未担任过职务，也没有任何活动；1951年□月，由一区六小，集体向公安局登记。她在反动政府的时候，教小学数年之久，系经他的姑父钟汝为介绍的。钟汝为现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成都临委会），他就可以证明。

现在我就说到解放前的思想如何。我在十三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时间，是一个最苦恼的时间，因为疾病，耽误了一生前途。在此十年中，家庭生活的来源，一方面剥削农民，年收米四石有余；另一方面就靠父亲教书改文，来维持生活。父亲年老，就学者日少。当时我的思想：（1）决心学医，找一个正当职业，谋一条出路；（2）我身多病，学医兼能慎疾；（3）感觉到我无学历，又无经历，更无人事关系，行医可以自食其力。

我在机关公司做会计工作八年，给我思想上有些影响，不像未做事以前，思想单纯些。（1）想到祖宗及父亲，假使多留些产业给我，也就可以

解决我家简单的衣、食、住，我何至于以孱弱的身体，出来挣钱而受伪币贬值，生活压迫的痛苦；（2）我在机关工作，当一个小职员——雇员，六年有余，深深了解了莫有背景，决不可能往上爬；自己没有学历，更不可能爬上去，因此非常消极和悲观；又受家庭生活的打击及长期过着数字生活，就把我造成呆板沉默的人，也就是无用的人了；（3）经过社会上的磨练，认为无人可靠，本身又无能力，连自己都靠不住，思想上就抱着居卑居贫的感想，聊以永日的态度；所以对于政治问题，从来没有去过问他，没有产生

任何动机去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外界的引诱去参加，至于发表文章，有关政治社会者，经检查一下，决无其事。

我在二十三岁以前，就病了十年。在家由父母教读，所读的“四书”、“五经”、《左传》、诗文。每年病都要发，所以或学或辍，未能深入而改学医。父亲所教的，大约可分为四类：（1）要孝顺父母，以敦伦纪；（2）要正心诚意，不生妄念；（3）要谨言慎行，免遭怨尤；（4）要慎交寡游，免流非类。所受的教育如此，给我思想上，养成孤僻成性，不易扭转。

1945年八月，进了西原公司，始知经理三人：一孙静山，二林文韬，三赵律深。孙静山系伪浙蓉中学（按：为孙德操创办，后改为树德中学，1949年之后改名为成都市第九中学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恢复原校名树德中学）校长、伪国大代表孙震（按：字德操，抗战时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一军军长，率军出川抗战；在台儿庄大捷外围战略滕县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一代抗日名将王铭章将军即其麾下）的儿子，当时给我思想上有些影响。因为孙静山的祖人，也是从浙江绍兴迁入川的，可以算是同族；虽然从不认识，我今在公司工作，将来或者有一点照顾。他们经理等追求娱乐，奢靡豪华，我思想上虽然认识他们是不对的，但没有从本质上辨清他们囤积居奇，剥削人民换来的这些腐化生活，

反之确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没有经济出路,不可能和他们靠拢;又以孤僻消极的思想支持,也没有寻求途径,与他们相亲相近。同年十一月,公司停办,仅多得一个月的遣散费而离开公司后,屡次向孙静山说,给我谋一事,终于不顾。这是我第一次在西原公司工作四个月的情况。步元凯可以证明。

我第二次进西原,系在1947年二月。那时公司的人数,只有五人:林、赵两经理已离开公司,总经理仍是孙静山,经理为步元凯。孙不过负个名誉,经常不到公司。实是步元凯主持业务,吸收存款,转放高利;或囤积商品,高价出售,(获利)仅够职工伙食及工资;我每月所得,不过银元八九元之谱。到1949年十月,进了伪中央造币厂四川厂而离开了(西原)公司。这是我第二次进(西原)公司,做了记账工作二年又八个月。时间虽久,思想上没有什么变化。

1949年十月。我因邹秉鲁的介绍,进伪四川厂工作。进厂以前,我打听韦宪章来厂,厂的待遇很高,我就写信给韦,说明我在成都分厂做过五年的雇员。隔几天,我来厂到门房上听信,得不到个着落就去了;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不知凡几,终于无效。后来黎昭荣来厂,我又写信给他,他和我素不相识,一同置若罔闻。不因邹秉鲁来厂,我是不能进厂的。邹秉鲁在成都分厂当会计,我在会计室当雇员,介绍我的原因,就是在此。当时我的思想,感觉到没有人事关系,决定找不到事做。因此回忆到邹由成都分厂离蓉后的时光,约有七八年,我未曾给他写信,自己平常不注意人事方面,一至于此。

解放之后,我看见约法八章,量才留用伪机关人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认为我的工作,不知几时失掉。经过数月,看见本机关的员工,或留用,或转业,才知道共产党对于人民,绝对不令其失业;也就知道政府所说的话,是要贯彻执行,而不是徒托空谈的。我对共产党,才初步有了认识。

解放不久,蓉市物价陡涨,人民币剧烈贬值。虽经军事代表说“解放每一座城市都有这种现象,不久就可恢复,只有一次,不会再发生。”当时我的思想上,认为是一种谎言,以为反动政府,有孔、宋的财富,(都)把物价遏止不住,节节上

涨;中国的财富,又被反动派带走,共产党更无法来平抑物价。但时间不久,物价即趋正常。因此回忆到反动统治时期,物价越平越涨,共产党来不久,即做到这件有关民生的事情,我感觉“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这句话,才有了信念。(看到)现在劳动人民,在解放不到两年的今天,逐步转入的美景,也就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是共产党为人民革命,给予人民的胜利果实。

在减租退押初期,我很想不通。认为不是我买的田,而是祖宗留给我的,也是旧社会制度造成的;并且我对佃农,从来没有加过押;田仅15亩,剥削行为也不算大。这一连串不正确的思想,后来经过学习“划分阶级成分”、“减租退押”等文件,结合报载地主的如何残酷剥削,反映了农民所受的那样痛苦,才知道减租退押政策,是为了广大农民的正义要求,使农民真正得到翻身的果实,所以要消灭地主阶级,就要从他经济上基本打垮。有了文件的启发,认识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是由地主直接付与他的。很显然的,就是农民劳动产生价值,而为坐享其成的地主夺取;此即便是罪恶。因此更认识我的祖父剥削,父亲剥削,我又继续剥削,这样一来,就是罪上加罪。所有以前不正确的思想,不但是逃避罪恶的思想,而且是地主剥削的思想。经过这样的思想转变,我就下了决心,向农民认错,遵守政府法令,完成退押任务,并且愿在工作中,力行求改进,不消极怠工,不粗枝大叶,以求补偿。

在解放前,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没有的。就是对国民党,只知道他们的所谓“政策法规”,都是不利于人民的。例如货币贬值,生活高涨,米荒钞荒,剥尽财富。至于贪污腐化,狼狈为奸,蛀国害民的事,不胜屈指。这是反动政府给人民表现出来的。并非我在解放前,能够在本质上辨清反动派,就是代表在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剥削压榨广大人民;而且我对官僚地主的生活方式,反有羡慕的感想。解放之后,我的思想,经过很多事实渐渐认识了共产党。我在1950年,缴纳公粮的时候,听了征粮工作组的同志对别人说:“国民党要钱,共产党也要钱。国民党拿来进了腰包,共产党拿来为人民办事。”当时我听了这句话,给我思想上一些启发。又联系到拨款修都江堰,导河掘沟,克服蓉市连年水灾,办理救济失业

工人工作；使各就其业，稳定币制，交流物质，恢复摧残的工商业，使人民不受日常生活的压迫等措施。所以我在事实上，认识了共产党的本质，是全心全意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和站在反动立场的国民党，相提并论。

我在解放后，工作将近两年，虽然没有犯过多大的错误，（但）在学识方面，甚感不够；经验方面，亦甚缺如。今后我的愿望，努力业务学习，增强工作效能，努力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服务。

结论——我在旧社会里，是个好人，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在新社会里，也是个好人，也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这样一来，就是把新、旧社会，等夷而观，也就辨别不到一个真理，更不能分清敌友。所以必须分析一下。

我在旧社会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对我的影响，就是安分守己，不走邪路。这是对的。但是桎梏性灵，消灭了进取的心，孤陋寡闻，独善其身这些害处，同时受了影响。我在旧社会里，是个好人，是这样的条件造成的。

我在旧社会工作的时间，自己体验到学识不够，经济缺乏，与资产阶级，不可能挨拢；卑鄙逢迎，又不屑为。于是畏难思返，不去靠拢资产阶级。这是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爬不上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做出危害人民的事。

我在新社会里，是个好人，这是经过一年多的文件学习，和组织上的启发，使我认识到服务是为人民的。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二个文件，更认识到，要成个好人，必须自己拿出毅力去做，要理论与实际结合，才不会倒向伪善；自己成为好人，还要帮助别人，去做好人。这是党的教育，从我思想上去改造，所以我在思想上，经常地自我检讨，使我在工作中，没有时冷时热而受了影响。

我在新社会里，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这又怎样说呢？学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清匪反霸、抗美援朝等文件，认识到为什么要去反对他，正因为他们是危害人民，压迫人民的。又听到农民控诉地主罪恶，烈属控诉美帝暴行；更联系到学习镇压反革命文件，使我建立了阶级的仇恨，对危害人民的人，深恶而痛绝。又认识到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到了这个

时候，人与人之间，都不会有剥削压迫的行为发生。这是从思想上的启发教育，使我明确地认识到危害人民的事，无论大小，是不可以去做的。

综合上述各节，大半是为自己打算，从自己出发，或者联系自己去分析问题，完全披露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思想。

（末行系黑色钢笔字）1951、9、29作10月4日小组通过。

【整理者按：斯时始于1950年初，围绕巩固新生革命政权而掀起的各种政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开展：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布置，同年8月25日成都市第二届各代会讨论开展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运动，于1951年5月基本结束；由1950年6月3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年2月中旬成都开始试点，6月全面铺开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高潮中的尾声；由1950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双十指示”，同年11月5日成都市军管会布告宣布几个反革命组织，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而由中共中央1951年12月1日颁布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10日成都市四届二次各代会通过“开展三反的决议”而掀起的“三反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已经酝酿成熟，亟待全面开展之际……

故先君的“自传”，实则是身为旧政留用人员，人人必须过关的、交待历史问题与思想坦白的“交心”；而差七天就七月后，写在与正文同样稿笺上装订其后，无题目的文字，则无疑是“三反运动”中的自我交待与揭发材料了。——孙恪庶】

我自1949年10月1日（按：斯时凡旧政人员工作年限皆以此日计）进厂以来，我没有贪污黄金一分，银元一枚，伪纸币一张；并且没有受过任何人的贿赂。也没有人送过我[的]物品，也没有人请我吃过饭。这因为我是一个小职员，（入厂）时间而且不久。在旧社会里，都是做的伏案的事，过的数字生活，靠工资维持生计，所以谨守慎为，不敢乱来一点。但是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在旧社会里，不但没有认为资产阶级贪污腐化的危害人民国家的行为是不对的，反而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思想，就是贪污的根源。这就说明当时

我的不贪污,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到贪污是危害人民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体验到学识不够,经济缺乏,与资产阶级,不可能靠拢;卑鄙迎逢,又不屑为,于是畏难知返,不去靠拢资产阶级。这是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在工作中,没有遇到有利的条件,良好的机会,去做出贪污的事实。

在三反运动中,最初我对贪污分子,即认为贪污分子,应当对他们追查。后来经过小组学习和大会报告,了解贪污分子盗窃大量资产,而且自己拒不坦白,才深恶而痛绝之。这因为当时他们的集体贪污,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对于检举揭发,着手困难。另外就是1949年的金银收付账,当时未透过总账;又因为现在会计科普通财务工作,惟我及部同志推动,时间无多,所以在大会上没有具体的材料,来检举揭发。因此就产生一种不好的思想,就是说领导上和工友同志,能够掌握具体材料,我能发现什么问题呢?假使想到一点,也不能解决整个问题。所以我在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表现不负责任的态度。

后来经过小组学习,工友同志们的耐心帮助,认识到贪污分子,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一天贪污的数目,一个人一生都挣不回来。并且看见小组上帮助另一个同志,工友们说:今天具体材料,掌握在工人手中,贪污多少说多少,多报数字不行,少一分一厘更不可能。工友同志帮助我说:你没有贪污,可以检举贪污,要站在三反中来。我因此在思想上起了变化。我想自己经过深入检查,实在没有贪污事实,正好检举别人;又相信工友同志,能够掌握具体材料,不会使贪污分子漏网,也不会冤枉好人。因此我就在思想上,打破情面和怕冤枉好人的不正确的思想,关于检举揭发的材料,我已经把我所知道和怀疑的写出来,送交检查组。

我现在把检举的事实,逐一写出:(1)关于1949年12月,解伪保安处黄金,11500市两;(2)温犯松津购料委员会的账,内有部分黄金及银元;(3)发遣散费提出黄金问题;(4)孙犯普潮借拨巨款赴渝购买器材问题;(5)伪高级职员借支港币,折合为伪本币后,还出剧烈贬值的纸币问题;(6)汇渝处汪枕时二千元是否收到问题。综合上述各节,都是有关贪污,我把他揭发出来,固然是领导的启发和工友同志们的彻底帮助,有了

这些客观原因,使我思想得到转变;但是在主观方面,自己认识到贪污分子的罪恶。我们没有贪污的事实,不能获得群众的彻底相信,都是贪污分子带给我们的。我又想到我写的材料,比较工友们所掌握的,是不够具体,但我把想到的写出来,多少也有一些参考,起一点作用。

关于1952年1月23日,领到51年双薪后,王、温两犯下班时,问我来不来聚餐?我说在五千元以下我就来。事先并没有约过我,因此同到总府街喝酒吃饭,有金邦钧在场。吃饭的时间,没有说过什么话。有关贪污的话,更一句都没有提过。吃过饭后,我就回家了。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金邦钧在1951年大约四月五月内,他第一次交0.500市两黄金给我代他保管,当时他说,他家里经常没有人,恐怕掉了。又隔了一段时间,他又交黄金1.000市两给我。后来他作两次取去:先取一条,系0.500市两;后取一条,系1.000市两。这时他就没有黄金放在我处了。取完过后,又隔一段时间,他又拿来三小条给我保管,每条都是0.213市两的,共计0.639市两。我有剩余的黄金一条,计0.506市两。我家中有人生病,思想上又不愿把剩余黄金作一次换用,就先后借用金邦钧0.213市两的小条2条,共重0.426市两,都是在分行换来用的。后来金邦钧又取去0.213市两。我就对他说:你换了现金后,补我八分金子的价款,我的0.506市两,就算你的了。金邦钧换了现金后,补我陆万多元钱。现在金邦钧交给我的黄金只有0.506市两一小条了。(按:此行距中有小字括号旁注:“1953年1月23日,将0.506市两金条交还金邦钧。”)至于他的黄金来源,我当时思想麻痹,没有问过他。这是应当深刻检讨的。在小组会上,金邦钧说出,骗了家中的人,把黄金弄出来,便于搞男女关系。我才晓得他当时对我说,他“家里没有人,恐怕掉了”这句话,是被金邦钧骗了。

在解放后,我的思想,在50年上半年,尚没有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洗净,例如想吃好的,穿好的。这个思想,就是产生贪污的根源。经过领导的启发,和文件学习,认识到危害人民的事,是不可以去做的。尤其在三反运动中,认识了贪污分子,就是剥削压迫人民的罪人。因此我在三反运

动中,增加我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所以饶犯被送法院时,认为他钻了人民政府宽大的空子,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彻底坦白,应当受到人民制裁的。我自己感到经过三反斗争的教育,今后不但不会有贪污的事实发生,还可以保证把贪污的思想洗尽。

我在解放后两年半中,是不是算为纯洁?这是不然的。我曾经向总务科要过三张做手套的白翻皮屑,买炭渣用公家的炭笼未还来,半节铅笔两支留着自己用,带回家写自传的十行纸尚有二十多张也据为己有。这类情形,虽然是公私不分,但是扩充下去,不从思想上纠正过来,自然会做出贪污的事,而且可能做出大的贪污,走向资产阶级死亡的道路。这次三反运动,使我提高觉悟,防范未来,从思想上救了我。

我在解放后二年工作中,犯了两个毛病:就是把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搞好,与我无关的事,就不去追求上进了;另外就是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做事比较迟缓,又怕把事情做坏了,不免有时发生烦躁。这两种毛病,都是对工作有妨害的。今后我的愿望,努力业务学习,增长工作效能,努力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日积月累,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服务。公元1952年4月22日 孙握之

[整理者后记:34年前历时八年赴滇支边归来,整理先君遗书、遗物时,见到此“自传”及交待揭发材料复写底稿时,笔者简直不敢相信这竟是先君的手笔——这太有悖于从懵懂之初就铭刻于心的、先君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形象了!但这确切无疑地就是先君所写,并且是在38、39岁,正当风华正茂的壮年之际。

尽管早就知道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经受了思想改造运动,笔者心底仍难以接受透过文字所隐现的,那个避重就轻,藏拙示弱,从家族背景、产业到社会关系,都竭力淡化;在人格尊严上极尽弱化、丑化自己,摹仿进步革命的言辞,甚至不惜检举揭发别人以自保的、战战兢兢的男人,竟会是自己心目中一直崇敬的父亲!

在写此交待、检举揭发材料后的三月又两天,笔者降临人世。然在笔者刚满两岁时,中央造币厂因为备战,从内地外迁至与社会主义阵营

的“苏联老大哥”紧邻的沈阳后不久,先君终究还是被迫“自动辞职”了。在举国大干社会主义,天罗地网般地消灭个体经济的政治氛围下,经过三年求职无门,或试图秉承祖业开馆授课,或悬壶济世无望,妻子落井下石,雪上添霜划清界线离异,靠贱卖名贵家具和人文收藏维持一家老小生计,终至陷入绝境后,先君面临稚子和病卧老母,接受辖区办事处分配,进入一家类似街道生产组作坊的小摊摊当会计;直至与母亲分离十八年后,作为三个知青儿子的父亲,于贫病交加中凄然离世。先君去时,举家没能为其找到一身无补丁的旧衣服送行。斯时正值伟大领袖治丧期间,千里边疆全线戒严,笔者没能拼死闯关尽孝送终,遂成终生不能化解之憾。

值得一提的是:先君生前没有对四个早已成人的儿子只言片语涉及族中先贤家事和个人的经历。]

(整理者孙恪庶为成都市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资料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192229、57733087、57192223、57733086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顾娜、高晶、牛萍萍、文馨(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知识分子头上的契卡幽灵

——专政的列宁、执法的契卡和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 闻 一

当“契卡”在广大农村实行“十字军讨伐”时，其火与剑的锋芒同时也指向了知识分子。作为“怠工者”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罪不容恕地被列于“资产阶级”的阵营之中。在列宁的言论和决策中，知识分子总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是和立宪民主党、左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沆瀣一气的，是列宁所坚决主张、“契卡”无条件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支持敌人的人、可被敌人利用的人、潜在的敌人。苏维埃国家对他们的基本政策就是监控和镇压。

在“契卡”作为暴力专政最得力工具的整个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监控和镇压有增无减。“契卡”幽灵一般在知识分子中间游荡，甚至在“契卡”改组为“格布”（国家政治局）时，这种幽灵的游荡所导致的监控和镇压的后果更为严重。

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自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起，列宁就奉行两个不变的原则，第一个是“不搞统一战线”，第二个是“不容许有反对派”。“不搞统一战线”是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布尔什维克不和其他政党分享政权，苏维埃政府就是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清一色政府”。“不容许有反对派”是针对党和道路而言的。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而列宁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坚持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

因此，清除要搞“统一战

线”的人和与布尔什维克持不同政见的人，就成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须臾不可拖延的头等大事。实质上，“契卡”的建立就是为了清除“要与布尔什维克分享政权”的人和敢对布尔什维克说“不”的人。“契卡”所要惩处和镇压的“怠工者”和“反革命”，是指权力机构中不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工作人员和官员，而不是那些工场和工厂里的真正的怠工者。在那时，这些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都与知识分子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左右派社会革命党等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实际上，并且在事实上，“契卡”的矛头是指向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政党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就是反革命的，依附于这些政党的知识分子也是资产阶级的，也是反革命的。对它们和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解散、监狱、流放和枪决。

在这关键时刻，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并且敢于站出来“不”的，偏偏是布尔什维克想要加以

利用的高尔基。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就在孟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报》连续发表文章对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契卡”的行动与权限进行了抨击。高尔基对于十月革命并不持赞同的态度，认为这场革命是一场不合时宜的革命。他在文章中列举了苏维埃政权的恶政以及“契卡”工作人员——特派的“人民委员”的一系列惩罚和镇压的可怕事实。从赤卫队冲进冬宫的那一刻起，高尔基对“斯莫尔尼”就不讲情面：“已经差不多两周了，每天夜里都有成群的人洗劫酒窖，豪饮，用



酒瓶子相互砸脑袋,瓶子的碎片划破了手,他们就像猪一样倒卧在泥泞里,在血泊中。在这些天里喝光了数千万卢布的酒,当然,还会喝掉数千万。如果将这些宝贵的商品出售给瑞典,我们可以用它换来黄金和国内需要的商品——纺织品、药品、机器。”高尔基认为这是夺权者的放纵,于是他又指责说:“来自斯莫尔尼宫的人们稍后明白了过来,他们威胁说将严惩酗酒,但是醉鬼们不怕威胁,继续消灭这种早就应该被征用、被宣布是赤贫化民族财产和出售了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商品。”

高尔基指责布尔什维克(契卡)的非法杀人,说暴动四起的俄国遍地皆是大众的尸体和废墟。1917年12月,他写道:“人民委员先生们,抡起胳膊杀人,分辨不清楚谁只不过是反对他们疯狂行为的人,谁才是革命的真正敌人。”因此,高尔基的结论是非常冷酷的:“斯莫尔尼幻想家们的实用极端主义对俄国是致命的。人民委员们对待俄国就像是搞实验的材料,对于他们来说俄国人民只是供细菌学家接种伤寒的马,目的是让马在自己的血液中制造出抗伤寒的血清来。人民委员们对俄国人民所进行的正是这种残忍的和事先注定不会成功的实验,根本就没有考虑这匹疲惫不堪的、半饥半饱的马是可能倒毙而死的。来自斯莫尔尼的改革家们根本没有考虑俄国,他们在冷酷无情地将俄国变成自己的世界革命或欧洲革命幻想的牺牲品。在当代俄国生活的条件下,不允许发生社会革命,因为绝不可能神话般地把俄国居民中85%的农民瞬间变成社会主义者,而在农民中尚有着千百万的非俄罗斯游牧民族。”

1918年,高尔基从不合时宜的文章中转到更为残酷的现实中来了。他不断地为那些受到“契卡”逮捕、监禁的知识分子向列宁求情:“放了他们吧!”尤其是在1918年的秋天,“契卡”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对知识分子的逮捕和监禁成了“契卡”的主要工作。1918年10月,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彼得格勒工学院教授泽尔诺夫被捕,原因是他是立宪民主党党员,但实质是他指责“契卡”滥用职权。这甚至引起了苏维埃领导人中的戈尔布诺夫和克拉辛的不满,他们写信给列宁请求释放这位教授。列宁

为此不得不给“契卡”写条子:“你们对被捕者泽尔诺夫教授有无严重指控?”同月,莫斯科省“契卡”逮捕了卫生人民委员部一统计局的负责人金兹伯格,原因是怀疑他与立宪民主党有联系。列宁进行了干预,说是有两名共产党员担保,后来“契卡”虽然最后放了人,但万分地不满意。1918年11月25日,萨马拉的历史教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被当地“契卡”无故逮捕,党内有人向列宁“告状”,列宁批条子与“契卡”商量:“能否由教师协会担保放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是在萨马拉,同年12月初,“契卡”逮捕了要到土尔克斯坦去考察开发棉花基地的考察团所有成员。“契卡”逮捕的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是对“契卡”持有异议的人,而且这些人没有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权,是传统的、旧时的“反动分子”。列宁同样在党内人士的压力下,不得不予以过问,电询当地“契卡”：“只能把那些有罪的人关进监狱。”12月21日,数经拖延后,“契卡”答复:“在考察队专家的活动中没有发现任何反革命活动。”结果,才是放人。

上述“契卡”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有着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国肃反委员会也好,地方“契卡”也好,对知识分子是持敌对态度的,都是把他们与各种资产阶级政党领袖放在一起,视同一类,都遵循了列宁在1918年反复重申的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原则”;二是,“契卡”对知识分子的监控与镇压有着明显的“预防性质”,抓起来再说,镇压掉了再说,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杆大旗护着,大方向不会有错,即使有人告状和追究,也是极少数,“纠偏”就可以了;三是,列宁的为数不多的干预过去被认为是对“契卡”的监控,是纠正“契卡”违法和越权行为的“英明之举”,但从一系列案例来看,列宁的这些“干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与此同时他从没有说过,在总体上把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监控和镇压是错误的,应该停止。

愤怒抗议的高尔基

进入1919年后,“契卡”对知识分子的监控和镇压更为频繁和积极了。高尔基对“契卡”,尤其是“契卡”地方组织的无法无天和非法杀人的

层出不穷的事件愤怒填膺。他冒着极大的危险给列宁写出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不仅是替遭到无端逮捕的知识分子求情,更重要的是对“契卡”的行为表示愤怒和抗议。

1919年9月,“契卡”“以反对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名义,逮捕了数十名最著名的俄国学者。这事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动荡与不安。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通科夫请求高尔基写信给列宁求情,高尔基当即写下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件。信中写道:

对我来说国家的财富,人民的力量就体现在它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数量和数量上。只有当革命促进这些力量的增长和发展时,革命才有意义。对待科学界的人士需要(尽)可能地爱护和尊重——在我国,正当十七岁的孩子们在走进军营和国内战争的屠杀之中时,因而在这里知识分子力量的增长将是长期缓慢的,这就尤其必需。我们这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时,割掉自己的脑袋,毁掉它的大脑。

我坚决地抗议这种毁灭人民的大脑的策略,即使不这样做,我们在精神上就已经够贫乏的了。

大量的精密科学的人士,就像科学本身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这些人都是不过问政治的。他们中多数人都是老者和病人;监狱会让他们死亡;他们已经因饥饿而相当的衰弱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站在这些人的一边,我宁愿被捕和坐牢,也不愿对杀害俄国最优秀和最宝贵的力量表示沉默。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红色分子”和“白卫分子”一样也是人民的敌人。当然喽,我个人更愿意被“白卫分子”消灭,但“红色分子”也不是我的同志。

在这封信中,高尔基语气强硬、态度坚决,而且显然都是与列宁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决策大相径庭的。所以,通科夫在9月11日与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一起去见列宁时,一直没有敢将这封信交给列宁,怕列宁看了此信后,他们的谈话就没有好结果了。直到临走前,他才把信交给了列宁。列宁当即读完了信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一笑说:“高尔基以前就是个政治上不成熟的人,现在依然如是。噢,他身体怎样?……代我问候他……”

9月15日,列宁对高尔基的信作出了答复:

瞧你想的,多大的苦难!多么的不公正!让知识分子坐几天,甚至哪怕是几周的牢是对杀害成千上万工人和农民的一种预防……不。让这样的知识分子坐几周的牢不是罪过,如果为了预防(诸如“红色哥尔克”)的阴谋应当这样做的话……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及其帮凶、知识分子、把自己充当民族大脑的资本的走狗的斗争中,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力量才会成长和壮大。

列宁的这些话实质上是在为“契卡”对知识分子的逮捕和镇压进行辩护。他提出了“契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逻辑:“预防阴谋”或者“预防犯罪”。列宁和高尔基的根本分歧显现无疑,对列宁来说,知识分子不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大脑,而是各种可能发生的阴谋和杀害的土壤,因此对他们实行“预防阴谋”、“预防犯罪”就是行之合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防卫。在这里提一下列宁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用法,不是没有意义的。在这封信中(事实上,在他这时的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列宁对“知识分子”的书写用的不是“интеллигенты”,而是“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ки”。这两个词有着重大的语气上的差异,“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ки”是“интеллигенты”的卑称,即是表示说话者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卑视、蔑视的称呼,一种瞧不起、不以为然的态度。

上述彼得格勒数十名学者被“预防逮捕”的起因是“他们向协约国呼吁”。高尔基有一封没有署日期的信件,从信中的内容来看显然是对列宁信件的答复。他对彼得格勒学者“向协约国的呼吁”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有过呼吁,但他们并不认为邓尼金、高尔察克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其他敌人是国家和人民真正利益的代表者,尽管他们也不是共产党人管理国家手段的拥护者。他们不去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共产党员是游手好闲的人、不学无术的人,而主要的是些骗子坏蛋。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工人对待共产党员的态度同样是否定的,就像是对他们从前的主人。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人毕竟向协约国表达了他们不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拥护者。”

在1919年全俄国作为统一军营国度的时间里,显然只有高尔基敢于对列宁和苏维埃政权说“不”。高尔基并不因为有了列宁的明确表态,而

停止说这个“不”字。除了拯救被捕的、被关押的知识分子外，他还对苏维埃当局以“住房紧一紧”的政策，“契卡”予以执行、大规模没收知识分子的住宅的行动不断表示抗议。在1919—1920年间，他自己或者以“彼得格勒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的名义给列宁和有关机构写了数十封信件。他呼吁当局不要查抄和没收学者们的住房：学者的办公室，学者的图书室是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这些地方他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了。对于“契卡”的查抄和没收，高尔基在一封信中写出了自己尖锐的指责：“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除了过分地刺激一些人，而让另一些人腐化堕落外，我们什么也建立不起来。这里所说的腐化堕落，我是指从住宅里偷盗家具设备。”

1920年4、5月，“契卡”以“怀疑欲逃跑至爱沙尼亚”的罪名逮捕了著名外科医生费奥多罗夫，高尔基又再次给列宁写了“请求信”。总之，这样的请求和申述对列宁来说已经到了不堪其扰和难再忍受的程度了，高尔基事实上已经从不合时宜的人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被放逐的高尔基

1920年，列宁50岁。《共产国际》杂志把高尔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为社论予以发表。同期还发表了高尔基的另一篇文章。

同年7月31日，列宁对这两篇文章作出了最尖锐的回答：“我在征集签名之后，向政治局提出如下建议：中央政治局认为《共产国际》第12期刊登高尔基的两篇文章，尤其那篇社论，是极不妥当的，因为这两篇文章不但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今后，此类文章绝对不得在《共产国际》上刊登。”（黑体字为列宁所用——闻注）

是什么文字如此激怒了列宁？让一贯“哈哈一笑”对待高尔基指责的列宁对高尔基采取如此



高尔基(托皮科夫作 1916年)

激烈的措施？尽管《列宁文集》中收录了列宁的上述建议，却没有指出，即使是在注释里也丝毫没有一句高尔基文章的具体内容。也许，看一下列宁愤怒指责的“尤其那篇社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中的一系列文字，就可以得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结论来。

“就我个人而言，列宁作为社会改革家的作用要低于他作为世界革命家的意义……对于列宁来讲，俄国只不过是他在全世界各地已经开始搞的实验的材料。以前，这一被对俄国

人民的怜悯心情所掩盖的想法曾令我愤怒，但当我观察俄国革命事件是如何进展、扩大和深入，正在越来越强化地激起和组织起那些能够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力量，所以我现在认为，如果俄国注定要成为实验的对象的话，那把这一责任推到力图将俄国劳动大众潜在的能量转化为能动的和实际的能量的人身上是不公正的。”

“错误，如果需要谈错误的话，没有罪行。列宁的错误是诚实之人的错误，而在世界上尚没有一个不犯错误而行事的改革家。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等人又怎样？他们是像真正的坏蛋，像职业杀手不犯错误地行动，但让全体人民去谴责寒冷和饥饿的痛苦，去继续公民的内讧，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没有能够夺权和激发起疲惫不堪的国家去从事高效劳动的能量。”

“这个人在工人的集会上讲话——他讲话的通俗易懂、强硬、逻辑之冷峻令人惊讶，但是，在他的所有严厉的话语中我从未听到任何粗鲁的蛊惑、任何花言巧语的陈词滥调。他始终在讲一事件：必须连根消灭人的社会不平等以及达到目的的途径。这个古老的真理在他的口中是激烈的，不可调和的：你总会觉得，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它，而且你也觉得，他的这一信仰并不刺眼，是宗教狂的信仰，但这是学者的，而不是形而上学者的，不是神秘主义者的宗教狂。我觉得，他几乎对个人的人性不感兴趣，他所想的只是党、群众、国家，而在这方面他具有作为思想家—实验家的

预见天才和天才的直觉。”

“政治领域中无畏才智和锐利的洞察力——是列宁的性格的基本特征。”

“列宁比我同时代中的任何人都伟大,虽然他的思想,当然,首先是那些被耽于幻想的人称之为‘目光短浅的实际的’政治想象所占据……列宁全部生活的基本目的是全人类的幸福,他必然应该洞察到在那遥远的将来这一过程的结局,而他的整个身心所系就是为这个开端服务。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在这个概念里把个性的所有力量都融进一个思想——普遍的幸福的思想的话。”

“作为严峻的实事求是者和机智的政治家,列宁正在逐渐成为传奇人物。这——好。”

“列宁有时也把人的好品质评价过高,但他几乎总是持否定的评价,而且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就必然会被那些他在未看到他们的工作结果而对其作出否定评价的人们所证实。这也许可以证明,列宁对人们的坏品质要比好品质敏感,但这也说明,对他来说,坏人总是要比有用的人多得多。有时,在这种激烈的政策中也显现出对人的几乎是女性温柔的火花,而我也相信,恐怖对他来说也是不能忍受的痛苦,尽管这痛苦被非常巧妙地隐藏着。”

“任何的杀戮我都本能地厌恶,但是这些人是受难者,而我的良心永远不会去谴责他们。”

“许多人认为,这是无为。而我以勇者奋不顾身的荣誉开始自己的革命情绪鼓动者的工作。曾经有个时候,对俄国人民的天生的恻隐之心迫使我认为无为几乎就是犯罪。但是,现在,当我看到,这个人民较之自觉的和诚实的工作,大大善于忍受痛苦的时候,我重新为勇者神圣的无畏唱赞歌。在这些勇者中间,列宁是第一个和最疯狂的一个。”

在这篇作为列宁50岁寿辰而写的纪念文章中,高尔基不仅谈了对列宁个人性格、能力和行事方式的评价,更是通过这些文字写出了对十月革命,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红色恐怖”的评价。从上述摘引的文字里,不难看出几点:第一,高尔基认为,作为一个人来讲,列宁几乎不关心“个人”、“人性”;他更习惯于看人的坏处而不是看人的长处;第二,列宁是个无畏者,而这种无畏使俄国人民(主要是农民)更善于忍受痛苦,而不是去劳动;第三,列宁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改革

家,而不是革命家;第四,列宁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在俄国的土地上进行一场“全欧洲的社会革命”,这是一场列宁已经开始却不能看到结局的“实验”;第五,列宁所搞的“红色恐怖”是高尔基所坚决反对并深恶痛绝的;第六,俄国正在进行的一切是“无畏者的奋不顾身”,列宁在其中“身列首位和最高位”,是“最疯狂的一个”。

但在这篇“祝寿词”中,高尔基根本就没有提到下述几点,而这几正是列宁所日夜为之奋斗、竭尽一切力量加以实现和捍卫的。第一,高尔基并没有认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他只是说,这是一场“实验”。第二,高尔基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反而谴责“恐怖”、“一些人为了自由去杀害另一些人”的“杀戮”。第三,高尔基没有谴责与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知识分子”,反而为他们竭力辩护。第四,高尔基没有歌颂当时列宁正振臂高呼并热切期望的世界革命,而是把这种革命缩小,甚至贬低为“欧洲革命”。

此外,在这篇作为社论的祝寿词中,高尔基所用的语言也是赞颂与抨击糅杂,论述与讥讽并行,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高尔基对苏维埃现实生活的不满意和难以忍受。这样一篇祝寿词当然是正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有反对派”、“一党专政”的列宁所不能接受的,更令列宁恼火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高尔基反复强调他对列宁有多年的了解,有关对列宁的文字都是客观的、真实的。而这在列宁看来,这篇祝寿词就具有更强烈的蒙蔽人们眼睛的作用。所以,他愤怒之下对高尔基下了禁令,封杀他的文字。

在7月31日列宁的愤怒之后,解决高尔基的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但对高尔基不能采取对待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的“红色恐怖”政策,于是列宁决策了一种新的,但也是俄国古老传统的“流放”政策——在鲜亮光彩的关怀声中,把高尔基送出国门,不得再返回。列宁在实施这一决策前反复给高尔基写信,动员他出国“养病、治疗”。其中一封信这样写:“您的信件和结论以及您的所有印象都是病态的……人们对您说。您该换个地方,您没有置身于直接观察工农,即俄国9/10居民生活中新事物的处境之中,但您固执己见,您未能做到。”在这种谴责之后,列宁动员高尔基出国:“彻底的改变环境、人群、居所、事业,否则可能会彻底厌恶的。”

这最后一句话是模棱两可的,列宁在这里少用了一个词。是生活会彻底厌恶的,还是您高尔基会让人彻底厌恶的。这种模棱两可也许是一种警告式的暗示。但是,高尔基究竟是不领情,还是没有理解这种暗示,目前没有直接的文字来证明,但坚持不出国。高尔基坚持的理由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要尽力拯救不幸和苦难中的知识分子朋友。于是,列宁给他的信件中就写得更明确了:“您都咯血了,您竟然还不走!这真是,真是,太过分了,不合情理了。”

最终结局是,“契卡”安排了高尔基出国的一切事宜,并很快把高尔基送到了国外。对于这种出自列宁亲自关怀下的安排,高尔基既不满意又无可奈何。被送到国外的第二天,即1921年10月17日,高尔基在给朋友拉德日科夫的信中表示出了这种困惑:“他一年多以来一直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固执坚持要我离开俄国,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日理万机的他怎么会老想着,谁在什么地方,得什么病了,需要休息。”

所以,高尔基的“出国疗养治病”实质上是列宁的一种“温文尔雅的放逐”,因为他成了列宁实施对知识分子政策和“契卡”执行这种政策的难以对付的麻烦。在高尔基被“放逐”后,列宁很快就指示制定了“被放逐者不得返回俄国”,私自返回者将予以枪决的法令。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列宁生前,高尔基出国后再也未能回到俄国。所以,对高尔基的“温文尔雅的放逐”只不过是一种先声,它开启了苏维埃政权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新一轮的政治斗争。

“不容许有反对派!”“不搞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1919年,列宁、苏维埃政权、“契卡”与知识分子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年的春天,列宁更明确地描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阶级的鉴定”、“历史的评价”,他说: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所有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在这一年3月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列宁以很大篇幅谈了不能对中农实行暴力和专政,强调“单靠暴力是行

不通的”,但是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却是变得不仅更为强硬,而且继续主张监控和暴力:“任务是极为困难的,要完全解决它,需要几十年!要解决它,必须造成一种力量,建立一种纪律,即同志纪律,苏维埃纪律,无产阶级纪律,这种纪律不仅能在肉体上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而且能完全控制他们,使他们服从我们,沿着我们的轨道行进,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这时,列宁反复提出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分子用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砖”。但这种利用并不是赋予知识分子与工农等同的、平等的地位,只是迫使他们“为我们工作”。这里没有政治上的信任,列宁的话说得十分清楚:“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相信立宪会议,而且也可以相信上帝,但是请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不要搞政治。”

列宁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固定看法渊源于他的一个“阶级原则”——或者说“阶级出身的原则”。在“十字军讨伐”的进程中列宁不断地解释了这种原则:“有文化的人所以屈从资产阶级政治,受资产阶级影响,因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并通过资产阶级环境获得自己的全部文化的。这就是他们总是站不稳脚跟,向反革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让步的原因所在。”这些话的实质意义是: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前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人出自于这个污泥坑,因此他们的依附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性质是不可更改的。所以,知识分子就成了“契卡”镇压的“怠工者和反革命”的主要对象。

对于这种“利用”,当时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能接受的。一位叫杜克尔斯基的农学院教授在给列宁的信中这样写:“他们被你们统称为有瘟病的‘知识分子’,你们唆使出身于旧巡警、巡官、小官员、小店主(省内很大一部分‘地方政权’往往是由他们组成的)的没有觉悟的新党员反对他们,他们受辱受苦的全部惨状是难以形容的。经常不断的荒诞的检举和控告,毫无结果但却极端侮辱人的搜查、枪毙、征用和没收的威胁,对私生活最隐秘方面的干涉(驻在我任教的学校里的部队首长要我和妻子必需睡一张床),这就是高等学校的许多专家直到目前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环境。”这位教授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首先要纯洁你们的党和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

无良心的同路人,处置那些以共产党旗帜为掩护,不是卑鄙地侵吞人民财产,就是愚蠢地进行荒唐的捣乱来破坏人民生活根基的损公肥私者、冒险家、走狗和强盗。如果您想‘利用’专家,那就不要收买他们,要学会尊敬他们,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不要把他们当作你们暂时需要的牲畜和工具。”

杜克尔斯基的这封信,与高尔基的一系列信件几乎是同一个主题,同一种声调,同一种语言,它所表达的就是对“契卡”非法监控和镇压知识分子的胡作非为以及列宁“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抗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契卡”无产阶级专政人为造成的难题。

列宁在《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中坚决不同意这位教授的意见,他坚持他的决策和“契卡”的做法:“怠工是知识分子和官员们发动的,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包含着阶级的鉴定、历史的评价,它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绝不能把它当作诽谤或咒骂。工人和农民痛恨知识分子的怠工是必然的,如果可以‘归咎于’谁的话,那只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帮凶。”对于军队拿走教授家的一张床,让他们夫妻同睡的事,列宁的回答更具坚定的“阶级鉴定”:“他们在闻所未闻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捍卫着社会主义共和国,难道他们没有权利弄一张床作短时间的休息吗?不,士兵和他们的首长是对的。”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支持并鼓励了这时在俄国普遍存在的借革命的名义,大发其财的“契卡”人员和数量庞大的“人民委员”。总之,在列宁的笔下,在这里,知识分子依然是资产阶级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帮凶”。所以,不用说一张床了,就是整栋住宅都没收了,身家性命都受到监控和镇压,也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工农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

在1919年年中,苏维埃国家专政的职能就几乎完全集中于“契卡”。在危急状态下,列宁下达的保卫国家的紧急指令都是给“契卡”的。1919年4月,列宁在以“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话中这样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正积极参加煽动罢工、煽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活动。鉴于既得的情报国防委员

会命令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以粉碎任何进行爆炸,毁坏铁路和煽动罢工的企图。国防委员会命令各级肃反委员会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警惕性,并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国防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断然重申:“我们不容许有反对派。”他对知识分子的警告是:“你是不对的,你不能帮助我们,你滚到格鲁吉亚去,滚到高尔察克那里去吧!不然你就坐牢!我们会办到的。”1919年7月,列宁在那封给各级党组织的著名信件《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甚至明确指示:“有些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人士**曾经**在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那里待过(黑体字为列宁所用——闻注),特别应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证词。”所以,这一时期“契卡”经办的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对这些党派和“依附于”它们的知识分子监控和镇压的。

这一时期,列宁更频繁地要求对作为知识分子温床的这些党派,“要加倍、十倍地严密监视。要十倍地提高警惕”。在对专家的利用上,手段升温:“在军事专家中像在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一样,一定也会出现更多的叛变者……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在背叛我们,而且将来还会背叛我们。我们会把他们抓起来,枪毙掉……”除了军事专家外,列宁对国营农场的人员和职员也不放心:“对他们要像对军事专家一样,从其反革命性着眼严格监督。”列宁还再次重申了“扣押人质”的必要性:“在危险激增的情况下,从各方面来说都必须经常大量使用这种手段。”

更能体现这一时期列宁对知识分子监控和镇压政策的是他关于“一党专政”的话。1919年7月,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厉声为“一党专政”辩护:“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像你们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来吓唬农民的“稻草人”。

列宁在坚决反对“统一战线”的同时,重申了必

须坚持“恐怖手段”：“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的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人，即建议同那些动摇不定、在俄国革命史上两度倒向资产阶级的分子实行联合的人，很喜欢责备我们采取恐怖手段……全世界资产阶级为了使剥削者在俄国复辟和扑灭现在甚至已经威胁到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正在干种种野蛮的、罪恶的、横暴的勾当。这就是恐怖的根源，这就是应对恐怖负责的人！”所以，列宁宣称：“不，我们决不放弃恐怖手段，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会使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获得暂时的胜利！”列宁所指的恐怖手段包括死刑——枪毙：“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居然不用死刑来惩罚这种行动，是可以想象的吗？”

(上接53页)固然有上述四项主要阻力。但客观地说，也有积极推进完备型“税收国家”的建设者。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

一是“纳税人意识”已经觉醒的纳税者群体。这一群体规模正在日渐增大，并借助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以及创建社会组织等新形式，不断呼吁，唤醒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推进完备型“税收国家”建设。

二是被财税特权明显剥夺的受害者组成的群体。这一群体，注定是中国建立完备型“税收国家”最大的动力源。因为他们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完备型“税收国家”，尝试改变自身被剥夺命运的迫切渴望，有追求被公正平等对待的现实渴求。而且，伴随全社会纳税人权利意识的逐步增强，纳税者维权意识的加剧，会逐步成为建立完备型“税收国家”的主要力量。主要问题是，由于天然松散性导致的凝聚力不足，无法在一些完备型“税收国家”构建目标等方面，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并付诸有效的行动和压力。

三是从现有体制中自觉地站出来为财税改革，为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鼓与呼的群体。这一群体尽管人数不多，但由于长期在体制内工作，对现行体制，包括财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和深刻认识，对其运行机理比较熟悉，认为若不改革，国家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因此，出于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也会自觉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所以说，在这个火热的1919年的夏秋之交，“契卡”对知识分子的监控和镇压达到了空前的激烈程度，此类案件的激增，社会上对“契卡”的越权和违法行为的争论和抗议也与日俱增，这不能不与列宁的决策、他对“契卡”行动的指导和干预以及多次的、多方面的辩护相联系。

列宁对高尔基采取的那种貌似关怀的知识分子政策，那种“温文尔雅的放逐”真的是大不合时宜了。对于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知识分子群体的抗议和说“不”已是不可再容忍的事了。列宁的决策将随之改变，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将转向另一个轨道就是迫不及待的事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和完备型“税收国家”的建设。但主要问题是：其中一些人会因为现实生存与发展的计较，常常患得患失，仅仅满足于枝节性的改良。同时也会因为社会各界的有限信任，在关键时候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陷入犹豫和彷徨。

关键是，在当下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下，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最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执政党的决心与胆略。如果执政党能够借助组织优势，动员全体国民积极参与，持续性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或能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 语

中国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要取得显见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向前的推进力与向后的阻力与摩擦力的此消彼长。而其未来命运，注定取决于既得利益群体的综合阻力与推进者群体的综合推动力之间力量的对比与变化。而且，要建设完备型“税收国家”，实现财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从官员主导转型到纳税人主导，由于强大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特别是已趋固化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能认定目标，逐渐推进，积累寸功之效，力争最终实现大的突破。■

(作者为西安市税务学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也谈红军长征的原因

○ 景玉川

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张鸣的文章《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很受启发。中央红军之所以长征，张文从政治模式与经济危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除此之外，我想补充两点：

第一，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大大地损伤了苏区的元气，损伤了革命根据地的军心、民心。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二十军处置后，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短短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

中央苏区所处决的7万多“AB团”，大多是苏区军队与地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是精英人物。如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李文林、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军长肖大鹏等。有的县一连九任县委书记，因被诬为“AB团”而遭处决。陈正人在“富田事变”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他妻子彭儒的弟弟同样不能幸免。胡耀邦、邱会作等则由于当时年纪小，因为偶然的原因分别临时被顾作霖、周恩来保护下来。抗战中率领两个保安团，孤军坚守庐山、名重一时的杨遇春，曾是红军独立师师长，因家里亲人连遭诬陷，财产被剥夺，才投向国民党军……苏区残酷的肃反，搞得人人自危，使根据地充满恐怖气氛，至今在赣南、吉安、赣北修水一带仍然可以见到当年留下的“打倒AB团”“消灭社会民主党”的大标语。这样的红色恐怖自然会动摇军心，削弱部队战斗力。所以《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作者戴向青、罗惠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央苏区调查时，苏区的群众对他们感叹说：（当年）共产党是自相残杀，被自己打败的。这使人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如果不是及时刹车，后果很难预料。

至于张文所谈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原因，张国焘所言未必确切。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长征缘于仗打败了，不走不行。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仗打赢了，其实可以不走。苏区财政困难，是由于过左的政策造成的。川陕苏区物产丰富，地形易守难攻，回旋余地大，比陕北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好多了。如果能注意调整政策，财政问题是不难

解决的。2011年我去川陕苏区巴中、通江一带，当地党史专家言：红四方面军根本不应该离开苏区，其长征是一错误决策。

第二，如果说苏区内部大规模肃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的话，那么，国民党围剿方法的调整则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外部原因之一。

由于几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除了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外，他还接受幕僚的建议，推行“交通清共”、“筑路剿共”，此举取得了很大成效。1981年出版的《江西公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记载了这一历史，该书特设《在“围剿”战争中突起发展的江西公路》一章，以较多的篇幅详叙此事。

1931年，熊式辉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亲历“剿共”战役，深感“剿共工作失利，往往因为交通阻塞之故”，“为便利军事上的动作计，对于公路的修筑是刻不容缓的”。因此，熊上任伊始，就大力推行“交通剿共”的政策，将“强制筑路”列为江西施政的六大方针之一。

1932年一年间，全省修筑公路1022公里，“军运显见其利”，蒋介石大加赞赏。不久，即在汉口召开苏、浙、皖、赣、湘、豫、鄂七省公路会议，展开更大规模的兴修“围剿”公路活动。

国民党当局的“围剿”公路，在短短三年中（1932年3月至1934年底）基本完成，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因而增添了获胜的筹码，给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带来极大的压力与不利，加速了“反围剿”的失败和红一方面军长征。

1934年红军长征北上后，由于红军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所以“围剿”公路仍在进行，但已进入收尾联网阶段。至1937年，江西全省83个县（当时行政区划数）有75个县通了公路，以南昌为中心的全省公路网基本形成，四邻六省的省际公路也已接通。

我家乡星子县通往九江与德安的两条公路（九星公路和星德公路），就是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时修筑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所在地海会寺与白鹿洞书院，离星子城不过10公里。

我只是个党史爱好者，由于孤陋寡闻，好像无论官修党史与专家的私人著述，在论及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红军长征时，都未谈到江西“剿共公路”一说。如果真的如此，希望在有关书中，能补充这一段历史。■

代购代邮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四人帮”兴亡(全四卷)	叶永烈	198.00	20.00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38.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苏采青	98.00	10.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 布尔诺·德·梅斯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 齐格弗里德·洛卡斯特 英格里德·宗塔格 著	59.00	9.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儿子，你要活下去	[法] 品雅特海	36.00	6.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苏联的最后一年	罗伊·麦德维杰夫	39.0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珥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 列·姆列狄	56.00	9.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 撒迪厄斯·拉塞尔	39.00	7.00
张发奎口述自传	张发奎口述 夏莲瑛访谈及记录	56.00	9.00
南非的启示	秦 晖	78.00	9.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1949 我不在清华园	张泽石	23.0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俄]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 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我眼中的改革	[德] 汉斯·莫德罗	45.00	8.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 颐	32.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 欢 戈叔亚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袁天鹏	2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九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86.00	36.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十)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8.00	7.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四人帮”兴亡》：本书是作者潜心多年，收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采访众多当事人，经多次修改和补充而完成。此书是新增订版本，分为(1、初起2、兴风3、横行4、覆灭)四卷，根据“四人帮”产生到灭亡的脉络，真实记录下“十年文革”历史。讲述了“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给党和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和沉痛的教训。对“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极左思潮的批判，防止“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

《思痛录》：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作者痛定思痛，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回忆是真诚的，反思也是深刻的，以新的视角，给人们启发和教益。文章以深刻反思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表现出作者愤怒、痛苦、懊悔、自省的复杂情感。当愤慨地谈到那场荒谬的“反右”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作者当时已痛悔自己走错了人生道路，错误地加入共产党，投奔延安，“如果在二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她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谈到民主党派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如储安平、章乃器、罗隆基等人时说：“他们参加政协，‘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

作者追述往事，也反省自己，痛恨自己被党性所迫，在“反右运动”中“也干了些违背良心”的事，也“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这些沉痛直言，是对荒谬年代里人情世态和政治风云、民族悲哀的剖析。直面惨痛历史，勇敢的暴露黑暗，思考和总结我们的历史。显示出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真诚品格。

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不仅是鲜血、生命，甚至是泣血的灵魂。知识分子的悲哀在于，为革命不仅牺牲了一切，还牺牲他们自己的良心，穷尽一生的努力和奋斗，得到的却与自己的理想相悖，怎不痛彻心扉？

历史是世代的血肉之躯锻造的，中国知识分子用旷古罕匹的特殊牺牲，铸成了一页当代中国最沉重的历史。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从美国到延安再到天安门，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35年的外国人，他经历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见证了重大的历史变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曾被怀疑成特务而关押了六年，出狱后依然满怀热情，政治上积极进步，在“文革”中红极一时，一度成为所在单位造反派的头号人物。对政治的狂热，换来的却是再度身陷囹圄：十年牢狱之灾。他亦曾对“文革”反思和自我剖析：“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这是他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初衷。

作者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不仅折射出所处时代的历史变革，这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经典传奇。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 QQ 在线：2368298257

珍重历史 保存记忆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订制出书

订制出书：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个人回忆录、自传，家族家史、家谱、纪念册。

文秘服务：资料清理、修改润色、残稿完篇；口述录音、采编整理、专题创作等。

沙龙聚会：“老人出书沙龙”提供场地，举办“新书发布会”与“亲友分享会”。

作品推广：书名、作者、简介入录《百度》“百科词条”；《家谱传记报》作品选登；《民间记忆网》与相关报刊连载。



民间记忆

名人讲座：民间写史、口述历史的领军学者、作家讲解民间记忆的价值意义与整理方法。

记忆分享：分“年代记忆、身份记忆、人物记忆、事件记忆、地方记忆”等类举办“民间记忆分享会”。

经验介绍：倡议编写百年家史，协助南方报业集团所属的《凯迪网》等机构合作举办“百姓家史写作大赛”。

编写培训

教材邮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教材套装或单本，款到寄书。

函授培训：分“自传班、家史班、家谱班三种”，指导学习，半年一期。

赠送资料：光临书店、邮购教材、报名函授均赠送“家谱传记编写流程图”与《家谱传记报》。

010-68920114、62525116



会馆：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www.jzwhw.net
《百姓家谱网》www.bx.jpw.com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 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 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 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 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 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 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 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 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 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 国内出版社出版, 国家标准书号, 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 无书号出版, 用于交流与赠送, 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 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4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注: A类型代理出版的, 1000册起印; 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 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 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 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校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 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 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 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 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热线: 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 010-58608407 投稿邮箱: 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 (人人出版网) 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 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 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 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 10221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2013中国邮政发行报刊百强排行榜”

炎黄春秋

进入全国期刊50强



中国邮政首次联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报业协会，评选出我国百强报刊
评定过程综合了报刊期发量和流转额两个关键指标，按照综合得分情况进行排名

全国公开发行 各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 82-507

欢迎订阅 欢迎邮购

全年12期：120元

每期单价：10元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热线：010-68532048
邮政编码：100045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电子信箱：yhcqfxb01@126.com

毛泽东与竺可桢谈农业“十字宪法”

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

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

一位旧政人员的自传

民生公司被公私合营的过程

也谈红军长征的原因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